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日本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转向与展望

汪 道

内容提要 经济走廊建设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受到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制约,中日两国在该次区域呈现博弈与竞争的状态。根植于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日本聚焦于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的建设,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和自下而上的项目及资金供给,为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当前,日本在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企图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将经济走廊建设纳入其“印太战略”的整体框架,并积极拉拢印度施压中国。中国一方面要持续警惕经济走廊建设中日本的意图,另一方面可优化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促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 日本 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走廊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湄公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形成大湄公河次区域,该次区域是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的重要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区域自然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但总体而言,湄公河五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为落后,对大国支持的需求度较高。鉴于此,大国纷纷在该区域投入资源,建立合作关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制度拥堵和竞争的状态。

日本是最早与湄公河国家开展合作的大国。无论是借助 1992 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成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简称 GMS),还是依靠 2008 年确立并逐步完善的“日本——湄公河合作机制(Japan-Mekong Cooperation)”,日本不断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尤其是互联互通上。这其中,最重要的领域是经济走廊建设。日本不断提出并更新建设规划、投入资金、重点项目、制度创新等。这一方面体现出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中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者的定位,另一方面又给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走廊建设带来经验和挑战。基于此,本文将对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中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分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中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概况,尤其是日本通过 GMS 的经济走廊论坛和交通论坛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日本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重点分析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同时指出其供给转向新特征;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和展望。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走廊建设

1998年举行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部长级会议正式提出了“经济走廊”(economic corridor)的概念,其含义是将交通走廊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各国间的合作与往来提供便利条件。2008年相关各国正式成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进入实质性推进经济走廊建设阶段。^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确定了10大优先领域,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分量极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交通建设,即以道路互联互通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经济走廊建设。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按照地理走向分为三大经济走廊,即东西经济走廊、南部经济走廊和南北经济走廊,日本积极参与前两个,中国则积极参与到第三个。^②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经济走廊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三个主要大国分别是中国、日本和印度。中日两国参与的时间较长,印度则是近期加强了湄公河——印度经济走廊建设,希望更多地参与到东南亚事务中来。^③在其“东进战略”的指导下,印度推进自东向西连接越南胡志明、柬埔寨金边、泰国曼谷、缅甸土瓦、印度金奈,希望提升地区影响力,平衡中国的南北经济走廊。^④但总体而言,相较于印度,中日两国在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更大。

(一) 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经济走廊建设

中国的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经济走廊建设主要分为多边和双边两种形式。多边指的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它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之一,重点囊括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八个国家,地理上超越了大湄公河次区域。该走廊以中国广西南宁和云南昆明为起点,以新加坡为终点,是陆上丝绸之路

^①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走廊论坛6日正式成立》,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q/2008-06/06/content_1008998.htm,(2021年12月18日访问)。

^② 卢光盛、别梦婕:《“南北”还是“东西”?——湄公河地区跨国经济走廊的竞争与协调》,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6期,第145页。

^③ Laurids S Lauridsen,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and Railway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with a Case Study of Thailand”, in Xing Li, ed., *Mapp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219-248.

^④ Kanwal Sibal,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proposals are not as peaceful as they seem”, *Indian Defence Review*,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chinas-maritime-silk-road-proposals-are-not-as-peaceful-as-they-seem/>,(2021年12月19日访问)。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区域。^①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② 在互联互通领域,中老铁路和中泰铁路项目是重要代表。2021年12月3日,作为泛亚铁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老铁路正式开通,全长1035公里,线路北起昆明,过中国磨憨铁路口岸和老挝磨丁铁路口岸,进入老挝北部地区,最后到达老挝首都万象。^③

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双边跨境经济走廊包括中越“两廊一圈”、中缅经济走廊和中老经济走廊等三个。中越“两廊一圈”指的是“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两个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设想,简称“两廊一圈”,“两廊一圈”覆盖了中国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地区。^④ 中缅经济走廊北起云南省,途径曼德勒后分别向东西延伸至仰光新城和皎漂经济特区。^⑤ 中缅两国高质量共建中缅经济走廊,加快推进皎漂经济特区、仰光新城、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三端支撑项目和互联互通合作。^⑥ 中老经济走廊北起云南昆明,依托于中老铁路,途经中老重点区域,延伸至老挝南部。^⑦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因中国所处靠北的地理位置,中国所参与的跨境经济走廊基本是南北走向的。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经济走廊建设呈现出“多边包含双边、多双边共同推进”的特征。

(二) 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走廊建设

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建设中,主要是通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日本——湄公河合作机制等两个主要合作机制来实践推动的,由于GMS创立时间是20世

① 卢伟等:《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任务及推进策略》,载《经济纵横》,2017年第2期,第50页。

②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2/c_1124400071.htm,(2021年12月18日访问)。

③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新华网,http://www.news.cn/2021-12/03/c_1128129131.htm,(2021年12月18日访问)。

④ 刘稚:《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下的中越“两廊一圈”合作》,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10期,第26页。

⑤ “How does the BRI bear witness to China and Myanmar's friendship?”, CGTN, 17th Jan 2020,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1-17/How-does-BRI-bear-witness-to-China-Myanmar-friendship--NjU-dAy3FHG/index.html>(2021年12月18日访问)。

⑥ 《王毅国务委员访问缅甸政治共识和具体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d/202101/t20210112_361989.shtml,(2021年12月18日访问)。

⑦ Ren Keyao, Riaz Ahmad, Azeem Gul, “China-Laos Economic Corridor: Challenges for Regional and Policy Countermeasures”. *Global Economics Review*, Vol.3, No.2(Fall, 2018), pp.67-75.

纪 90 年代,所以研究的起点是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①

1.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1992 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成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②作为 GMS 发起者、协调者和主要筹资方的亚洲开发银行,是由日本主导的,已有研究通常认为日本在 GMS 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为湄公河国家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993–2018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 GDP 增长率为 6.3%,人均 GDP 增长率为 5%,次区域内贸易增长了 90 倍。^③2011 年,在 GMS 第四次领导人峰会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新十年战略框架(2012–2022)》获得通过。在该框架之中,GMS 的发展从立足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扩展至经济走廊建设,这意味着更紧密的跨部门联系、更广阔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更多的本地化以及更有效的监督。2014 年,GMS 成员国批准《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2017 年,实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新十年战略框架(2012–2022)》的中期检查,以确保该计划的持续有效性,检查结果呼吁扩大经济走廊建设、加强互联互通。2018 年,在河内举办的第六届 GMS 峰会通过了《区域投资框架》,以项目为主导共投资 222 个项目,总计约 650 亿美元。同时通过的还有《领导人宣言》、《河内行动计划》,总结了 GMS 成立 25 年来的成就和经验,探讨下步合作方向,展望长期愿景。

2.日本在 GMS 中积极推动经济走廊建设

日本主要推进的是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建设。^④东西经济走廊途经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四国,连接越南岘港和缅甸毛淡棉港,且能隔海辐射仰光。南部经济走廊从越南胡志明市出发,由南向北穿行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四国,途经金边、曼谷等大城市群,最终到达缅甸土瓦港。^⑤

① 因后文将对日本——湄公河合作中的经济走廊建设作详细分析,所以在这一部分只介绍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②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686/jbqk_682688/, (2021 年 12 月 18 日访问)。

③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Sub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ASEAN after COVID-19 Inclus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Mekong Subregion (Mekong 2030)”, <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subregional-development-strategy-in-asean-after-covid-19-inclusiveness-and-sustainability-in-the-mekong-subregion-mekong-2030/> (2021 年 12 月 18 日访问)。

④ 第三条经济走廊为海上经济走廊,因其不属于大湄公河次区域范围内,故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⑤ “JICA’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EAN”,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https://www.jica.go.jp/english/publications/brochures/c8h0vm0000avs7w2-att/jica_asean.pdf (2021 年 12 月 18 日访问)。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范围内,日本推动经济走廊建设主要是通过举办经济走廊论坛和交通论坛来实施的。日本聚焦于经济走廊不同主题和相关项目推进,并对经济走廊建设中最核心部分交通建设进行协调、评估和调整,起到了保障落地的作用。

(1)GMS 经济走廊论坛(GMS Economic Corridors Forum)

GMS 自 2008 年开始组织经济走廊论坛,促使原先聚焦于交通运输的走廊逐步转变为内容更为广泛的经济走廊,目标是把湄公河次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枢纽连接起来。经济走廊

表 1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概览

届数	年份	地点	主题或主要内容
第一届	2008	中国昆明	主题:“平等互利合作,持续平衡发展” 主要内容:把现有的交通、资源和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其加快转化为次区域发展的经济优势
第二届	2009	柬埔寨金边	主题:“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走向融合、和谐、繁荣的次区域” 主要内容:大湄公河地区南北、东西及南部经济走廊发展现状、存在的制约因素及未来发展方向
第三届	2011	老挝万象	主题:“大湄公河次区域加强持续发展的路径” 主要内容:为基础设施、物流、交通和贸易便利化、农业、工业和旅游发展制定未来路线图
第四届	2012	缅甸曼德勒	主题:“为了更好地执行新 GMS 战略框架(2012-2022):加大、加宽经济走廊” 主要内容:扩展经济走廊内涵,便利人员和产品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流通
第五届	2013	泰国曼谷	聚焦次区域投资框架
第六届	2014	越南河内	主要内容:回顾论坛成立 6 年来重要成果,评估跨境交通协议和交通与贸易便利化倡议
第七届	2015	中国昆明	主要内容:落实 2014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成果,继续推动次区域交通走廊向经济走廊转化,积极解决在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问题。
第八届	2016	柬埔寨金边	主要内容:对当前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估,审议了亚开行提交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规划调整方案》,并就进一步加深区域交通与贸易便利化、经济走廊跨境合作、次区域特殊经济区发展及次区域物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等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第九届	2017	越南河内	主要内容:就扩大经济走廊的利益等重要内容展开讨论,如扩大交通网络,特别是连接区域内各国各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的铁路网络,推动地区电力领域采购、协调环境可持续发展计划制定经济走廊沿线各地方发展计划,推动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吸收发展伙伴、私营经济对 GMS 内各项目和计划的投资资金等。
第十届	2018	缅甸内比都	主要内容:使经济走廊走向更包容的次区域连接
第十一届	2020	泰国曼谷	主要内容:期待加快 GMS 经济走廊发展
第十二届	2021	线上	主要内容:期待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政府网、中国商务部网站、中新网、新华网、GMS 秘书处网、越南人民报网等网站信息整理。

论坛作为 GMS 下的一个独立机制,聚焦于经济走廊发展,提升公私部门的交流,加强次区域国家的央地政府互动。^①经济走廊论坛承担着经济走廊建设重点项目推进的任务,保障了经济走廊建设与 GMS 整体的协调统一。

(2)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论坛(GMS Subregional Transport Forum,简称 STF)

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论坛是更细分领域的论坛,主要职责是协调、评估和调整 GMS 交通计划和项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截至 2021 年,已召开 24 届,已见证了三份 GMS 交通战略规划的出台和执行。^②从战略规划主要内容和实施路径看,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走廊网络建设

表 2 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规划概览

交通战略规划	年份	主要内容
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总体规划 ^③ (GMS Transport Master Plan)	1995	强调重点建设的优先交通类项目,涵盖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
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规划 (2006–2015) ^④ (GMS Transport Strategy 2006–2015, Coast to Coast and Mountain to Sea; Toward Integrated Mekong Transport Systems)	2007	发掘 GMS 交通体系的协调效应; 向交通服务领域的开放市场和边界努力; 提升经济效率,降低交通成本; 完成 GMS 交通网络建设,提升与南亚的连接; 鼓励使用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
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规划 2030 ^⑤ (GMS Transport Sector Strategy 2030: Toward a Seamless, Efficient, Reliable, and Sustainable GMS Transport System)	2018	完成 GMS 经济走廊网络建设,提升东南亚与南亚的连接; 便利跨境交通; 加强综合运输体系; 提升物流发展水平; 加强公路资产管理; 提升公路安全 保护环境并加强社会关注,提升私有部门参与度,增强能力建设; 重点优先领域:公路、城市交通、铁路、交通便利化、港口和内陆水道、物流、机场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来源于亚开行网站和 GMS 秘书处网站。

^① “GMS Economic Corridors Forum”,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Secretariat, <https://www.greatermekong.org/gms-economic-corridors-forum>(2021 年 12 月 19 日访问)。

^② “Subregional Transport Forum”,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Secretariat, <https://www.greatermekong.org/stf>(2021 年 12 月 18 日访问)。

^③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Transport Sector Strategy Stud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roject-document/69741/tar-stu-38052.pdf> (2021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④ “GMS Transport Strategy 2006–2015”,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Secretariat, <https://greatermekong.org/gms-transport-strategy-2006%E2%80%932015>(2021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⑤ “GMS Transport Sector Strategy 2030: Toward a Seamless, Efficient, Reliable, and Sustainable GMS Transport System”,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institutional-document/470536/gms-transport-sector-strategy-2030.pdf>(2021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逐步从基础的交通设施建设,扩展到新兴的物流、综合运输体系、环保、能力建设等新的领域。

二、日本在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分析

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和自下而上的项目与资金供给,匹配了湄公河国家对经济走廊建设的需求,同时呈现出规范转向和制约中国的新特征。相对而言,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更能体现出日本的能动性和新特征,所以将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一)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

制度供给是经济走廊建设的上层保障。日本——湄公河五国的合作框架始于2007年日本公布的《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提出包括三个目标、三个优先领域和三项新倡议的合作政策,其本质就是推进日本与湄公河五国的伙伴关系,强化日本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①为推动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建设,日湄首脑会议和外交部长会议发挥了主要的规划引领作用。

1.日本——湄公河国家首脑会议(Japan-Mekong Summit Meeting)

日本——湄公河国家首脑会议是日本与湄公河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每年举办的峰会,每次峰会通过的联合声明或合作战略,是日湄开展合作的整体框架。2009年,首届“日湄峰会”在东京召开,从此日湄合作走向机制化,先后通过指导未来三年日湄合作的《东京战略2012》、《新东京战略2015》、《东京战略2018》,不断强化日本与湄公河五国的合作,日本战略意图日益明确,合作路径也不断更新,地区影响力不断拓展。^②从表3看出,三份战略规划分别对经济走廊建设有不同的内涵表述,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扩展到不同机制间的协同和“高质量基础设施”等新理念推广。2012年,第一份东京战略作为指导日湄合作的战略规划出台。2015年召开的第七届日本——湄公河国家首脑峰会,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峰会。这次峰会通过的“新东京战略2015”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对2009年至2015年的经济走廊建设成就进行回顾,还通过了一些新的战略规划,如“日本——湄公河互联互通倡议”(Japan-Mekong Connectivity Initiative)和“湄公河工业发展愿景”(Meko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Vision,简称MIDV)及其工作计划。2018年10月,第十届日本——湄公河国家首脑会

^① “Japan-Mekong Region Partnership Progra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goal.pdf> (2022年1月9日访问)。

^② 常思纯:《日本为何积极介入湄公河地区》,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12期,第22页。

议通过了第三份东京战略,表示要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计划在湄公河地区全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 SDGs),2009 年通过的“绿色湄公河十年行动计划”,被纳入到日本——湄公河国家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中。2019 年在首届日本——湄公河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论坛上通过的日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倡议(The Mekong-Japan Initiative for SDGs toward 2030)则进一步强调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建设对于印太连结的“桥梁”作用。^①2019 年,“湄公河工业发展愿景 MIDV2.0”顺利通过,升级为三大支柱:第一,提升次区域连结,包括工业、“硬”和“软”基础设施等三大领域。第二,数字化创新。第三,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目标。

表 3 东京战略中关于经济走廊建设的表述

年份	战略名称	有关内容
2012	东京战略 2012 ^②	1.日本将继续加大力度支持地区的“硬”和“软”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有关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的相关项目,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有关经济走廊的物质、制度和人员连结。 2.首脑们同意越南有关加强多模式交通建设,提升经济走廊建设连结性的倡议,加强湄公河水路、陆路、海运等多种模式的组合。 3.回顾总结 2009-2012 年经济走廊建设的成就,如老挝 9 号国道建设提升项目、日本和泰国共同主办的主题为“完成连结、创造经济繁荣”的日湄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国际会议(2010)等。
2015	新东京战略 2015 ^③	1.重点关注日本、泰国和缅甸三方推进的土瓦港开发项目,该项目具有较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将促进南部经济走廊与印度洋的连结。 2.将“硬”连结分为三个重要部分:(1)陆上连结,如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建设、铁路合作以及与南亚连接的公路建设;(2)海洋连结,如港口建设与升级、与海上东盟国家的联系、内陆河流运输;(3)空中连结,如协助机场建设等。 3.加强日本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机制(AEM-METI)、日本与东盟经济产业合作委员会(AMEICC)与东西经济走廊工作组的协同合作。
2018	东京战略 2018 ^④	1.基础设施建设对提升陆上、海洋和空中联通发挥出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对弥补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建设中的空白点的作用。 2.强调“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包括开放、透明、经济活力、环境保护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The Mekong-Japan Initiative for SDGs toward 203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535957.pdf>(2022 年 1 月 10 日访问)。

^② “Tokyo Strategy 2012 for Mekong-Japan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summit04/joint_statement_en.html(2022 年 1 月 9 日访问)。

^③ “New Tokyo Strategy 2015 for Mekong-Japan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s_sa/seal/page1e_000044.html(2022 年 1 月 9 日访问)。

^④ “Tokyo Strategy 2018 for Mekong-Japan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06731.pdf>(2022 年 1 月 9 日访问)。

2. 日本——湄公河国家外交部长会议(Japan-Mekong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相较于日湄首脑峰会,外交部长会议虽然等级相对低一些,但仍然在日湄合作中发挥指导性作用。2008年,日本与湄公河五国首次外长会议在东京举行,确立了以“信任、发展、稳定”为核心的加强合作主基调。^①自此,至少每年召开一次外交部长会议,主要为后续召开的首脑峰会作准备,同时也聚焦于合作规划的具体推进和调整。从表4可以看出,日湄外交部长会议有关经济走廊建设的内容相较于首脑会议的内容,会具体落实到项目上,这也体现了日本对于经济走廊建设过程的重视,通过不断追踪和回溯来推进经济走廊建设。

表4 日湄外交部长会议中关于经济走廊建设的表述

年份	主题	有关内容
2008	第1届日湄外交部长会议主席声明 ^②	日本提出“东西经济走廊”和“第二东西经济走廊”(2nd East West Economic Corridor)建设对提升区域物流通效率的关键作用,计划使用日本—东盟一体化基金(Japan-ASEAN Integration Fund,简称JAIF)中约2000万美元予以支持。
2009	第2届日湄外交部长会议主席声明 ^③	可以利用日本—东盟一体化基金建设“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以提高物流效率。
2012	第5届日湄外交部长会议通过的“实现东京战略2012日湄行动计划”(Mekong-Japan Action Plan for realization of the Tokyo Strategy 2012) ^④	明确有关经济走廊建设中的物质联通、制度联通和人员联通项目共20项,如日本将研究柬埔寨5号国道更新项目、与柬埔寨讨论1号国道提升项目、支持柬埔寨实施乃良大桥建设项目、支持柬埔寨实施西哈努克港口多用途终端提升项目、与泰国和缅甸一起支持建设土瓦深海港与海港连接至泰国的公路建设项目等。
2013	第6届日湄外交部长会议内容 ^⑤	强调“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性,感谢日本在相关项目上的合作。
2014	第7届日湄外交部长会议主席声明 ^⑥	部长们赞赏日本在推进跨境物流通上的贡献,称其为“亚洲货物高速公路”(Asia Cargo Highway),这一概念是修正后的“实现东京战略2012日湄行动计划”(Revised Mekong-Japan Action Plan for realization of the Tokyo Strategy 2012)的重要概念,期望日本在经济走廊建设上提供更多的援助。

① “Japan-Mekong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Chair's State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meet0801.html>(2022年1月9日访问)。

② *Ibid.*

③ “Chair's Statement of the Second Mekong-Jap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fm0910/statement.html>(2022年1月9日访问)。

④ “Mekong-Japan Action Plan for realization of the Tokyo Strategy 201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fm1207/pdfs/jm05_ap3.pdf(2022年1月9日访问)。

⑤ “Sixth Mekong-Jap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region/page6e_000117.html(2022年1月9日访问)。

⑥ “Chair's Statement of the Seventh Mekong-Jap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049381.pdf>(2022年1月9日访问)。

(续上表)

年份	主题	有关内容
2015	第 8 届日湄外交部长会议通过的“实现新东京战略 2015 日湄行动计划”(Mekong-Japan Action Plan for realization of the New Tokyo Strategy 2015) ^①	1.日本、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共同建设“东西经济走廊”,日本、柬埔寨、缅甸、泰国和越南共同建设“南部经济走廊”。 2.重点项目: (1)日本-老挝:9号国道提升项目(东西经济走廊) (2)日本-泰国: 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北碧府——曼谷、曼谷——北柳——亚兰、曼谷——北柳——林查班等3段(南部经济走廊) 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项目(南部经济走廊) 3.加强制度联通(institutional connectivity)建设,保障经济走廊的发展。
2016	第 9 届日湄外交部长会议主席声明 ^②	部长们欢迎“日本——湄公河互联互通倡议”的提出,希望在“硬”和“软”基础设施建设上向前进。为匹配该倡议,并与“实现新东京战略 2015 日湄行动计划”(Mekong-Japan Action Plan for Realization of the New Tokyo Strategy 2015)对接,部长们决定建立高级别工作组,以更好地落实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具体工作,包括新项目立项等工作,以更高效地利用未来 3 年内日本 7500 亿日元的官方援助资金。
2017	第 10 届日湄外交部长会议内容 ^③	1.日本在自缅甸的迪拉瓦至老挝的巴色之间的东西经济走廊中提供了多样的支持。 2.5号国道改进工程项目于 2016 年正式实施,这条公路是南部经济走廊中柬埔寨和泰国间的重要通道。 3.日本—东盟一体化基金对建设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提供资金援助进入尾声,该基金提升了次区域的配送和物流效率。同时,日本与亚开行合作,将缅甸毛淡棉至高加力的广泛区域纳入东西经济走廊建设范围,日本将帮助提升物流效率。
2018	第 11 届日湄外交部长会议主席声明 ^④	部长们高度赞赏对“日本——湄公河互联互通倡议”的评估,评估回顾了主要基础设施建设的量化分析结果,这些项目主要涉及的是“硬”和“软”基础设施领域以及人力资源发展计划。通过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的主要基础设施类项目的建设,湄公河次区域实现了更加联通的目标。

(二)自下而上的项目导向和资金配套

项目导向是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中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特色,金融配套是完成项目的最重要保障。日本参与经济走廊建设的资金来源是多元的,除亚洲开发银行

① “Mekong-Japan Action Plan for realization of the New Tokyo Strategy 201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093571.pdf>(2022年1月9日访问)。

② “Co-Chairs' Statement of the Ninth Mekong-Jap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176165.pdf>(2022年1月9日访问)。

③ “The Tenth Mekong-Jap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s_sa/sea1/page1e_000174.html(2022年1月9日访问)。

④ “Chair's Statement of the 11th Mekong-Jap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389426.pdf>(2022年1月9日访问)。

外,日本还加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简称 JICA)与亚洲开发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 ODA)为主要形式实现其战略目标,同时通过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简称 JBIC)增加对高风险项目的援助。^①

因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经费在经济走廊建设中占比最高,适合从项目导向和金融保障两个角度进行介绍。

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2012–2020年,亚开行在大湄公河次区域项目中共提供了58项贷款或捐款以及总价值约80亿美元的57个技术援助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占总项目数量的66%,占总融资金额的85%,融资方式主要是项目融资,在总计58个项目中,48项为基础设施类。在亚开行的资助下,2012–2020年间,湄公河国家共发起131个项目(占总项目数量的62%)、总金额为560亿美元(占总金额的71%)。根据合作框架内容,通过2012–2020年的不间断建设,已成功建成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交通网络,即将建成或维修的公路约3300公里,这些交通网络将连接经济走廊内的1920万域内居民,并将降低车辆运营和道路维护成本。^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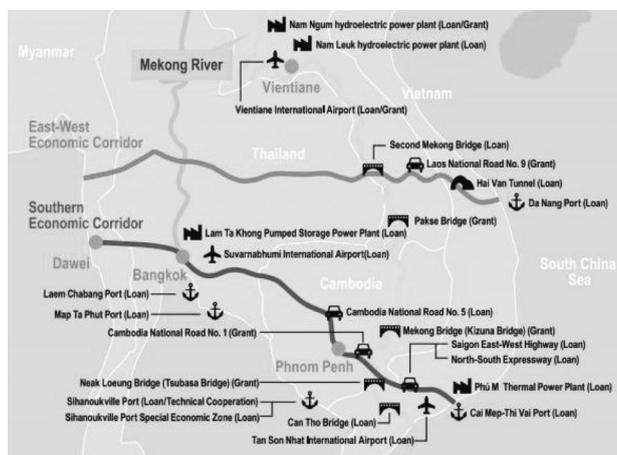


图1 日本在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概览^③

① 孟晓旭:《日本调整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载《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5期,第34页。

② “Evaluation of ADB Support for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Program, 2012 - 2020”,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evaluation-document/680191/files/te-gms.pdf> (2021年12月20日访问)。

③ “Japan Brand ODA -Corridor Development Approach”,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https://www.jica.go.jp/english/publications/brochures/c8h0vm0000avs7w2-att/japan_brand_07.pdf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0日)。

(三)供给新转向

在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日本供给公共产品出现新的特征,转向规范供给并且着重于地缘政治考量,希望制约中国。

1.规范转向

规范转向是日本的主动转向,即经济走廊建设从项目规划建设转向为规范认同。日本已不满足于停留在经济走廊建设的物理推动过程中,更希望逐步建立起湄公河五国对日本的认同,实现其在建设过程中所创设概念和理念的社会化目标。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quality infrastructure)和“软基础设施建设”(soft infrastructure)等概念得到应用、实践和推广。2015年,安倍政府首次明确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突出使用“高质量”的概念,把“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高质量增长”等概念提升至国际战略层面,这两个概念在2016年日本伊势志摩举办的G7峰会和2019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都有提及。^①2017年,经协基础设施战略会议提出将基础设施建设涵盖领域从传统的“硬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信息通信等新“硬基础设施”领域及教育等“软基础设施”领域。日本在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实施技术转移和培训等技术合作方式进行软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越南胡志明市至印度金奈的运输时长为239小时,但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用于清关,这对双边贸易往来十分不利,但技术合作项目有效提升了清关速度,加快了海关服务,促使清关时长大大压缩,泰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都从中受益。^②

2.目标转向

目标转向指的是日本从经济利益考量转向地缘政治考量。日本通过将经济走廊建设纳入其“印太战略”以实现其对中国的围堵,更是拉拢印度,企图与中国开展竞争,对该次区域的主要认知维度从经济维度转向地缘政治维度。

从经济利益视角看,日本意图通过两大经济走廊的建设,绕过马六甲海峡,构建联通印太、横贯湄公河地区的东西向陆海大动脉,以降低运输成本、缩短运输时间、增强海上交通线的安全性。^③

^① Nikolay Murashkin, “Japan’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rom making amends to agenda-setting”, *Revista de Fomento Social*, Vol. 76, No. 300, 2021, p.367.

^② “Japan Brand ODA -Corridor Development Approach”,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https://www.jica.go.jp/english/publications/brochures/c8h0vm0000avs7w2-att/japan_brand_07.pdf(2021年12月21日访问)。

^③ 卢光盛、别梦婕:《“南北”还是“东西”?——湄公河地区跨国经济走廊的竞争与协调》,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6期,第145页。

然而,从地缘政治维度出发,日本对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心存芥蒂。日印两国对中国通过经济走廊的不断建设,逐步深入至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和太平洋,加强影响力心存担忧,所以两国联手的迹象愈发明显。日印已签署《日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合作推出“亚非增长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简称 AAGC)计划,这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合作倡议旨在构筑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至非洲的产业走廊和产业网络,该倡议在地域、领域上与“一带一路”倡议有较大重合,反映了日本、印度两国“印太战略”的契合与对接,以及两国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担忧。^①日印两国竭力渲染中国试图通过所谓的“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包围印度。^②而且印度目前是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最大受援国,同时日本也是印度唯一受邀参与印度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开发的投资方。^③日印合作打通印东北地区通向东南亚的经济走廊可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构成竞争性影响。^④

三、结论及展望

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走廊建设,聚焦于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日本通过推进举办 GMS 经济走廊论坛,夯实了其建设经济走廊的基础;通过交通论坛的举行,保障了重大项目的落地、回顾、评价、调整等具体工作。本文一分为二地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视角来分析日本的经济走廊建设。自上而下看,全方位的制度供给突显湄公河次区域对日本的重大战略意义。日本——湄公河国家首脑峰会和外交部长会议,推动形成日本主导下的日湄合作,显示出日本在经济走廊建设中起到规划与引领的作用。日本在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上实现了闭环,即符合“规划——行动——检查——调整”的完整流程。自下而上看,项目导向和资金配套,一直都是日本推进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本文作了简要分析。

随着经济走廊建设的深入,日本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出现新的转向,即规范转向和地缘政治考量,前者主要是一些新理念规范的形成、发展和区域内化,后者主要是日本拉拢印度与中国开展地缘博弈的局面。由此,中国既要分析日本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势和特色,

① 楼春豪:《“亚非增长走廊”倡议:内涵、动因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73页。

② 宋海洋:《印日“亚非增长走廊”评析》,载《学术探索》,2021年第11期,第66页。

③ 王春燕、郭建伟:《“印太”战略下印度对华“经济脱钩”行为分析》,载《南亚研究季刊》,2021年第3期,第35页。

④ 李益波:《印度东北部地区:日本在深耕》,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17期,第36页。

更要警惕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带来的风险。

日本的实践给中国带来了次区域合作经验,但也时刻提醒着,中国需要警惕风险。

1.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制度重叠和竞争

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看,这将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形成挑战,进一步强化制度重叠和竞争的特征,同时要求中国创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内容和方式。因地缘政治博弈大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日本主导建设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与中国主导建设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形成重叠和竞争态势,强化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制度重叠和竞争的特征。湄公河委员会(MRC)秘书处首席执行官哈达(An Pich Hatda)指出,合作机制的重叠是不可避免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协调机制,保障各合作机制的共同努力得以落实。^①已有的各种合作机制相互叠加,形成湄公河次区域的机制网,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涵盖交通、能源、环保、旅游、电信、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发展、农业和农村发展、经济走廊与城市发展等领域,这与中国主导的澜湄合作机制(LMC)、日本——湄公河合作和美国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LMI)等产生重叠,进而引发竞争局面。如何在竞争的局面中,做出更大的成果,吸引湄公河五国积极参与,成为难题。

2.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创新的挑战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面临两种挑战:一是供给低效或无效。这一点与制度重叠与竞争问题是共生关系,相同或类似领域的制度过多导致区域公共产品叠加或重复供给,进而产生低效甚至无效供给的问题。二是创新供给。日本在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已逐步从项目制供给过度到寻求规范认同供给,这对中国如何创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内容提出了参照和思考。

在具体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中,将有三重路径加以提升:第一,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形成与中老铁路相互辉映的铁路建设局面,既能形成示范效应,更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互联互通。第二,创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内容和方式,深刻挖掘湄公河五国的共同需求,形成需求基础上的供给,做到供需匹配和方式升级。第三,从面临日印围堵的现实看,中国应保持冷静,对日印合作持悲观态度,同时在经济走廊建设中加快践行区域命运共同体理念。

(汪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State of the Basin Report 2018”,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https://www.mrcmekong.org/assets/Publications/SOBR-v8_Final-for-web.pdf (2021年12月21日访问)。

舆论、制度、文化

——安倍执政下日本军事扩张的路径分析

王永望

内容提要 二战后,重建军事力量成为日本右翼势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日美军事同盟逐渐以牵制中国为指向。特别在安倍执政期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从“专守防卫”转向有条件的“先发制人”等,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倍政府通过舆论公关、制度形塑以及战略文化重构等多种手段,推动日本军事力量快速发展。鉴于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行和战后并未真正反省,其军事动向的变化值得警惕。因此,有必要对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军事发展的意图、动向、路径等进行考察,以更好地理解日本国家安全政策演变的逻辑。

关键词 安倍政权 军事动向 舆论逻辑 制度形塑 战略文化

一、问题缘起

战后,日本的军事动向受到外界关注。“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曾走过一条不断以武力手段向周边国家扩张的道路,”^① 这使整个世界对其战后的军事发展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尽管战后日本也采取了一些诸如通过禁止向海外派兵决议的实际行动,但事实上日本整个国家和社会对军事正常化的讨论和准备从未停止。从战后初期对再军备的努力到冷战后多次将自卫队派出国门,日本的军力建设一直在向前推进。

1950年日本正式组建“警察预备队”,“1954年防卫二法(《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颁布后,又以‘自卫’名义组建了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建立起正式军事力量。”^② 1991年,以支援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名,自卫队将扫雷艇开进海湾,实现自卫队正式走出国门。“1992年6月15日,日本国会强制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案》(简称‘PKO’

① 华丹、钟平黎:《军事扩张或和平通商:日本近代以来国家发展道路之争》,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05-108页。

② 方珂:《战后日本军事现代化历程及展望》,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93-100页。

法案),为自卫队通过联合国框架参加军事活动提供了合法性保障。”^①此后,自卫队又陆续参与了莫桑比克、卢旺达、戈兰高地、阿富汗等地的救灾行动或军事行动。2003年,作为美国“自愿联盟”的一部分,自卫队被派往伊拉克,这是日本军事力量自1945年以来首次被派往交战区。2005年,日本防卫厅正式确立起以联合作战体制为重点的体制编制,让自卫队拥有了更强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

尽管安倍之前的日本政府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总体变化并没有突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框架,也没有脱离日本国宪法的限制。然而,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的军事发展普遍被认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12年,再度执政的安倍更强势地推动日本军事转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和平宪法”架空,其上任还不到两年,就在内阁通过决议实现了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为日本军事扩张扫除了最主要的障碍。^②

鉴于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种种劣迹,考察安倍政府上台以来的日本军事扩张路径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的军事扩张意图,把握发展动向,进而更好地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一是舆论逻辑,即安倍政府为扩张本国军事所采取的舆论公关逻辑为何;二是制度形塑与拓展,即安倍政府为推动军事扩张进行了哪些制度安排;三是国家战略文化层面,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强大的反军国主义规范长期影响着日本的文化环境。然而安倍上台后这一情况正快速发生转变,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安倍军事扩张的舆论公关逻辑

1. 周边威胁

(1) 朝核威胁

朝鲜作为日本唯一未完成战后处理和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近邻,在日本的军事转型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06年,安倍刚一上任就针对朝鲜核试验问题做出强烈反应,谴责朝鲜违反《平壤宣言》和《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给日本和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威胁,同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18号决议对朝鲜进行制裁。

在国际上,安倍借参加国际会议及与各国领导人会晤的机会,反复论述朝鲜发展导弹和

^① 李东松:《冷战后日本不断朝“军事大国”迈进——以自卫队海外派遣为视点》,载《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28期,第138-139页。

^② 郁志荣:《“新安保法案”为日本军事扩张铺就法律通道》,载《军事文摘》,2015年第23期,第17-20页。

核武器对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威胁。在国内,安倍以“人质问题”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问题”为抓手,不断激起民众对朝鲜的敌对情绪。在其施政报告中,安倍多次强调:绑架问题是事关我国国家主权、国民生命和安全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日本与朝鲜就无法实现邦交正常化。直到所有受害者家属用自己双臂拥抱亲人的那一天,我的使命才结束。^①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有核武器攻击记忆的国家,安倍的“朝核牌”打得可谓得心应手。

(2) 中国威胁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断定中国会成为新对手和新威胁,主张要采取一系列手段遏制中国崛起。在此背景下,“中国威胁”不断被炒作,各种版本的威胁论层出不穷。日本虽不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却是坚定的追随者。

日本长期热衷于建构和传播“中国威胁论”。其中,“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是日本政府的话语主线。安倍为扩张军事力量所杜撰的“中国威胁论”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称中国军队的编制、武器配置、军费用途等缺乏透明性;二是称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区域试图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对日本的安全环境和生存环境造成了威胁;三是谬言中日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相似,尽管贸易往来密切,但最终难免一战。^②

安倍上台以来,不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社会,“中国威胁论”都是其舆论公关的主要抓手。可以看到,在日本国内不论是政府正式文件还是民间媒体报道,对涉及中国的部分都习惯性地渲染中国威胁,以例为日本的扩张性军事政策背书。

(3) 俄国威胁

2014年8月,日本内阁通过新版《防卫白皮书》对日本周边国家的军事发展展开了详细分析,除了中朝威胁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指出“俄罗斯军队在日本列岛周边的活动日渐频繁,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③这是安倍政府上台以来“俄国威胁论”在日本官方文件中的首次呈现。

在长期宣传诱导下,安倍政府在国民中成功地刻画出了“俄罗斯威胁”的印象。2018年日本的舆论年度调查显示,“高达78.8%的受调查者认为俄罗斯不友好,仅有17.7%的人对俄罗

^① 北朝鮮による日本人拉致問題, <http://www.rachi.go.jp/>, (2021年6月8日访问)。

^② 《安倍为解禁找借口热炒“中国威胁论”》,中工网, <http://military.workeren.cn/268/201405/16/140516134424984.shtml>, (2021年6月10日访问)。

^③ 《日媒称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抛出俄罗斯威胁论》,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806/c1002-25413429.html>, (2021年6月11日访问)。

斯怀有好感。而且从 2011 年到 2018 年,对俄罗斯表示反感或憎恶的比例一直徘徊在 74.8% 至 82.9% 之间的高位上。”^①“俄罗斯是敌人”、“俄罗斯实际不可信任”之类的言论频繁出现在日本媒体及民众间。

除了中朝俄威胁,安倍政府与韩国在竹岛问题上同样你来我往,相互攻防,它们的关系也因此被外界形容为“距离遥远的近邻”。^②可以说,安倍政府为了发展军事力量,对周边环境的炒作已经到了凡是邻居均为“现实威胁”的程度。

2. 同盟纾困

二战后,日美之间的非对称依附同盟关系使日本长期面临着同盟责任分担和国家安全自主性的问题。最初日本以邻国及国内民众反对为由拒绝美国提出的发展军事力量、分担防务责任的要求,当时美国由于自身实力依然处于鼎盛期,便默许了日本的“搭便车”行为。^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新兴国家、全球性问题以及国际权力结构快速转移等多重因素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断发起挑战,逐渐走下坡路的美国要求盟友分担责任的声音再度高涨起来。

2009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和日本民主党在国内大选中的胜利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的矛盾。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经上任便着手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在美国外交政策全面转向亚太地区的背景下,作为铁杆盟友的日本被要求在财政、防务、风险等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同年,日本民主党走到日本政治台前,包括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在内的民主党领导人公开表示,希望调整日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建立一个含蓄的亲中远美的新“东亚共同体”。这一行为迅速激怒了白宫,美国迅速出手,迫使鸠山不久后下台。美国的激烈反应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加剧了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被抛弃”和“被困联盟安全困境”的担忧。一方面人们担心与美国分歧过大会被美国抛弃,另一方面又担心与美国联系过密会导致自主性丧失而被美国拖入险境。于是,如何增强本国战略自主性再次成为日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④

2012 年安倍第二次上台,日美关系的变化迅速成为其扩张军备的借口。对外,安倍一方

① 王海滨:《俄日关系的进展与限度》,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57-76 页。

② Elena Atanassova-Cornelis, “Foreign Policy Instruments and Factors for Policy Change: Japan's Security 'Normalisation' Reconsidered”,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0, Vol. 38, No.2(2010), pp. 279-306.

③ 杨扬:《责任分担与美日同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 年第 4 期,第 1-14 页。

④ Yasuhiro Izumikawa, “Explaining Japanese Antimilitarism: Normative and Realist Constraints on 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2 (FALL 2010), pp.123-160.

面迎合美国的要求,积极要求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另一方面又以美国压力为借口搪塞周边邻国。对内,安倍抓住民众担心被美国绑上战车的心理压力,声称发展军事是为了增强本国的战略自主性。为了消弭国内反对派的反对声浪,安倍政府甚至提出了所谓“必须”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八个事例进行辩论(如图1),通过民主的名义既堵了反对者之口又照顾了美国的面子。在安倍的第二任期内,来自盟友的压力非但没有成为其制定扩张性军事政策的困扰,反而成了重要推力。

-
- 1 保护救援日本人的美国运输舰
 - 2 保护遭受武力攻击的美国运输舰
 - 3 强制性停船检查
 - 4 拦截经过日本上空飞往美国的弹道导弹
 - 5 在“有事”状态下,保护负责弹道导弹的发射警戒的美国军舰
 - 6 美国本土遭受武力攻击,保护在日本周边活动的美国军舰
 - 7 在战斗状态下在海上交通线执行扫雷活动
 - 8 参加各国共同保护民间舰船的活动

图1 安倍政府设想的“八个案例”

资料来源:“日本解禁的集体自卫权到底是什么”,日经中文网,<https://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politics/society/9966-20140702.html>,(2021年6月8日访问)。

3. 国际义务

日本军事扩张的最大特征就是“隐形进取”,即在分担“维护和平”、“人道主义救援”、“海上搜救”等国际义务的理由下潜移默化地展开。长期以来,历届日本政府都将履行有利于自卫队扩张的国际义务视为发展军事力量的主要突破口,对于决心要在军事建设上做出重大转变的安倍政府更是如此。

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渲染时局严峻性,强调日本自卫队在“维护和平”、“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一直是安倍政府的主要内容。借着国际义务的幌子,自卫队不断被派往世界各地,援助人数不断增加,援助领域不断扩大,援助机制不断体系化。

总体来看,安倍政府为了让日本的军事扩张获得合法性,采取了以周边安全威胁为主要托辞,辅之以应对盟友压力和履行国际义务的舆论话术公关方式,以此巩固其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军事力量的合法性(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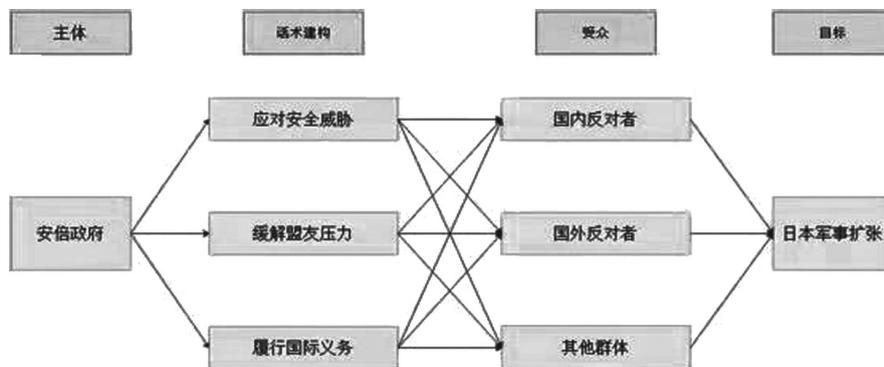


图 2 安倍政府军事扩张的舆论公关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安倍军事扩张进程中的制度形塑

摆脱战后体制、追求国家“正常化”并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是安倍执政的终极目标,而军事扩张则是其选择达成目标的主要方式。自上台以来,安倍政府动作频频,不断通过修法、建制等实际行动突破日本军事发展的制度性限制。

(一)国内军事制度形塑

1.法律修订

(1)“和平宪法”再解释

日本为推动自卫队走出国门而修订法律的历史可追溯到海湾战争时期,海湾战争爆发第二年 6 月,日本国会就先后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国际紧急救援队法”和“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海外派兵法”。此后,日本又先后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2001 年)、“自卫队法修正案”(2003 年)、“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2003 年)、“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2003 年)、“武力攻击事态因应法案”(2003 年)、“对付恐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2003 年)等系列法规,为派兵海外确立了相当的法理根据。^①安倍第二次执政

^① 《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日本“借口哲学”有无尽头?》,国际纵横, <http://news.cri.cn/gb/321/2004/04/03/762@118024.htm>,(2021 年 6 月 28 日访问)。

期间,自卫队修法实现了质的跨越,对限制日本军事发展的法令做出了最为根本性的改变。

战后,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主持下,日本修订了“和平宪法”。其核心第九条规定:一、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二、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条款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日本几十年的和平发展道路。然而,即使“和平宪法”确保了战后日本国家社会发展的和平环境,它却从未被日本右翼势力认可。

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性人物,安倍多次公开强调战后日本宪法是美国占领当局强加的,它既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国际惯例,“第九条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宪法)条文的典型,应立足于保卫日本和为国际做贡献的观点予以修改。”^①因此,首次出任首相的安倍就将完成宪法修改列为其任内的重要目标,2012年重返政坛后,又大张旗鼓地继续其修宪大业。然而,日本的宪法修改与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严格的门槛,“和平宪法”第九十六条对宪法修改给出了如下公式:

本宪法的修订,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由国会动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此种承认,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选举时进行的投票中,获半数以上赞成。

宪法的修订在经过前项承认后,天皇立即以国民的名义,作为本宪法的组成部分公布。

也就是说,“日本国宪法的修改,首先要得到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赞成才能提出修宪动议,其次还要得到国民过半数的赞成。”^②安倍认为这一门槛过高,如不进行更改将无法对宪法做出关键性改变。

基于上述考虑,安倍提出“应该(将提出修改宪法动议的条件从现行的众参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同)修改为二分之一。即使五成以上的国民想修改宪法,超过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就能阻止(修改)是不正常的。”^③然而,这一举动很快也遭到了民众、其他政党甚至联合执政党的强烈反对,意识到对宪法第九条和第九十六条直接做出改变将面临巨大挑战后,安倍迅速改变了修宪策略,转而寻求通过“重新解释宪法”的方式谋求实现修宪目标。

2013年2月,安倍重启“安保法制”专家恳谈会,为重新解释宪法做准备,12月出台变更

① 张伯玉:《从安倍修宪目标的调整与转换看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可能性》,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12期,第48-51页。

② 张伯玉:《从安倍修宪目标的调整与转换看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可能性》,第48-51页。

③ 同上。

宪法解释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试行草案;2014年6月,正式向自民党、公明党提交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内阁决议案的最终版本。2014年7月1日,日本正式通过有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的决议案,^①提出“武力行使新三要件”。这一系列动作终使日本集体自卫权实现了解封。

(2)新“安保法制”构建

通过“重新解释宪法”的方式实现集体自卫权解禁后,安倍政府为完善集体自卫法律基础又进行了“安保法制改革”。2015年5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将“新安保法案”提交国会审议,7月16日和9月19日,法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获得通过(如表1)。2016年3月,内阁会议正式批准法案实施。新安保法案由《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与《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两部分法案组成,其中《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是新立法案,《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则是在修改原安保相关法案基础上形成的。新安保法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事法制”相关法、“日美防卫合作指导”相关法和海外派兵相关法等三套安保法律体系。

表1 日本“新安保法制”构成

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
1.自卫队法
2.国际和平合作法
3.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
4.船舶检查活动法
5.事态对应法
6.美军等行动相关措施法
7.特定公共设施利用法
8.海上运输规制法
9.俘虏待遇法
10.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
新设法案
国际和平支援法

资料来源:内閣官房,<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pdf/gaiyou-heiwaanzenhousei>,(2021年6月13日访问)。

首先,对于“有事法制”相关法。新安保法中“有事法制”对原“有事法制”相关法律中的五部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存亡危机事态”概念,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指“发生针对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的武力攻击事态,并因此威胁到日本的存亡;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

利存在被彻底颠覆的明显危险的事态”。这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支持。其次,对于“日美防卫合作指导”相关法。新安保法用“重要影响事态”取代了“周边事态”的概念,极大地释放了自卫队的活动空间。最后,关于海外派兵相关法。新安保法扩展了自卫队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国际紧急救援活动的内容。尤其是此次唯一新立法的《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提出了“国际和平联合应对事态”的新概念,改变了日本以往在海外派兵问题上“一事一立法”的做法,因此也被外界称为日本海外派兵的“基本法”。^①新安保法案通过后,日本自卫队拥有了根据需要随时向海外派兵,提供弹药支援,使用武器以及出动警卫力量等权限。至此,“和平宪法”被这一套系统性的新法案完全架空,日本军事发展的法律性障碍正式消除。

新安保法案通过后,安倍仍未就此停止其修法进程。2017年4月,安倍在读卖新闻社的一次专访中又明确提出他的“修宪时间表”,表示应该以2020年日本奥运会为契机正式实施新宪法,并指出应在宪法中“载明自卫队”。^②2018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2019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和“2019—2023年度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提出了更具主动性、扩张性和进攻性的防卫政策。^③此后,安倍政府继续追求“自卫队合宪化”,并将此视为防卫之根本。

纵观安倍执政几年,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解禁集体自卫权,国防预算连年增长,军事力量不断扩张,推动日本迈向世界军事大国的愿望逐步实现。

2.体制构建

(1)升格防卫厅为防卫省

安倍第一次上台就通过相关法案将原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以下简称“防卫省法案”),此前日本防卫厅不论在级别还是人员构成上与外务省等机构相比都处于“低位”,这对日本军事发展来说是一种制度性限制。然而,日本通过“防卫省法案”后,防卫厅地位迅速升格,原防卫厅长官也升格为防卫大臣。

防卫厅升格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改变了日本防务机关的组织架构及权力结构。原本防卫厅为局级单位,直属于内阁府,其长官是内阁成员。升格之后,防卫省成为部

^① 《详解日本新安保法案》,人民网,<http://japan.people.com.cn/n/2015/0716/c35469-27315023.html>,(2021年7月16日访问)。

^② 徐万胜、王宗杰:《论宪法第九条与日本安倍修宪路线的演进》,载《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2期,第111-121页。

^③ 薛军、袁杨:《日本新军事扩张倾向的历史考察》,载《军事历史》2019年第3期,第121-124页。

级单位,防卫厅长官升级为“防卫相”,防卫部门的整体权力得到提高,军队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其次,自卫队的角色、职能等发生了变化。“防卫省法案”将原《自卫队法》中属于“附加任务”的内容转为了“基本任务”,这意味着自卫队“专守防卫”的角色已经改变。最后,这大大促进了自卫队相关法律及“和平宪法”的修改。防卫厅的升格强化了日本的国家安保体制和危机管理体制,使原防卫架构内的相关法律不再适用,相关限制性法律需要修改,更具扩张性的法律将被催生出来。

(2)挑战“文官优位制”

战后,日本吸取“军部统治”的历史教训,效仿西方国家确立起了“文官治军”的“文官统治体制”,并将之作为长期遵循的国防基本政策。“文官统治”实质是“文官优位制”,即在防卫政策、战略方针、军事力量运用、建设规划等方面文职官员(又称“西服组”)相比于军职官员(又称“制服组”)享有绝对优势。

然而,安倍上台后这一制度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2013年年初,安倍内阁设立“防卫省改革检讨委员会”,委员会于8月提出《防卫省改革的方向》报告。2015年6月10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修订法》,^①该法规定“制服组”从军事角度辅佐防卫大臣,“西服组”从政策角度辅佐防卫大臣,双方在向防卫大臣建言时享有同等地位,废除负责自卫队作战行动的防卫省文职部门“运用计划局”,将其职责合并到“统合幕僚监部”。^②这些更改使自卫队文职官僚相对于军职官僚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西服组”对“制服组”的制约开始松动,军职官员权力迅速扩大。

(3)成立“国安会”

2013年12月4日,被人们称为日本“国安会”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挂牌。该“会议”以内阁总理大臣(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的“四大臣会议”为中心,讨论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③如有需要,还可让财务大臣、国家交通大臣等内阁成员参与进来,组成“九人会议”。

2014年1月,安倍政府又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下新设执行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这一以首相官邸为中心的新机构,负责日本中长期安全战略的制定,分析并策划起草外交、防务

^① 《日本“文官统治”制度走向终结》,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lxx/yysf/201512/t20151208_2754761.shtml, (2021年6月10日访问)。

^② 江新风:《日本军情解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

^③ 同上。

和反恐等方面的情报工作。”^①其下又设“总括”、“战略”、“信息”、“同盟·友好国”、“中国·朝鲜”以及“其他地区”六个具体部门,对日本的安保事务进行具体处理。

日本“国安会”的成立打破了以往官僚决策主导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局面,使日本防卫事务的决策权迅速集中,为自卫队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保障。

(4)改革自卫队编制

2018年3月28日,安倍政府成立“陆上总队”,将原陆上自卫队相互分离的5大分队指挥权统归于“陆上总队”之下(如图3),同时增设专门负责处理岛屿防卫与登陆作战的“水陆机动团”。这一改变是日本自卫队成立6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架构重整,它意味着陆上自卫队的指挥权实现了“一元化”,原本相互隔离的各个部队拥有了总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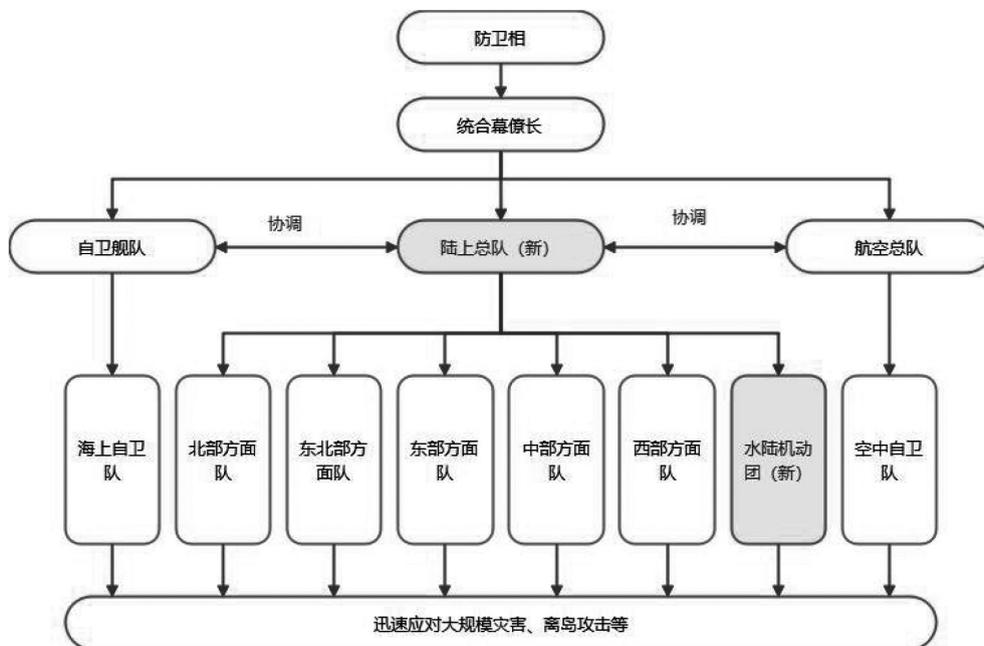


图3 改革后的日本自卫队组织架构图

资料来源:(変わる安全保障)「陸上総隊」が発足 5方面隊を一元指揮、朝日新聞、2018年3月28日、<https://www.asahi.com/sp/articles/DA3S13423408.html>,(2021年6月15日访问)。

从国内制度形塑的角度来看,从升格防卫厅到挑战“文官优位制”、到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再到成立“陆上总队”,日本已经构筑起一套完整的军事发展制度,军队的权力实现了极大的集中。

^① 刘哲民、石宏:《战后日本军事力量发展评析》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版。

(二)国际军事安全合作机制构建

军事安全合作是国际关系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历来受到各国的重视。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军事合作的主要对象一直是美国及其盟友,安倍上台后,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双边或多边军事互动机制,扩大了日本军事合作的范围。

1.双边机制

安倍执政后,日本的双边军事合作实现了快速发展。首先是日美军事同盟强化。2014年10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改中期报告,指出:“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自卫队在“平时”、“灰色地带”、“战时”三种情况下都要与美军开展“无缝隙”合作与支援。2015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强调了两国在全球军事行动中应采取“无缝隙、强有力及灵活有效的双边应对措施”,双方还建立起了固定的人员交换机制和双向资源流动机制。^①2019年,两国又将网络攻击纳入《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在原有网络安全合作程序基础上,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安全的全方位“无缝合作”。^②安倍第二任期内,日美同盟正式突破原有法律限制,在法律层面由区域性同盟升级为全球性同盟,适用地域范围由日本本土及其周边扩张至全球各地。”^③

其次是提升日澳间安全合作水平。2007年3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东京签署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约定两国此后定期举行“2+2”安全保障磋商会议,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式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与日本构建“2+2”战略对话机制的国家。迄今为止,双方已经举行了九轮“2+2”战略对话会议。2019年11月,日澳又确定了两个人员交流事项:一是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中设立澳大利亚陆军联络官,二是在日本防卫装备厅与澳大利亚国防部科技部门间设立一个国防科技人员交流项目。^④

最后是深化日印安全合作领域。21世纪以来日印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快速发展。2010年7月,两国外交部门和防务部门首次“2+2”副部长级会晤在印度举行。^⑤2012年12月,安倍刚上任,莫迪就与其通话,建议“进一步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加强

① 熊李力:《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美日同盟发展态势》,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年第6期,第8-16页。

② 江天骄:《美日网络安全合作机制论析》,载《国际展望》2020年第6期,第127-145页。

③ 熊李力:《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美日同盟发展态势》,第8-16页。

④ 唐奇芳:《日澳安全合作:“四边机制”的隐藏指针》,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2期,第18-20页。

⑤ 张光新、徐万胜:《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问题探析》,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第91-109页。

安保和外交领域的合作”。^①“2014年,莫迪访问日本,双方发表《日印特别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宣布促进双边海上军事联合演习机制常规化。2015年12月,安倍访问印度,两国正式签署关于防务装备、技术转让与情报合作的《关于防务装备和技术转让的协定》和《关于保护机密军事情报安全措施的协定》,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②2019年11月,日印副部长级“2+2”战略对话机制正式升级为外交防务部长级对话机制,安全合作程度进一步提升。

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互动机制可谓是日本对外军事安全合作的支柱。除此之外,日本还与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建立了“2+2”高级战略对话机制,从“2+2”战略对话机制的构建来看,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对外双边军事合作机制增长显著(如表2),自卫队的军事活动范围不断拓展。

表2 日本对外军事合作机制之“2+2”战略对话机制

时间	国家
1990年12月	日——美
2007年3月	日——澳
2010年7月	日——印
2013年11月	日——俄
2014年1月	日——法
2015年1月	日——英
2015年12月	日——印尼

资料来源:防衛省·自衛隊「各国との防衛協力・交流」、<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1591426/www.mod.go.jp/j/approach/exchange/area/index.html>,(2021年7月15日访问)

2. 多边机制

在双边军事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安倍政府还积极参与设计了与相关国家的多边军事合作机制,构筑起了日美澳、日美印、日美韩、日美印澳等多边军事合作制度框架,进一步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打下了基础。以“日美澳防卫合作”三边机制为例。这一机制主要由“三边战略对话”与“亚洲安全峰会期间日美澳三方会谈”组成,通过会议确定三方在防务领域的互动边界与协调内容。安倍第二任期以来,日美澳三方又将朝核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网络安

^① 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とシン・インド首相との電話会談」(2012年12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2/121228_02.html,(2021年7月6日访问)。

^② 张光新、徐万胜:《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问题探析》,第91-109页。

全问题等纳入会议议题。在 2017 年的对话中,三国首次就“美日澳情报共享协议”相关事宜展开讨论,并以协议为基础,就实现“能力构筑·支援”等议题达成共识。在 2018 年的对话中,针对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三国再次确认了致力于通过三国协调维持区域秩序的基本路线。^①

“日美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四边机制是日本对外军事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拓展。该机制的雏形源于 2004 年印度洋海啸,最初主要是灾后日美印澳四国联手开展救灾和重建工作的机制。时值安倍第一次上台执政,于是他抓住机会提出所谓日美印澳“菱形同盟”(或“钻石同盟”)构想,但由于当时四国战略联手动力不足,这一构想最终昙花一现。201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11 月美版“印太战略”出炉,四边机制得以复活。此时的四边机制已然带着浓烈的地缘竞争和意识形态色彩,不仅在防务上强调全面的军事合作,在经济、外交等领域同样全面深化。

除了积极推动构筑日美澳、日美印澳等三边或四边军事合作机制之外,安倍政府还积极推动“日本——东盟防务合作倡议”等涉及军事合作的多边合作框架,通过一系列军事合作将日本的军事力量不断推向世界。

四、军事战略文化重构

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文化氛围长期受限于强大的反军国主义文化规范,军备扩张行为被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举动。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局势的变化加速了日本当政者对日本国家身份的认知转变,最终使整个日本国内的战略文化氛围开始由和平主义文化转向安全文化,这种整体性的战略文化促转带来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相信日本的安全环境已经非常恶劣,进而开始将作为国家发展关键支柱的正常军事力量建设视为应然。

(一)战后日本的国家身份认知与军事战略取向

国家身份定位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国家行为的指南,其变化过程是理解国家发展的关键线索。^②冷战时期,各国根据自己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身份定位分属两大阵营。冷战后,各国又根据自己的国家身份定位,迅速调整位置,在国际上或是相互合作,或是相互竞争。

^① 贺延宇:《“美日澳防务合作”新动向的三维分析》,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19 年 6 月,第 15-18 页。

^② 李开盛:《理解中国外交(1949-2009)——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家身份探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战后日本对本国的身份定位是其国家战略文化以及国家行为选择发生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根据肯尼斯·派尔、迈克·望月、理查德·J·塞缪尔斯、平田惠子等学者的研究,影响战后日本国家身份认知的意见领袖大致可分为和平主义、重商主义、正常主义和民族主义四个派别,这些派系间的相互平衡决定着日本的国家战略、战略文化以及行为选择(如表3)。

表3 日本国内主要派别意见领袖的国家身份定位与关键议题意见

派系	意见领袖主要来源	国家身份定位	关键议题意见
和平主义	社会民主党;日本共产党; 宪法更新论坛;九条会	促进世界和平的和平主义国家。	日美关系:日本要避免卷入美国的战争; 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强化非安全领域的竞争; 宪法修改:保留第九条; 15年战争中的日本角色:日本是一个侵略者,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的制裁,反对政府参拜靖国神社; 自卫队角色:自卫队不应扩张其权力和职能(1994—2006),自卫队违宪(2006—)。
重商主义	自民党:平成研究会、宏池会、近未来政治研究会等;日本民主党	对国际社会作出非军事贡献的国际经济力量。	日美关系:重点强化非安全领域的往来,依靠美国安全网; 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强化非安全领域关系; 宪法修改:意见不一; 15年战争中的日本角色:日本是一个侵略者,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的判决、反对政府参拜靖国神社; 自卫队角色:赞成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但反对自卫队参与联合国以外的国际安全事务。自卫队的活动只能在PKO法案规定范围内展开。
正常主义	自民党:清和政策研究会、平成研究会、为公会、自民党早期政策科学研究机构等;日本民主党;外务省;日本会议	一个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时行使经济、军事权力的,为国家安全做出贡献的“正常国家”。	日美关系:强化安全、非安全领域的竞合; 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改善与邻国关系,面对中国崛起和朝鲜核发展,要在军事上做好准备; 宪法修改:修改第九条,明确自卫队的存在、职能以及确认集体自卫权; 15年战争中的日本角色:日本是一个侵略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决定以及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意见不一; 自卫队角色:应该扩大权力和职能以强化日美关系和为国际集体安全做贡献,应行使集体自卫权但不拥有进攻性力量。
民族主义	自民党:近未来政治研究所、清和政策研究会、志帅会等	一个军事强大、坚定自信,自豪于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	日美关系:意见不一,多数认为要摆脱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强加给日本的政治秩序; 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抛弃“叩头”外交; 宪法修改:修改第九条,提升军备力量; 15年战争中的日本角色:日本是一个自卫者,拒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决,日本政府应在战争结束周年纪念时参拜靖国神社; 自卫队角色:应极大地扩张,拥有核力量,追求进攻性能力。

资料来源:Keiko Hirata. Who Shap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Debate? Divergent Interpretations of Japan's Security Role.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Fall, 2008, Vol. 35, No. 3,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Fall, 2008), pp.123-151.

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平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占据着日本战略文化的话语高地,强大的反军国主义规范在日本国内根深蒂固,正常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仅在小范围内有所动作。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政坛和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正常主义派系的政治人物迅速掌握了日本政坛话语权。而随着正常主义派系主导地位的确立,日本国内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的影响也迅速壮大起来,给日本政治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从平田惠子等学者的研究中也发现,长期掌权的自民党内部,其右倾化趋势也愈发明显,被人认为是典型的偏民族主义的正常主义者安倍,在首次出任首相时就发誓要恢复日本“一流国家”的地位。第二次出任首相时,更宣称“将重建一个强大的日本,强大得足以做更多的事”。^①

(二)安倍政府对日本军事战略文化的重构

安倍政府对日本国家身份的定位是其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改变日本国内战略文化氛围的主要原因,为此,他做出了以下两个层面的努力:

1.领导层军事战略文化调整

战后在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强烈影响下,日本的国家战略长期趋向于重商主义。但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局势发生巨变之后,这一战略倾向逐渐被日本国内批评为“一国和平主义”,是“消极的和平主义”、“被动的和平主义”,要求将这一战略路线升格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能动的和平主义”的声音日渐增大,诸如综合研究机构(NIRA)、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日本国际论坛、世界和平研究所等日本国内智库研究所纷纷先后提出了自己的“日本新和平主义”论述。

安倍第二次上台后就提出了明确的“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指出日本政府的外交和安保方针是“站在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的和平主义立场上,要比以往更积极地参与到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定与繁荣之中”,^②并在多个场合多次阐释和强调其“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和内涵。

2013年12月17日,日本通过了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中,安倍内阁正式以政府方针政策的形式规定要“从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努力实现我国安全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更进一步为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及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作为安倍内阁国家安保战略思想的核心文件,其核心观点的“积极

^① 李文、韩秋韵:《多极化时代的日本国家定位》,载《日本学刊》,2016年第1期,第50-69页。

^② 孙承:《日本国家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和平主义”也正式成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理念。由此,战后日本的领导层军事战略文化在形式上最终完成了从“吉田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转变。

2. 社会层面的国民教育改革

1945年8月日本战败,鉴于战前“军国主义”、“皇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民主化改革。在教育领域,相继下达教育改革“四大指令”。1947年3月31日,日本首部《教育基本法》诞生,这标志着否定“忠君爱国”,强调“主权在民”思想的民主教育体制在日本正式确立。然而,这一构筑起日本社会和平文化的制度却在59年后的2006年被日本政府抛弃。

2006年下半年安倍政府开始了其极具争议的,旨在提高学生爱国主义水平的学校教育改革。2006年12月15日,在一片反对声中日本上议院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呼吁提高学生的“爱国心”和“公共精神”教育,提倡创造一种“尊重传统和文化并热爱促进传统和文化的民族和家园的态度”。2013年1月,安倍政府重启未竟的“教育再生”工作,调整教育法律制定和课程结构,以促进国民更高的爱国主义。

安倍政府的教育改革使日本的教育发展发生了两个重大改变:一是教育行政中央集权化。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教育发展始终坚持着政治中立的原则,尽管政策的最终发出地都是文部科学省,但政策构想的来源是多元化的。一方面,文部省官僚在制定政策时要召开相关听证会、广泛参考相关机关、团体、审议会、恳谈会以及调查研究的意见,审议会等机构甚至还发挥着阻止政治介入的作用。另一方面,即使文部科学省的官僚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构想,事务次官、局长以下的职员也不必完全按照相关指示去完成,甚至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过去日本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允许反对派存在,反对派常常会对相关政策提出异议并行使否决权。然而在安倍教育改革之后,日本教育政策的发源地变成了首相及执政党掌控下的教育再生实行本部,文部科学省必须听从教育再生本部的意见,政策生成过程由原来的“自下而上”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模式,原本政策来源的多元化特征也消失,行使否决权的反对派陷于沉默,教育行政实现集权化。

二是教育内容渐趋军国主义化。安倍政府的《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将“战后在日本被视为禁忌的培养狭隘‘爱国心’作为教育目标,把‘爱国思想’和‘集体精神’纳入教育教学内容,明确将‘热爱祖国和乡土’、‘尊重传统和文化’等表述写入其中,‘颠覆’了《教育基本法》尊重

个性和自由的教育理念,使民族主义成为教育的核心价值。”^①许多学者认为在日本强调所谓的“爱国心”和“道德心”意义非凡,这是要“唤起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时代日本《教育敕语》印象的表现,是对二战前倡导效忠天皇的日本教育的缅怀,是对二战期间教育的回归。”^②再加上右翼势力的著书立说,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以及“爱国活动”宣传等,改革后的日本教育正逐步转向战前的军国主义教育。

可以说,安倍政府通过顶层战略文化重构、教育改革等手段已经成功地重新配置了日本的和平主义准则,日本的社会思潮正逐步右倾化。这一结果必然导致反军国主义规范在日本社会不断弱化,日本军事发展的规范性制约环境逐渐走向消亡,这个国家战略文化氛围由“和平主义”转向“安全”文化。最终,将使日本国内对政府军事扩张的行为由反对多数转向支持多数。

五、结 语

纵观整个安倍政府执政时期的日本军事发展,相比于技术性的军费增加和科技研发,系统性的制度形塑以及持久性的战略文化重构对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曾经的法西斯国家,日本给东亚国家带来的伤害是巨大而深刻的,如若任其发展,日本势必重返军国主义老路。对此,我们需客观理性、准确全面地把握日本军事发展的动向,制定合适的对策,以应对相关变化。

就当前环境来看,日本的军事扩张并非一帆风顺。在国际层面,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公然违背这一历史潮流的国家,都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抛弃;^③同时,日美同盟中美国对日本军事发展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一旦日本的军事力量发展超出美国的容忍限度,妨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必然会进行限制和打击;而且,日本还面临着在东亚邻国面前如何自处的问题。一直以来,深受日本侵略伤害的东亚邻居对日本的任何军事发展动向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日本如若重返军国主义老路必将引起周边邻居的反对,与周边国家为敌、将区域秩序拖入困境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① 罗朝猛:《日本“教育基本法”修订的历程、动因、内容及其争论》,载《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8期,第60-64页。

② 同上。

③ 华丹、钟平黎:《军事扩张或和平通商:日本近代以来国家发展道路之争》,第105-108页。

从国内层面来看。正如上文所说,日本国内自二战结束以来就形成了强大的反军国主义规范。过去,三股组成反军国主义联盟中坚力量的势力相互合作,左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一是以日本共产党等左翼和平主义者和信仰和平主义哲学的学者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者团体否认军队的作用,否认使用武力作为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支持日本彻底裁军,要求废除美日同盟,支持对日本使用武力所采取的法律限制;二是反传统主义者。部分学者将战后的日本政治描述为传统主义者和反传统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传统主义者强调要恢复日本的价值观,如服从和尊重权威等,而反传统主义者则将维护日本的自由民主作为核心任务,认为政府采取积极安全政策就是滑向军国主义传统,因而对政府的积极安全政策持反对意见;三是担心日本被绑上美国战车的群体。长期以来,日本公众对日美同盟有着复杂的心理,两国之间的战略错位使许多日本公众担心跟美国走得过近会使日本被迫绑上美国的战车,尤其是当美国采取激进战略的时候,类似的恐惧感更强。当日本公众面临的这种恐惧加大时,他们就会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难以采取积极的安全政策。^①

鉴于日本军事扩张的迹象以及反对者的反应,我们应努力争取相关和平力量,共同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瓦解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王永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Yasuhiro Izumikawa, “Explaining Japanese Antimilitarism: Normative and Realist Constraints on 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2010, Vol. 35, No. 2 (FALL 2010), pp.123-160.

战后日本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水平的 耦合性研究^①

肖康康 顾永昆

内容提要 文章基于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性的视角,对不同产业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对产业升级的差异性影响进行了分析。金融演化对集中使用金融资源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融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产生边际影响,最优金融结构下金融系统最大化促进经济增长。最优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阶段有关,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集中型、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发挥了金融资源的规模经济效应;随产业发展水平提高,产业风险增加,资金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也随之提高,市场型、分散型金融结构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更能与该阶段产业发展水平相匹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使日本产生金融缺口,导致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水平间的错配。日本的发展经验对后发国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日本 金融结构 产业升级 协同演进 耦合性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评述

(一)问题的提出

战后日本逐渐由后发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赶超型发展阶段、泡沫经济和经济转型期,^②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金融系统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发挥了不同作用,战后初期金融系统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了促进作用,但金融系统所存在的缺陷是引发经济泡沫及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③

为什么在战后初期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金融系统,会成为泡沫经济的推动因素?在“失去的20年”,尽管政府多次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仍然无法使日本经济走出萧条。自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政府先后采用了“金融大爆炸”、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质化宽松

① 本文是贵州省教育厅课题(编号2019YJZD4)的阶段性成果。

② 徐平:《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考察——兼谈赶超经济的体制性缺陷》,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3期,第3-22页。

③ 白钦先、高霞:《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金融支持政策分析》,载《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2期,第1-11页。

货币政策以使日本经济走出萧条,但收效甚微。从结构层面探讨日本经济与金融存在的问题,可能为更深入了解日本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本文将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对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阶段耦合性问题进行分析,据此找出不同阶段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影响存在的差异及其原因。^①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推行的金融制度、产业政策在后发国家有一定代表性,日本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其它后发国家有可能面对同样的问题。目前中国正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处于变革之中,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结构演化

不同学者对日本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白钦先等认为日本不同产业发展阶段金融制度差异是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经济复苏与增长期金融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金融结构调整滞后成为日本1990年代之后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②王喆分析了政策性金融在日本不同产业发展阶段的重要作用。郑蔚等人的研究表明,二战后至今日本金融结构实现了从“外生管制型”、“集中型”、“银行主导型”到“市场型”、“分散型”的转变,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阶段变化是金融结构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③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产业发展阶段日本金融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产业发展水平提高时,原有金融结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求推动金融结构演化。金融结构演化是市场推动和政府主导的共同结果,在政府推动金融结构演化过程中,利益集团往往成为更高效金融结构形成的障碍,^④降低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形成“金融缺口”(financial gap)。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为研究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只有当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水平相适应时,金融系统才能最大化地进行资源配置;

① 现有研究文献从不同纬度对金融结构进行划分,本文金融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纬度:一是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比例;二是金融系统所组成的市场结构,主要指大银行与小银行比例;三是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程度。

② 白钦先、高霞:《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金融支持政策分析》,载《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3期,第21-25页。

③ 郑蔚、王思慧:《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变迁与转型:一个制度金融学的考察》,载《现代日本经济》2014年1期,第18-27页。

④ Rajan R G, Zingales L.,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 69(1), p.5-50.

反之,“金融缺口”出现,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产业结构升级受阻。^①金融结构演化存在路径依赖,利益集团对金融制度的维护导致金融缺口的产生与延续。

本文的研究利用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为日本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结构演化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并通过两者间的耦合性变化对不同阶段日本经济发展绩效差异进行解释。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本文利用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应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工具,对产业发展水平与金融结构间耦合性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利用日本的案例进行检验;(2)通过理论分析,对阻碍日本金融结构朝最优路径演化的因素进行分析,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做相关文献评述;第二部分为日本金融结构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历程分析;第三部分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水平耦合性分析;第四部分是金融缺口与日本经济萧条的分析;最后是政策建议。

二、日本金融结构演化与产业升级的历程

二战后日本经济遭到全面破坏,但在诸多要素的推动下经济保持了 20 多年的高速增长,至 1973 年以石油危机为转机经济增长开始减速,1980 年代中后期经济泡沫渐显并最终破灭,此后日本经济陷入萧条。^②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推行赶超型发展战略,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市场资源分配的职能,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次,不同发展阶段金融系统发挥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在高速增长时期,金融系统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促进作用,而到后期,金融系统反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阻碍。

(一)战后日本金融结构演化历程

1.由银行主导型向多元化融资结构的转变

在追赶型发展阶段,日本政府通过金融控制建立了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其特点包括:其一,银行在企业融资中发挥主导作用,股票、债券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受到抑制,日本特有的主银行制度进一步奠定了银行在企业融资中的核心地位;其二,大银行受益于金融政策享

^①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载《经济研究》2009 年第 8 期,第 45-49 页;张成思、刘贯春:《最优金融结构的存在性、动态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载《管理世界》2016 年第 1 期,第 66-77 页。

^② 徐梅:《战后 70 年日本经济发展轨迹与思考》,载《日本学刊》2015 年第 6 期,第 49-73 页。

有更高的地位,在信贷市场中存在一定的垄断性,保持了较高的银行集中度。^①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加强对金融系统的控制以提高金融系统服务于战时经济的需求,主银行制度得以形成,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增加了其资金聚集能力。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推出了以“非军事化”、“民主化”、“自由化”为目的的“道奇路线”,^②其目的是提高金融系统市场化程度,优先发展股票市场是其重要措施之一。但事与愿违,“道奇路线”执行后不久股票市场由于个人投资者大量卖出股票而下跌。为保证股票市场的稳定,政府放松了对机构投资者持股限制,银行持股比例迅速上升。1949年,银行持股比例仅为9.9%,至1964年,银行持股比例上升至21.6%,银行通过持有公司股份而对企业融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银行在企业融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道奇路线”下的市场化金融系统难以真正建立。

图1反映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日本银行贷款、股票和公司债券融资额占比变化趋势,银行贷款融资占比一直维持在70%以上,其中1975年高达91.2%,此后有所下降,至2000年银行贷款融资占比为73.9%。股票融资比例虽有所波动,但并没有趋势性的变化,至2000年股票融资占比为11.3%。始于1970年代后期的金融自由化使债券市场得以发展,债券融资在1985年开始出现了快速上升。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股权融资占比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与美国相比,日本仍然是以债务融资为主,其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③股权融资有利于企业降低财务杠杆,1970年代末期日本企业开始了持续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过程,1980年日本企业平均负债率水平是美国的5倍,至2007年负债率仍然为美国的2倍,^④日本股票融资占比相对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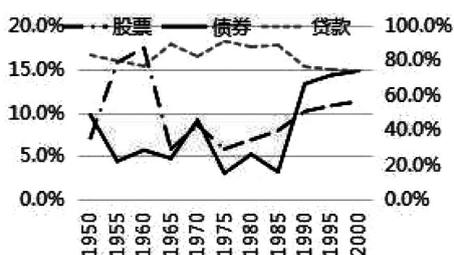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阶段日本非金融企业比例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日本银行资金流量表,经济统计年鉴。

① 于潇:《日本主银行制度演变的路径分析》,载《现代日本经济》2003年第6期,第42-46页。

② 莽景石:《宪政转轨与现代日本企业所有权安排的演化》,载《日本学刊》2008年第6期,第27-39页。

③ 赵治辉、刘西川、金雪军:《企业生命周期、要素密集度和金融结构变迁》,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14年4期,第1-5页。

④ 参见辜朝明:《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35页。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战后日本金融建立起银行主导、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1970年代后期金融自由化使金融结构向多元化融资过渡,股票融资、债券融资规模有所增加。但与具有发达的股票融资市场的国家相比,日本股权融资在融资结构中占比偏低,银行仍然是最主要的融资手段。发达的银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对股票市场的发展形成抑制,风险投资的发展由此受阻。

2.金融控制与宏观金融结构演化路径

金融控制到金融自由化的转变引起宏观金融结构的变化:其一,国债规模持续增长,2014年日本净债务水平达到了GDP的149%,远高于G7国家水平,并且在积极财政政策下,国债水平并无下降趋势;其二,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方式发生变化,由直接的行政干预向间接市场化干预转变,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日本金融结构的形成、演化路径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痕迹。战后初期,日本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准入设置门槛、利率管制等方式建立了“外生管制型”金融结构,形成了资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对市场的替代。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金融控制逐渐被金融自由化所取代。金融结构演化存在路径依赖,日本政府、企业和金融系统间存在的“铁三角”关系、主银行制度等对金融系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结构演化路径。

从宏观层面来看,对金融制度的顶层设计决定了金融结构的形成及演化路径。集中型金融结构发挥了金融资源规模经济效应,而分散型金融结构满足了融资主体差异化融资需求。追赶型发展阶段,由于资本稀缺,外生管制下建立的“集中型”金融结构保证了产业政策能够得到金融系统最大化支持,金融结构与产业政策相匹配。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政府对经济干预减少,金融控制向金融自由化过渡。

图2列举了日本和美国金融改革指数变化情况,该指数来自Abiad等人的研究(2005),^①指数由直接融资比例、信贷控制、准入门槛、金融改革力度、金融制度变革等一系列细分指标加权所得,指数在0-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金融自由化水平越高。由图2可以看出,日本金融自由化水平自1970年代末期有了持续性提高,但金融自由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① Abiad, Abdul, and Ashoka Mody. 2005. “Financial Reform: What Shakes It? What Shapes I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1): 6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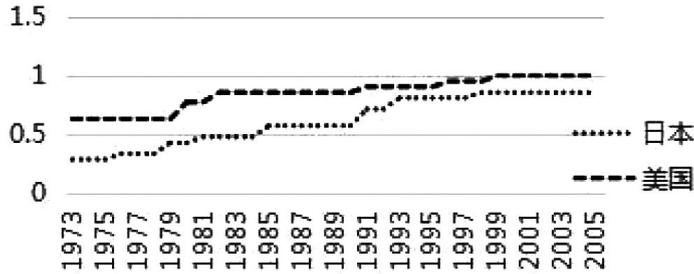


图2 日本与美国金融改革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Dataset 数据库整理所得。

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同时改变了政府金融资源获取与使用方式,由直接行政方式转变为市场化方式。战后初期,金融控制保证了政府所支持的产业能够获得低成本资金,金融自由化条件下,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获得金融资源使用权。用表示资本回报率表示实际利率,表示资金供给量,则金融抑制租金的估算方程为:金融租金 $=(-)$ 。通过估算可以得到日本发行债务收入、金融租金收入及债务收入与金融租金之比变化趋势,如表1所示。

表1 1965-2010年日本国债发行与金融租金变化趋势

单位:万亿日元

年份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债券发行	0.3	5.3	14.2	12.3	7.3	21.2	33.0	31.3	44.3
金融租金	10.9	4.7	12.9	8.0	18.9	7.7	5.9	5.0	5.3
金融租金 / 债券发行	31.4	0.9	0.9	0.6	2.6	0.4	0.2	0.2	0.1

数据来源:日本国家统计局,日本中央银行。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租金与债务发行规模呈反方向变化趋势,债券发行收入呈逐年增长趋势,而金融租金呈下降趋势,反映了政府在金融资源获取方式上的变化。在金融自由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中,政府获取金融资源及干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市场化方式逐渐替代直接的行政干预。

不同产业发展阶段政府对经济干预方式发生改变,与之相配套的金融结构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初期阶段,金融控制保证了稀缺性金融资源被配置到政府鼓励的行业和部门,资金的集中使用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和产业结构的有序升级;金融控制下政府通过金融租金对企业进行了转移支付。金融控制带来资金使用的规模经济效应,但同时降低了价格的发现机制,对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损失。一个福利最大化的政策规划者需要在金融控制带来的规模效应与价格发现机制受损产生的效率损失间进行权衡,当规模经济效应减小或价格发现机制受损产生的效率损失增加时,政府必然推进金融自由化过程以提升金融市场

资源配置效率。

宏观金融结构演化源于政府不同经济干预方式所产生的效率差异,效率增进决定了其路径。战后初期的“外生管制型”金融制度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了推动作用,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虽然提高了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效率,但从日本经济发展绩效来看,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并未有效带动经济增长。为促进经济增长,日本政府持续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导致国债规模的增加。在金融市场效率无法有效提高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国债规模持续增长并带来一定的主权债务风险。^①

(二)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历程

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技术进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战后至1973年处于追赶阶段,该阶段日本主要产业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通过“模仿创新”的技术演进模式,日本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金融系统发挥了集中资源,促进产业发展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1973-1990年日本产业发展水平进入赶超阶段,创新模式向“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与“集成创新转变”,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减小,在电子、集成电路、汽车等领域甚至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1990年之后,日本产业发展水平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产业结构升级依赖于“原始创新”,并据此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并成为全球新兴和技术的创造者与引领者。^②

不同发展阶段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绩效存在很大差异:1955-1973年,日本保持了年均11.8%的经济增长率,产业水平逐渐与发达国家相接近;1973-1990年,日本保持了4.3%的经济增长率,部分产业进入全球领先水平;1990-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1.2%。^③进入1990年代之后,日本不仅经济增速较之以前明显减缓,经济增长表现也逊色于发达国家水平。在新兴产业成长性及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引领方面,日本明显滞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进入2000年之后,日本在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发展缓慢,其在全球及区域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下降。曾经风光无限的索尼、东芝、柯达等先后出现经营困难,而在新兴产业成长中,中国、韩国等国家的企业先后成长并壮大,日本在区域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下降。

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技术进步,2000年以来日本基础科学在全球竞争力并未下降,致使日本新兴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基础研究不足,缺乏将技术市场化的能力

^① 尹小平、王海旭:《日本国债对民间支出的经济效应分析》,载《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3期。

^② 薛春志:《战后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与启示》,载《现代日本经济》2011年第6期,第71-77页。

^③ 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所得。

是其重要原因。进入发达国家之后,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给予巨大重视,2000年日本提出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构想,2000-2016年日本共有17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在物理、化学、生物领域出现了全球顶尖级的科学家。

风险投资在先进技术的市场化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日本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束缚了其作用的发挥。“日本型风险投资”受日本多元化官僚体制的影响,风险投资无法帮助企业完成破坏性创新。^①

三、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水平耦合性的理论分析

日本的发展经验表明,金融市场的角色随产业发展阶段变化而不同,产业结构升级对新金融结构产生了需求。本节将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对后发国家不同产业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性及其变化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不同金融结构获取、处理信息的成本存在差异,最优金融结构应该能最小化交易成本,使金融系统在产业升级中发挥最大效率。

不同金融结构获取、处理信息效应与产业发展阶段有关,技术与制度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创新方式在发生变化。金融系统是一种组织形式,信息传递有效性决定了组织效率。当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耦合时,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大化,最优金融结构得以建立;反之,金融缺口产生,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害。

(一)创新模式、信息溢出与金融结构需求

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伴随着产业风险的增加。^②赶超阶段为模仿型创新模式,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新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信息,产业风险相对较小;步入发达国家以后,创新模式由模仿型向原始创新型转变。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使政府规划者与企业经营者、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随之增加,其最优金融结构必然发生演化。

这里,我们先构建一个简易的模型来分析后发国家产业升级过程中,金融结构资源配置效率发生的变化及最优金融结构演化。

假设存在两个国家:后发国家1和发达国家2, $t=1,2,3$ 表示时期, $(i=1,2,3)$ 表示产业发

^① 李彬:《制度选择框架下日本风险投资组织行为新解——读平力群的新作〈日本风险投资研究〉》,载《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15页。

^② 龚强、张一林、林毅夫:《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4期,第4-16页。

展水平,在时点,国家 1、2 产业发展水平分为,国家 1 采取赶超型发展战略,时点国家 1 和 2 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假设产业结构的升级源于技术进步,分别由根本性创新、重大创新、渐进式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①

假设信息在国家 1 和国家 2 之间能够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可以对后发国家产生知识外溢效应。对国家 2 而言,由于其产业发展水平处于全球领先,每一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都是未知的,必须通过试验来确定可行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国家 1 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国家 2 选择可行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国家 2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依靠原始创新,需要不断试错。根本性创新、重大创新、渐进式创新反映了创新程度,产业升级是三类创新积累的结果。渐进式创新是对现有制度、组织结构、商业模式、技术的提升或改造,重大创新则是“毁灭性创造”的过程,根本性的突破。^②新产业的成长需要经历一个培育、成长并最终成为主导产业的过程。

1. 追赶阶段的发展战略及最优金融结构

如图 3 所示,在 t_0 时刻,国家 1 产业发展水平落后于国家 2, t_1 时刻前国家 1 所处发展阶段称为追赶阶段, t_1 时刻之后国家 1 与国家 2 处于同一产业发展水平。国家 1 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技术发展路径来实现产业升级:一是完全通过自主研发;二是“拿来主义”,通过引入发达国家技术来迅速推动本国技术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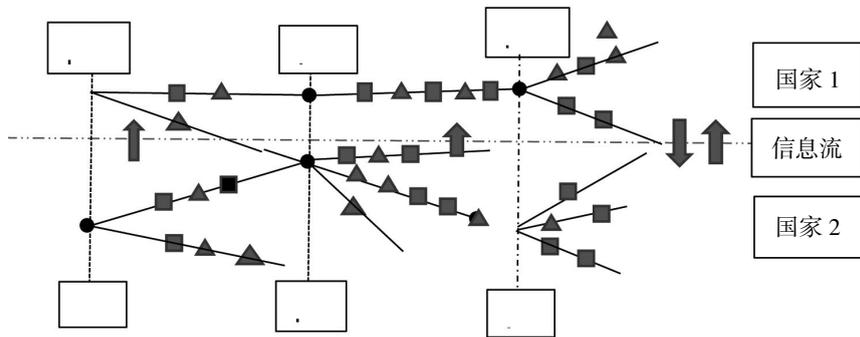


图 3 “赶超型”经济技术演进路径与信息流动

注:图中实线表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圆圈表示根本性创新,正方形表示重大创新,三角形表示渐进式创新,箭头表示信息流。每一条实线代表了一种可能的产业升级路径,但只有成功连接到下一阶段的实线才是真正可行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

^① Henderson R M, Clark K B.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 pp.9-30.

^② 钟昌标、黄远浙、刘伟:《新兴经济体海外研发对母公司创新影响的研究——基于渐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视角》,载《南开经济研究》2014 年第 6 期。

若采取第一种方式,国家 1 需将金融资源分配使用以验证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可行性,资源分配使用延缓了产业升级速度。若采用第二种方式,利用发达国家技术外溢效应,集中使用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加速产业升级速度。对国家 1 而言,采取第一种方式是最优策略,金融结构需要能够与第一种发展战略相匹配,资源禀赋决定发展战略,此阶段发展战略在于集中稀缺性金融资源、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产业升级。

在追赶型发展阶段,国家 2 技术通过商品、人员与资本流动等方式对国家 1 产生外溢效应,在国家 1 由到升级过程中,国家 2 此前的发展经验也成为国家 1 的知识禀赋。国家 1 在、时刻政策制定中,不用通过实验来进行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而可以直接集中金融资源“复制”国家 2 所完成的产业升级路径。

由以上分析可知,追赶型发展阶段金融结构的功能在于:较强的金融资源聚集能力以实现金融资源的集中使用,金融市场实验能力被弱化。

2. 进入发达国家后的发展战略

自开始国家 1 和国家 2 产业发展处于同一水平,国家 1 成为全球先进技术的创造者,无法完全通过技术与制度的模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其产业升级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增加。创新成果相关的信息在国家 1 和 2 间的流动方式由追赶型发展阶段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

当国家 1 产业发展水平步入全球领先时,产业升级步入“无人区”,推动未来产业升级的技术是什么、什么样的产业能够成为主导产业、产业升级采用什么样的路径都是未知的,需要企业不断地通过实验去探索。进入之后,由于产业升级中存在的风险,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只能发挥引导、扶持的作用,无法通过直接控制资源来决定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方向。

产业风险增加迫使国家 1 金融资源分配方式发生变化,以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其一,原始创新面临很高的风险,只有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才能引导资金进入创新性行业,股权投资能够给高风险投资带来相应的回报,并对企业内部人员进行更高效的激励与约束,股权市场的发展对创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二,不同金融结构下国家 1 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存在差异,分散型金融结构更有利于降低总体风险;其三,由于未来产业发展技术、组织形式等信息的未知性,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增加,金融控制带来的效率损失增加,金融自由化将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债务融资一般在资金供需双方签订协议前融资成本已经确定,债权人会将资金风险控制至最小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股权融资所获得的回报率取决于企业发展,投资者愿意为了获

取更高回报承担高风险,这就使得高风险创新能够得到资金支持。在国家 1 进入时刻之后,原始创新带来高风险投资增加,风险投资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原始创新。

不同国家银行集中度存在很大差异。美国在经济发展的很长时期通过禁止银行跨地区经营、混业经营来阻止银行规模过大造成的垄断,而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对大银行存在鼓励政策。集中型金融结构的优势在于能够发挥金融资源规模经济效应,但也降低金融机构的多样性和差异化水平,对创新性企业支持不足。

在后发国家,金融制度并非市场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制度安排所确定,政府通过金融控制影响资金使用方向。金融控制在追赶型发展阶段能够避免产业协调失败带来的效率损失,通过对资金事前规划实现产业的有序发展。在国家 1 进入之后,政府无法对产业发展规划进行有效预测,只能通过企业实验渐进性实现产业升级,企业需要更灵活的市场化资金支持。金融结构需要与产业结构发展相适应,在国家 1 产业发展水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金融管制的放松将有利于金融市场效率提高。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国家 1 进入阶段之后,金融市场效率提高的要求推动结构演化,其演化特征主要有: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小银行的发展和政府金融控制的放松。

(二)资源禀赋、信息集与金融结构演化

以上分析表明从不同金融结构资源配置效率视角分析了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金融结构决定了其功能,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对金融系统功能需求存在差异,^①金融结构伴随产业发展阶段演化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资源禀赋变化是引起金融结构演化的外生变量,政府需要对稀缺性金融资源进行控制以顺利推进产业发展政策;不同金融结构下交易成本差异是金融结构演化的内在原因。资源禀赋与交易成本的变化共同推动金融结构演化。

1.资源禀赋、信息集与金融结构

对金融结构的机制设计需要权衡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如何集中稀缺性金融资源支持国家产业政策,发挥金融资源规模经济效应;二是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降低金融市场在融资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金融资源集中使用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导致交易成本增加。

表 2 反映了后发国家不同产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信息及风险特征与金融结构组合,资

^① 沈军、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一个基于系统科学的新视角》,载《财贸经济》2006 年第 1 期,第 23-28 页。

表 2 不同产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信息及风险特征与金融结构

	阶段 资源禀赋	信息及产业风险特征	金融结构
追赶期	资本稀缺, 信息资源禀赋充裕。采用追赶型发展战略, 集中使用金融资源, 通过金融控制规划金融资源价格、使用方向	政策制度者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低, 政府和企业能够以低成本获得技术、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方面的信息, 产业风险很小。	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是将金融资源分配到主导产业部门, 集中型、银行主导金融结构有效率。
赶超期	资本稀缺性和信息资源禀赋降低, 部分产业发展水平逐渐与发达国家接近, 经济增速减慢, 需要通过原始创新建立新兴产业, 产业政策效果减弱。	政策制度者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 发达国家的信息外溢效应降低, 产业政策带来的风险、技术风险凸显。	提升金融体系在降低信息不对称、分散风险方面的功能, 资本市场融资占比增加, 建立多样化、分散化的金融结构。
步入发达国家水平	资本充裕, 信息稀缺。需要不断的社会试验获取产业技术、生产组织等方面的信息, 新兴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起核心作用, 产业政策作用进一步减弱	信息不对称程度进一步增加, 政府、企业通过试验获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信息, 产业风险进一步增加。	金融市场在推动创业、创新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协调发展, 金融结构进一步得以优化。

源禀赋与产业发展阶段相关, 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与风险特征取决于产业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最优金融结构是在资源禀赋约束下、信息与风险特征约束下, 能够最大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金融结构。

在追赶型发展阶段, 国家 2 对国家 1 的信息外溢效应降低了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 为政府高效率的干预市场提供了基础, 由于信息不对称程度低, 政府干预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较小, 而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明显。追赶阶段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链不成熟, 集中型金融结构下金融资源按照产业规划分配和使用, 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当经济赶超时期, 国家 2 对国家 1 知识外溢减少, 国家 1 需要通过原始创新来获取产业升级所需知识信息, 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由于金融稀缺性程度下降, 集中型金融结构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减少。进入追赶期, 多样化、分散化金融结构逐渐得以发展以满足金融市场效率提高的需求。

当经济步入发达国家水平后, 资本稀缺性对产业发展的约束已经消除, 资金集中使用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逐渐减弱, 集中型金融结构带来的市场效率损失增加。创业、创新的需求推动股权投资的发展, 风险投资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金融结构演化是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居民博弈的结果。后发国家政府对金融市场存

在很强的政府,其金融结构演化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政府是金融制度的设计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结构演化路径。金融自由化推动金融结构演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金融结构演化的方向,但金融结构同时会受到利益集团、制度固化等因素的影响,最优金融结构无法形成。

从国家金融制度设计层面来看,政府有其自身的效用函数,由于信息集的差异,不同金融结构对企业的激励存在差异。在追赶型发展阶段政府通过利率管制降低资金成本,并将稀缺性金融资源分配到符合政府规划的产业和部门,政府通过金融租金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给予奖励。政府需要对企业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甄别并监督企业资金使用,此过程将产生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能维持在低水平是,集中型、外生管制型金融结构是有效率的。

当国家 1 进入,有关产业发展信息集减少,政策规划者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金融自由化水平逐渐提高,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对企业进行激励。时刻之后,国家 1 产业升级依赖于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存在高风险、不可预见性等特征,分散化、多样性的金融结构更能适应企业资金需求,推动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股权投资的发展满足了高风险创业、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

2.金融结构演进路径分析

不同金融结构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差异,存在与产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金融结构,使得金融系统实现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最大化促进作用,该金融结构即为最优金融结构。^①产业升级伴随金融结构演化,形成最优金融结构演化路径。在现实中,可能存在阻碍最优金融结构形成的因素,使其偏离最优金融结构演化路径,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使得最优金融结构的形成缺乏收敛性。

(1)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变化

后发国家在追赶型发展阶段通常建立起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债务融资是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伴随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其金融结构演化的重要路径特征之一是股权投资占比的增加。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具备原始创新能力的企业增加,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股权融资有利于促进高风险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银行和金融市场在信息处理上有各自优势,银行优势在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而金融市场在处理个性化信息方面具有优势。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信息公开程度更高,有效的直接融资市场向所有的投资者揭示信息,这就产生信息收集、分析上的搭便车问题,没有

投资者愿意花成本对公司进行研究。银行系统将信息变为私人信息,避免了搭便车现象。^① 金融市场在处理非规则、个性化的信息方面具有优势,银行的优势在于处理批量化、规律性的数据。^②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追赶型发展阶段,产业风险小,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更能够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进入发达国家之后,技术步入全球领先水平,新技术、新产业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股权融资的发展通过金融结构优化提高金融市场对产业升级的支持。

假设股权融资额为 K_s , 债务融资额为 K_b , 显然有 $K_s + K_b = K$, 则金融结构 K_s / K_b 为金融结构。 Y_1, Y_2, Y_3, Y_4 为等产量曲线, X_1, X_2, X_3, X_4 为资金约束线。在等产量曲线与资金约束线相切的点产出达到最大化, 此时股权融资与债务贷款比例 K_s / K_b 即为最优融资结构, 将所有等产量曲线与资金约束线切点连接得到最优金融结构演化路径 FS, 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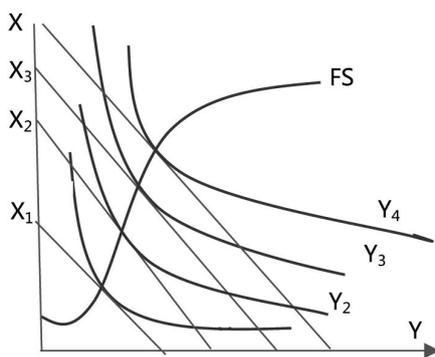


图 4 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型金融结构转化

金融结构演化路径对 FS 的偏离产生了金融缺口,^③ 金融缺口的存在使得金融结构不合理,降低金融资源总体使用效率。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金融结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对最优结构的偏离。

(2) 银行系统市场结构的演变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结构 - 行为 - 绩效”的原理,市场结构决定了银行市场行为,银行系

^① Greenwald BC, Stiglitz J E.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6, 101(2), pp.229-264.

^② Allen F, Gale D. “Diversity of Opinion and Financing of New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999, 8(1-2), pp.68-89.

^③ Xu H. “Financial Gap and Minimizing of Transaction Cost: A Study on Financing Issue of Small-and-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Finance*, 2001.

统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受市场结构影响。市场结构差异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大银行与小银行占比的差异;二是国有股份占比的不同;三是政府对银行业务活动干预程度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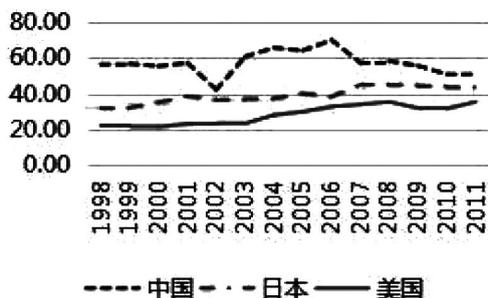


图 5 中日美三国 1998-2011 年前 3 大银行资产总额占银行总资产比例

图 5 列举了中国、日本和美国前三大银行资产规模占全国银行总资产规模比例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发展阶段银行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无法很好地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市场结构的过分集中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银行的发展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下降。^①

最优金融结构必然随之变化。对后发国家而言,追赶型发展阶段往往优先建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是这类企业的重要特征,因此追赶型发展阶段大中型企业成为主体。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服务业占比,中小企业占比增加,中小银行的发展更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产业发展阶段变化必然引起银行市场结构随之发生改变,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中小银行产生了引致需求。

金融管制放松及金融自由化的推进是后发国家金融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郑蔚对日本的研究表明战后日本金融结构经历了一个“外生管制型”向“市场外生型”的转变,中国、韩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也出现了金融自由化程度逐渐提高的现象。^②在追赶型发展阶段,为保证重点支持的产业和部门能够获得低成本资金,政府可能采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影响信贷资金配置。当一国产业发展水平步入发达国家之后,控制金融风险成为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的重要目的。^③

^① Thorsten Back, Kunt. “Financial and Legal Constraints to Growth: Does Firm Size Matter?”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0. 2010 (1), p.137-177.

^② 郑蔚、王思慧:《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变迁与转型:一个制度金融学的考察》,载《现代日本经济》2014 年 1 期,第 18-27 页。

^③ 王一江、田国强:《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中日韩银行业经验比较》,载《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1 期,第 28-36 页。

(3) 金融演化路径的偏离与金融缺口

存在金融结构演化的最优路径,在该路径上的金融结构均为最优金融结构。现实金融结构对最优金融结构的偏离产生了金融缺口,在存在金融缺口下,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金融系统支持产业升级的能力受到损害。

金融结构演化路径受金融制度、政治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文化理念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影响,制度间存在互补性和关联性。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强调信念的变化决定了制度的形成、稳定和变迁,他认为各个参与主体所形成的共有信念与各个博弈域中所形成的制度规则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信念差异导致了金融结构演化过程中均衡的多重性和对最优金融结构路径的偏离。互补性和关联性意味着金融结构演化所带来的边际效率提升还取决于金融市场相关的其它制度安排,^①相关制度安排演化的滞后可能削弱金融结构演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同时,相关制度的止步不前可能是金融结构演化受阻。

金融结构演化路径受一系列制度因素影响,使金融结构呈现出稳定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制度不仅包括显性的法律、法规,隐性的制度安排,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都会对制度形成及演化产生重要影响。从公司治理来看,存在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市场控制模式和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内部人控制模式,市场模式下公司治理是以资本市场上的股东为中心,而内部人控制模式下股东和公司员工、银行等利益相关者都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市场控制模式下股票市场的发展具有更好的制度环境,内部人控制下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提升,成为银行主导性金融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公司治理呈现出趋同之势,但公司治理变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和制度互补性特征,致使金融结构演化呈现出路径依赖特征。^②

金融结构演化过程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效率增进的金融结构自发演化,还是政府对金融结构的设计,都受到现有一系列制度的约束,最优金融结构无法形成,次优金融结构成为市场和政府规划者的最优选择。制度关联性、互补性及金融结构演化路径依赖使得金融缺口长期存在,难以通过金融结构自发演化或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来消除,金融市场低效率特征成为产业升级的桎梏。

^① 青木昌彦,周黎安:《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30 页。

^② 李明辉:《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与持久性研究——基于英、美、德、日等国的分析》,载《经济评论》2007 年第 4 期,第 117-128 页。

四、金融缺口与日本经济萧条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①其中金融制度构成了日本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产业发展阶段与金融结构耦合性变化是引起日本经济增长绩效波动的重要原因。当金融缺口产生或扩大时,产业升级受阻,成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制度固化、利益集团的阻挠可能使金融结构偏离其最优路径,是金融结构演化过程中产生“囚徒困境”。

(一)制度固化与金融缺口

日本金融制度有以下特点:其一,主银行制度根深蒂固,主银行在企业融资、公司治理中占有很高的地位,限制了金融机构及不同融资方式的竞争,使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垄断性地位;其二,日本企业集团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集团内部企业自成体系,导致外部治理的内部化和治理结构的封闭性,降低了市场机制的发挥,在日本经济进入高级化阶段之后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障碍。^②其三,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组成的“铁三角”关系使利益集团能够对制度实现稳定的控制,能够导致利益格局变化并产生更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金融结构形成受阻。^③

主银行制度指包括企业、银行和管理当局间一系列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及该制度安排下的公司融资和治理体制。^④主银行制度兴起于战前,战后虽一度受到削弱,但最终得以保留并发展壮大。主银行制度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1980年代之后该制度逐渐变得效率低下,对日本产业升级产生了阻碍。^⑤

在主银行结构下,企业与主银行间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主银行在企业融资、公司治理、对陷入财务困境救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追赶型发展阶段,主银行与企业间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银行对企业的监督成本,使金融资源分配到边际产

① 可参见梁军、赵青:《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载《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1-21页;张乃丽:《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新解说:基于供给的视角》,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04-114页。

② 尹小平、徐兴:《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化制度变迁》,载《现代日本经济》2014年第6期,第60-69页。

③ 孙晶:《日本“权力铁三角”变异反思》,载《人民论坛》2014年12版,第35-35页。

④ 青木昌彦:《日本主银行体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5页。

⑤ 郑秀君:《日本主银行制度研究综述》,载《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36期,第73-77页。

出最大的企业。但主银行制度限制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降低了市场机制的发挥。当一国产业发展进入全球前沿水平时,企业需要进行存在高风险的创新,主银行可能成为创新的障碍,企业创新活动受到抑制。与股权融资相比,银行具有谨慎性特征。

战后日本形成了三菱、住友、三井、芙蓉集、三和、第一劝业六大财团。^①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财团经过分化与重组,形成了三大金融控股集团,财团以金融资本为核心,产业、商业和金融资本高度融合的“三位一体”体制,财团拥有核心的主银行,形成了金融、产业一体化的闭环。^②财团内企业在人员、业务、资金上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其复杂的组织结构不利于信息化背景下企业的创新。

在财团体制下,财团内融资取代了市场化融资。在追赶型发展阶段,财团通过企业间业务的协同性、互补性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由于该阶段产业风险小,企业内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能够发挥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发展水平进入全球领先时,产业风险增加,财团下行政命令决策产生资源错配,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

(二)股权市场发展不足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增长

产业升级依赖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创新程度高,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比传统产业更高的风险。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结果培育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处于培育期的产业面临技术、市场商业化可行性上的风险。行业内企业缺乏能由于贷款抵押的担保品,银行贷款的回报不能与其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导致银行缺少为高风险创新企业融资的动机。对高风险的创新企业而言,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股权投资是比银行更加有效率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中,投资者承担高风险并且享有预期高收益率,风险与收益一致,股权融资能够提高更有效的激励。^③

日本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发起人是银行或大财团,形成了以银行为中心的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模式,其产业投资基金更加注重安全性和稳健性。^④进入21世纪,日本在科技研发方面仍然保持了很高投入,同时对基础科研给予更高重视,并取得了很高的成绩,但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却略显迟缓,与中国、美国等国相比,对技术的产业化能力不足。在21世纪初日本仍然具有优势的信息技术产业方面,至今已经逐渐没落。

① 吕有晨、李政:《日本企业集团的演进与创新》,载《现代日本经济》2003年第1期,第20-24页。

② 胡敬新:《以银行为核心的日本财团变革研究及其启示》,载《征信》2006年第4期,第23-27页。

③ 张一林、龚强、荣昭:《技术创新、股权融资与金融结构转型》,载《管理世界》2016年第11期,第65-80页。

④ 郑联盛:《国外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的经验与启示》,载《新金融》2014年第8期,第58-61页。

在日本强势的银行系统下,风险投资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导致股权融资不能充分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图 6 反映了日本与美国股票市值与私营部门国内信贷比变化趋势,从图 6 可以看出,股票与银行信贷在两国具有不同的地位,银行信贷在日本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美国更依赖于股票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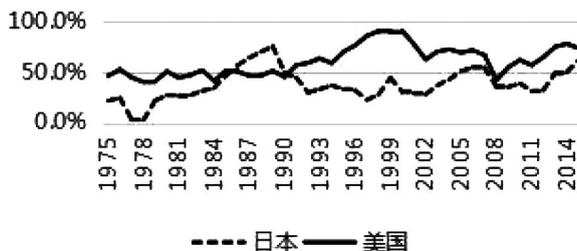


图 6 日本与美国股票市值与私营部门国内信贷比

股市泡沫的破裂、股票市场自身存在的问题都成为其发展的制约。2007 年 7 月与 1989 年 12 月相比,日经 225 指数下跌了 49%,而在相同期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 750%,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 160%,德国 DAX 指数上涨了 750%。经济泡沫的破裂导致股票投资者损失惨重,但即使抛开经济泡沫破裂问题,日本股市仍未给投资者带来很好的回报。2000 年 12 月至 2017 年 7 月,日经 225 指数仅上涨了 44%,远低于其它发达国家。股票二级市场的低迷使股票市场失去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银行存款、保险与养老金成为日本居民的主要金融投资方向。

2014 年,日本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中,银行存款、债券、股票与基金份额、保险与养老金占比分别为 49.03%、7.13%、9.54%、26.37%,而美国家庭同类资产组合占比分别为 11.56%、6.53%、46.32%、33.87%,日本居民银行存款占资产组合比例比远高于美国,而股票与基金份额占比远低于美国。股票市场发展滞后不仅对风险企业融资产生了障碍,同时也导致居民在股票二级市场投资回报率降低。

五、结论及启示

金融系统在日本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发挥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在赶超型发展阶段,金融系统是促进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手,但在日本产业发展水平进入全球领先之后,金融系统反而束缚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如何适时推进金融结构演化,使金融系统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最大的促进作用,是一国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结论如下:

1.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性程度决定了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最优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阶段与水平有关,产业升级推动最优金融结构演化。不同产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信息特征存在差异,政策规划者需要在金融资源集中使用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与市场化机制不足产生的效率损失间进行权衡。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金融结构演化的内在动力,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在金融结构演化过程中起到顺水推舟的作用。

2.结构演化有其最优路径,现实中不同因素会对其路径产生干扰,使金融结构偏离最优路径,产生金融缺口。金融缺口的存在使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金融系统效率的下降成为产业升级的束缚。

日本金融制度有其特殊性:包括主银行制度、财团经济、政官财“铁三角”关系等,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与破裂与日本特殊的经济、金融和政治背景有关。由于以上特殊性,无法将日本与其它国家进行简单的比较并以此形成对其它国家有借鉴意义的结论。抛开日本经济特殊性,其成功的发展经验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存在一般性的经济规律,可以为其它国家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中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曾采用过很多与日本相似的发展战略,包括追赶型发展阶段所采取的金融控制、产业政策的密集使用并产生了很好的经济增长效果。但这些政策的使用也必然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其一,大而集中的银行系统导致金融资源的过度集中,不利用金融市场效率提高;其二,政府对金融系统的诸多干预与管制在降低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供的同时,也助长了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投资,产生了道德风险。其三,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期,股票市场逐渐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但中国股票市场还存在很多需要健全的地方。

推动金融结构演化,构建最优金融结构以使金融系统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发挥应有作用,对中国产业结构顺利转型升级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借鉴日本发展经验,未来中国可在以下方面推动金融结构的优化:首先,应该推动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其对新兴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次,防止制度固化对金融结构演化产生阻碍;最后,构建分散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发展中小银行,避免大银行体制下产生的金融资源过度集中,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较难充分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发展地方中小型银行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促进金融结构优化。

(肖康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顾永昆,贵州商学院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日本工匠精神的深层底蕴和现代传承

任 云

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与制度变革的角度、以及文化与宗教的角度分析了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条件、本质特征和精神内涵。日本工匠精神形成于江户时代,从自他关系、自我、以及物我关系来看,工匠精神各具有儒、佛、神道三种底层思想的支撑:实用性儒教为工匠提供了外在道德规范,世俗性佛教提供了勤奋工作的内在动力,物我合一的神道思想形成了工匠独特的造物观。日本工匠精神在现代社会里的良好传承,也主要得益于文化宗教的底蕴深厚,基础稳固。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工匠精神的传承所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 日本工匠精神 家制度 儒教 佛教 神道 传承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加强工匠精神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邻国日本的工匠精神因而受到国人较多的关注。不过,相对于媒体对日本工匠精神较多的事例报道,国内的学术研究还不多见。周菲菲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日本工匠精神的成因,但过于强调中国儒教的影响,有失偏颇。^①

其实,日本学术界对工匠精神的研究也不够系统。远藤、網野^②的研究以工匠史(职人史)为主,远藤虽有关于职人气质的分析,对其思想基础却没有涉及。而山本、保坂、寺西^③尽管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广义工匠精神,即职业观与勤劳观念)的起源,却没有具体论及工匠的精神气质和特征。

① 周菲菲:《日本的工匠精神传承及其当代价值》,《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

② 远藤元男『日本職人史の研究』全六卷、雄山閣、1985年;網野善彦『日本中世の百姓と職能民』平凡社、2003年。

③ 山本七平『日本の資本主義の精神』ビジネス社、1979年(2015年新版);保坂俊司『宗教の経済思想』光文社新書、2006年;寺西重郎『経済行動と宗教』勁草書房、2014年。

笔者综合上述两种研究手法，从工匠史以及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工匠精神成立的条件，并从思想史的视角来探寻工匠精神的本质特征。为突出重点，本文采取从分述到合论的方式，全面探讨了儒、佛以及神道在形成广义与狭义工匠精神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解析了日本工匠精神有效传承的原因，以及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一、日本工匠精神：基本内涵与形成条件

工匠精神主要成型于江户时期。此前的室町时代由于手工业需求旺盛，工匠有较强的逐利性，粗制滥造、偷空减料的行为较为常见。^①农民也没有经济独立性，缺乏勤劳意愿，认为达到领主所规定的最低劳动义务就足够了，若不够吃就到领主家吃大户。^②正是江户时代经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以及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化催生了工匠精神。

（一）如何界定日本的工匠精神

“工匠”一词在日本早期有“tehito”（手人、工匠）及“takumi”（匠）的叫法，前者指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专业技术者，后者指原有农村家庭内副业手工业者。13世纪起日本开始将工匠和各种艺人等都统称为“职人”，其后随着手工业的壮大，江户时代“职人”专指工匠。^③现代社会里“职人”泛指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

在江户时代，工匠精神谓之“职人道”，而突出工匠行为特征的用语是“职人气质”。现代社会里，人们仍然称赞那些敬业、专注、有着高超技巧的职业人士具有“职人气质”或“职人魂”。

何谓职人气质？一种观点认为其“表现为对自己的技术不亚于他人的绝对自负，以及对工作决不妥协的责任感”，^④还有所谓“瞧不上眼的不做”、“今天的钱不留到明天用”的说法。但如吉田、远藤分析的那样，江户职人是清贫阶层，主体是虔诚谦虚、勤俭节约的，今天的钱不留过夜，其实是江户城里部分行业的工匠极端清贫不得已的结果。^⑤上述说法或是曲解，或是缺乏普遍共性。

远藤和北康利对职人气质的概括较为准确。前者着眼于江户职人，认为“职人气质的核心基础在于侍奉父母、先祖以及神灵的精神和行为，也就是家业意识。职人由此会以真挚、诚实、

① 远藤元男『日本職人史の研究 5 職人と生活文化』、200-201頁。

② 宮本又郎・粕谷誠『経営史・江戸の経験』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年、106頁。

③ 远藤元男『日本職人史の研究 1 日本職人史序説』第二章。

④ 林部敬吉・雨宮正彦『伝統工芸の「わざ」の伝承』酒井書店、2007年。

⑤ 吉田光邦『日本の職人』講談社学術文庫、2013年、281-286頁；远藤元男『職人と生活文化』、116、119-120頁。

谦虚、虔诚的态度传承家业,并焕发出追求技术的热情以及对造物的执着”。他认为工具、技术与做人这三个要素里,技术只是末端,做人才是根本。^①而后者如下概括:“职人气质包括勤奋刻苦、永无止境地磨练技术的志向;一心专注工作的坚韧精神;对维持传统的执着和改造创新的热情,以及敬畏先人、态度谦虚等几个方面”。^②

不过两者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改造创新”的确是一部分职人的特征,但同时还有一大批职人靠秘传技术,或恪守传统赢得顾客。日语常说的“守破离”也是“守”为先、后有“破”和“离”,继承传统才是工匠的共性。此外,上述说法没有反映独具日本特色的物我合一的造物观。

笔者认为日本传统的工匠精神有三大特征:一是尊祖敬业、维护传统、合规守矩、正直诚实,有传承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二是勤勉努力、刻苦磨练、心无旁骛、清心寡欲,有职业修行求道追求;三是崇神敬物、感恩自然、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有物我合一的境界和一品入魂的技艺。三个特征分别从自他关系、自我、物我关系上体现了工匠的精神品质,各有着儒教、佛教与神道的思想基础。

(二)日本手工业发展脉络

早期日本手工业得益于外来技术的传入。公元四世纪,从大陆过来的工匠多数在朝廷官营部门工作。律令制时期,官营工坊及寺院工坊较为发达,皇室、贵族及寺院的需求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院政幕府时代日本从庄园经济发展到私有领地经济,附属匠人增加,商品经济与异地贸易逐渐发展。武家文化促进了一部分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如刀剑及日本独创的折扇(倭扇)出口到宋朝,被上流社会当成宝物。我们可以从欧阳修的“咏日本刀”诗和黄庭坚等人对日本折扇的赞美中窥见其工艺水准之一二。^③但是大部分行业如陶瓷、纺纱、丝织业等直到16世纪中叶与中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上层人士还是以中国货(唐物)为贵。

16世纪,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逐步实施“兵农分离”政策,规定农民交出兵器,而武士离开农村并居住在领主“大名”的城防周围护守主君,工匠与商人也须按职业分片集中居住在“城下町”,即所谓的“职住一体”。此后的德川政权继承了上述做法,更加彻底地推行了“士(武士)、农、工、商”身份制。

由于工匠聚集和产业集群,以及商品流通系统特别是交通网络的完善,加之各藩大名按

① 遠藤元男『日本職人史の研究 3 近世職人の世界』、155-159頁。

② 北康利『匠の国 日本』PHP新書、2008年、70頁。

③ 石守謙:《移动的桃花源 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三联书店,2015年,第六章。

“参勤交代”制度必须往来于江户城和领地定期居住,促进了各地特产品的跨地交流,带动了全国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末期由于引进了中国先进的织布机及中、朝两地的陶瓷工匠,丝织品及瓷器质量迅速提高,加之清朝实行海禁后,日本推进国产替代,高级纺线和丝织品实现国产化,而瓷器出口欧洲,填补了中国瓷器撤出欧洲市场后的空白。^①到江户中期工商业已极其繁荣,江户城百万人口中工匠与商人家庭各有二十数万人,大阪五十多万人口基本都是工商家庭。当时的手工行业细分达到2000种以上。^②

(三)江户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与工匠精神的形成

江户社会的核心制度是士农工商家职身分制。职业是世袭传承的家业,个人无选择的自由,“家”即是生活单元,也是经济实体,一家的“家名”或“家号”如同企业商标。如果家业衰败,个人便会失去安身立命的职业身份,“家”也因此而解体。因此维持家业的稳定传承,必然成为所有家庭的最大使命。^③

该制度起源于12世纪武士的“家”制度,在室町时代长期战乱中,各地武士抱团发展,按实力构成大家-小家多层结构,形成“家系列”。“大家”(大名)制定家法,实施一元化管理,而“小家”作为家臣进入“大家”,各领地内的农工商人作为“领民”只能附属于“家系列”。此后一些“小家”武士成为大名的直属武士而失去领地。当然这种制度并不稳健,家臣跳槽或造反夺权的情况并不少见。

“家”制度的改革肇始于织田信长,到江户初期完成。一方面,大名被纳入幕府这个“大家”的下位,被派往各藩任藩主,旗下所有武士离土入城专职化,经济来源靠领取固定俸禄(大米)。另一方面,处于附属地位的领民受托土地等生产资料而获得较独立的地位,他们的“小家”得以成立。德川政权规定职业和规模以家为单位世袭,这样,士农工商均被纳入家系列体制且身份均被固化。^④

与家体制对应的是长子继承的家业传承模式。为确保家业繁荣稳定,无子时由养子或女婿继承,用能干的女婿代替嫡子的也不少见。一般情形下家业经营规模基本不变,但有实力的町人和豪农可以仿照武家体系,以本家(家元)、分家形式来扩展事业。

^① 宫本又郎·粕谷誠『经营史・江戸の経験』2009年、第4-5章。

^② 1600-1721年,二三产业占比合计上升了10%以上,为明治维新前日本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代。见寺西重郎『日本型资本主义』中公新书,2018年、93页。

^③ 这方面的论著众多,如青木美智男『日本の歴史別巻 日本文化の原型』小学館,2009年、第2章;橘瓜大三郎·大沢真幸『げんきな日本論』講談社新书,2016年。

^④ 关于“家”制度的详细分析,可参考村上泰亮等著『文明としてのイエ社会』中央公論社,1979年。

技能传承上,一些行业固守“一子相传,门外不出”的做法,也有一些行业需要规模化或分工协作,靠接受学徒(丁稚奉公)和伙计(年季奉公)来确保人手。江户时期形成了严格的徒弟制度,学徒需要 10-12 年在师傅家修业,一部分学徒或伙计出师后,可以获得“亲方”的授权设立分号(暖簾わけ)。

日本的行会制度,也从早期的不平等、排他性组织——“座”逐步进化至江户时代的“仲間”制度,更加强调自律、协作。“仲間”保护本行业职人的工作,利用行规对职人进行规范,职人在行会的协调下安排生产活动,协作意识强。

日本工匠精神就是在上述一系列制度条件下产生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家职、家业尽管在名义上仍属于大名所赐,但已具有准产权的性质,受到保护。良好的产权制度必然会产生良好的努力激励,家业传承的巨大压力也是努力工作的动因。再者,将经济主体的互动看作是囚徒困境博弈的话,家业永续传承保证了该博弈是一个无期限重复博弈,工匠会一直诚实合作,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更何况行会监督下违约成本极高。第三,严格的学徒制度也保证了技术、规范和思想的传承。总之,江户时代工匠行为较江户之前发生了较大变化,工匠精神的形成已具有了制度保障。

二、工匠精神与儒教的社会伦理观

江户时期随着身份差序体制的确立,幕府政权逐步确立了朱子儒学的正统思想地位。强调秩序和人伦规范的实用儒学对工匠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身份认同与儒学解释

固定身份制下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江户时代的难题。就武士阶层来说,泰平年代已无建立军功的机会,家格又被固定,需要确立新的价值观。江户早期,中江藤树(1608-1648)指出“儒道即士道”,山鹿素行(1622-1685)强调武士具有安世治民的社会责任,武士的存在意义在于为农工商“三民”树立人伦模范。儒学成为官学以后,武士需要学习四书五经,掌握“文武两道”。

而对“士”以外的“三民”而言,职分固定化使他们基本丧失了身份上升的空间和择业自由,^①但随着经济发展,三民与下级武士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如何消除劣等感,确立自我价值也是民众的一大困惑。大众化儒学较好地回应了民众的诉求。

^① 庶子要获得独立,可以以养子或女婿身份到他家继承家业(需改姓),也有做学徒开分店的可能。

江户社会经济制度完全确立后，就不断有儒学思想家提倡四民平等。比如西川如见(1648-1724)所著的大众读物《町人囊》就详尽地论述了四民平等的道理，成为常年的畅销书。江户中期的民间儒学者石田梅岩(1685-1744)更具有代表性。石田早年两次离家去商家“奉公”(当伙计)，从学徒做到大掌柜，期间自学儒佛神道。彼时经济开始陷入停顿，幕府实施重农政策，推出反对奢华的措施，“町人无用论”开始泛滥。石田42岁后弃商从文，对外授课，主张町人特别是商人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天理、人心与社会秩序是一致的，“士农工商都合天理，天道唯一……故士道通农、工、商道”。“士农工商是天下治理的基本形态，缺一不可”。^①他的思想经门徒整理成“石门心学”被广为传播。

江户后期的儒学者海保清陵(1755-1817)倡导经世济民，主张不必拘泥于注重等级关系的“小仁”，而提倡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大局的“大仁”，鼓励武士参与经济活动。他的学说为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正名，超越了石田心学。^②一批儒学家还投身于各藩的财政重建工作。儒学者与武士的务实态度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也促进了社会平等和工商业者的自我身份认同。

(二)儒学的教化作用和职业道德规范的建设

如果说身份认同促进了各阶层唤起道德自觉，那么家业传承则更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压力，它强化了民众提升道德规范与职业伦理的必要性。

江户政权以施仁政来标榜正当性。武士阶层以山鹿所提倡的仁义、忠孝作为伦理规范，武士道至此摆脱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思想。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与武士并无差别，他们也比照武士道，以人伦准则如仁义、忠信、孝悌来处理自他关系，都强调不能违背“天道”，要求守秩序、知分寸、讲礼仪。不过与武士道强调忠君不同，三民更强调孝敬。对三民来说，家业要靠辛勤劳动和有效管理才能维持，传承家业的压力要远大于武士。家主必须珍惜先祖代代传承下来的事业，勤奋努力，恪尽职守。将祖先托付下来的家业好好传给后代乃是第一孝行。^③

道德教化主要通过大众教育与家庭教育两种方式。前者得益于文化教育及出版事业的繁荣。由于家业经营需要读写和珠算等基本技能，农工商家庭都比较注重子女教育，江户中期男性识字率就达到50%左右。江户时期出版了许多儒学道德教养读物，民众子女就读的“寺子

① 山本七平『日本の資本主義の精神』；田尻祐一郎『江戸の思想史』中公新書、2011年。

② シーコラ ヤン「江戸時代の経済思想における市場原理の概念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研究：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紀要』1998年第8巻、92頁。

③ 西川如見「町人囊」『日本思想史大系 近世町人思想』(中村幸彦校注)岩波書店、1996年、92頁。

屋”也采用这些读本。比如识字教材《寺子制海之式目》(笹山梅庵 1695 年刊行)就有以下教诲:“要崇父母、尊先生、敬兄长、惠小弟……更进一步要讲礼仪、对友人平等相待。”^① 1722 年第 8 代将军德川吉宗还下令刊印《六谕衍义大意》发给全江户民间学堂的老师,并要求所有书店销售。该书成为此后长期使用的经典教材。^②

而家庭教育主要依靠家长的言传身教以及家规传承。家规是职业道德与家业传承实用性法则的一个载体,主要强调维护家名家号的荣誉,确保家业安泰和稳定传承,要崇敬开创家业的先祖,要孝道、正直、用心、勤奋、坚韧、知足、节俭、守分寸。^③ 现在仍有不少传承有序的大户或家族企业还保存着家规家训。

正是通过常年的道德教化与家业传承的实践,江户人各行业的职业道德普遍有了较大提升,勤奋、努力传家应该是共同道德。当然,与商家特别强调义利关系、精打细算、诚信待客等不同,因手工业的细分化以及技术传承的特性,加上行规约束,工匠更加突出的品质是尊崇行业始祖以及创立家业的先祖,继承传统,合规守矩,懂得分寸。

综上所述,江户时期尽管构建了等级差序身份,各行业却形成了“以身份自觉和自豪感为基础的职业道德”,^④ 具有较高的道德自律性。可以说实用性儒学同时满足了维护级差秩序和道德向上两方面的需求,为工匠提供了行为道德规范。

三、工匠精神与佛教的“职业求道、现世修行”观

佛教自 7 世纪起就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之一,对于日本人心性有着深远影响,很多学者认为日本人勤奋精神的源流来自世俗化佛教,特别是江户世俗佛教。^⑤

(一)佛教的世俗化过程和影响力

六世纪中叶佛教东传日本,七世纪初圣德太子将佛教立为镇国之教,要求所有臣民信奉佛教,“笃敬三宝(佛法僧)”。早期佛教重戒律,经典繁琐。平安时代后期,末法思想与无常观盛

① 和田充弘「近世庶民教育における徳育の構造」『同志社大学日本語日本文化研究』、2014 年、201-215 頁。

② 倉地克直『日本の歴史第 11 卷 徳川社会のゆらぎ』小学館、2008 年、258 頁。六谕为明太祖所颁布,是明清两代官方教化纲领,在日本也经幕府提倡得以广为传播。

③ 曾根秀一「老舗企業研究の変遷に関する準備的研究」『静岡文化芸術大学研究紀要』、2016 年 No. 17、39-46。

④ 山折哲雄『日本文明とは何か』角川書店、2013 年、152 頁。

⑤ 例如,山本七平『日本の資本主義の精神』;保坂俊司『宗教の経済思想』。

行,战乱不断,民众亟需得到心灵的安慰,此时从中国传来的净土宗及禅宗自然受到欢迎。

镰仓时代,日本僧人进一步推进佛教的世俗化、简易化。净土宗的法然(1133-1212)提出专修念佛主张,认为单纯念佛,祈念他力本愿便可成佛,提倡在家修行。其弟子亲鸾(1173-1263)更提出“恶人正机”说法,向世人强调弥陀的拯救是广度一切众生,所有人只要真心信仰阿弥陀佛,称名念佛,都能以其原本的面貌得到拯救。亲鸾开创的净土真宗此后进一步发展,主张“现世求道”,认为求道的成果通过他人或社会就能获得评价和认可,人人皆可成佛。而禅宗本来就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净土真宗与禅宗作为主流教派推动了“圣俗一致”思想的传播,佛教成为拯救大众,深刻影响日本人心性的工具。

江户初期德川家康重视佛教,建立本末体系,加强了对寺院的纵向管理。为排除基督教,幕府还在1640年实施檀家制,规定全民都是佛教徒,并为所在地方寺院的施主。寺院管理各家户口和丧葬事务,民众如跨界外出,需持有寺院开具的证明。尽管江户中期以后儒学成为官学,部分儒者有排佛的举动,佛教也因过于“行政化”导致其思想创新能力减弱,但佛教徒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民间横向自发结成的神佛结合的信教活动如寺院巡礼、富士信仰等经久不衰。

(二)铃木正三的思想及其价值

佛教对工匠精神的决定性贡献,在于大众思想家铃木正三(1579-1656)的“职业修行说”。

铃木为武士出身,战国时代作为德川属下本多宗信的家臣参加过几次关键战役,战乱结束后做过行政官僚,年过四十后放弃家业,出家为禅僧,通过刻苦修行而悟道。针对大变动后民众渴盼稳定而又对固化的身份制感到窒息和茫然的现实,铃木跨越各派的樊篱、结合净土与禅宗阐述了答案。

他的基本理论是:宇宙的本质在于“一佛”,具有“月”、“心中佛”与“大医王”三种价值。一月映万川,佛就如月亮普照众人,故佛性通万人,人人心中皆有佛,但长期战乱表明人心有病,需要靠大医王(佛法)来医治。人们若发挥佛性,按心中佛来行动,那么众生皆能成佛。当然,医治自己必须靠修行。^①铃木对出家修行并不赞成,认为在家劳动才是光荣的。他在净土派“现世求道”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职业修行”观点,认为“世法即佛法,世业即修行”,放下万念、一心不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自然就能忘却烦恼,得到解脱,故而勤奋工作就是修行。

^① 山本七平『日本の資本主義の精神』154-157頁;神谷満雄『鈴木正三』PHP文庫、2001年。

他说：“春夏秋冬一日四时总是在修行之中，哪里还需要别的修行方式呢！”^①

铃木认为四民平等。在“日用四书”里论述道：如果没有铁匠等各类手工业者，世界就会有诸多不便，这和没有武士世界就不安全，没有农民大家就没有粮食，没有商人就会生活不自由一样。所有的职业都是有利于社会的，这就是佛性的德之所在，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修善行。佛性人人具足，大家都有成佛的希望。而且，现在的身份乃前世所定，现在努力工作，是履行对来世的责任。在铃木看来，勤奋、正直，不贪欲，由此获得的利益也是合理的“无漏之善”。^②

铃木正三的“职业修行”观是佛教世俗化思想的集大成，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天职说”具有类似之处。铃木不仅著述讲学，还撰写大众教化读物，被认为是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者。^③此后的大众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3)深受铃木影响，他撰写的《西鹤织留》一书对工匠雇工持肯定态度，认为提供工作岗位正是慈悲与善根。江户中后期，屡禁不止的民众佛教“富士讲”也主张四民平等，认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善行，会有好运。^④还有研究表明江户中期的石田梅岩在思想体系上与铃木也是一脉相承，他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是铃木学说的儒学翻版。^⑤

总体来说，日本人的勤勉精神深受“现世求道，职业修行”观念的影响。手工业由于工作环境和对象比农业、商贸活动更为局限，且技术工作要求聚精会神，所以工匠的行为特征多体现为勤勉努力、心无旁骛、专注一心、清心寡欲。许多工匠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动作以至于骨骼变形，健康受损，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命去造物。对于工匠来说，工作就是进入无我之境，忘却烦恼，修行成佛的日课。

四、工匠精神与神道的劳动观、造物观

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的朴素思想对日本人心性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是工匠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它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劳动观与造物观。

① 铃木正三『铃木正三著作集Ⅰ』（加藤みち子訳）中央公論新社、2015年、46頁。

② 铃木正三『铃木正三著作集Ⅰ』、48-51頁。

③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小笠原真『近代化と宗教』世界思想社、1994年。

④ 森和也『神道，儒教，仏教—江戸思想史のなかの三教』筑摩書房、2017年。

⑤ 山本七平分析了石田与铃木思想的一致性，以及两人之间明确的传承关系。参见山本七平『日本の資本主義の精神』第2章。

(一)神道的基本思想和劳动神圣观

日本的土著原生信仰,是崇拜自然神的泛灵论以及萨满神秘主义。认为山川草木皆有灵,岩石、水瀑等均有神灵寄托其中,有所谓 800 万神灵说。这种原生的多神、自然神信仰自古有之,但只到中世纪才在借鉴道教的基础上形成神道。

由于神道具有多神信仰的特点,日本人在宗教上较为开放、宽容,儒释东渐以来,总体实现了“神佛合习”、“神儒一体”的局面。^①但纵观日本历史,即使在佛教兴隆时期神道也并没有被边缘化,它是日本人文化心理结构中最核心的底层。正如吉田兼俱(1435—1511)假托先人著述所言:“吾日本生种子,震旦现枝叶,天竺开花实。故佛法乃万法之花实,儒学为万法之枝叶,神道为万法的根本”。

日本的自然神信仰是以地母神信仰为基础而展开的,认为人类劳动是神生育、生产活动的代理行为,故而能带来作物或产出的体力劳动具有极大的价值,劳动乃是神事。而且因各种神灵的所产多种多样,相应地各行各业的劳动也都具有宗教意义,无高低之分。这种劳动神圣观、平等观迥异于基督教等一神教的劳动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观念,也是日本人勤奋工作的宗教根源之一。^②

作为水稻农耕国家,农业生产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神事,直到现在,皇宫里都种植有水稻,天皇每年都要插秧和收割。就手工业来说,最早从大陆过来的工匠具有较高的技能,被认为有融通自然的神力而被称为“神人”。^③由于“职人的产品为提升使用者的生命力而发挥作用,职人的工作带有神圣的性质”,^④因而名匠的实际地位一直较高。

(二)物我合一、生命力共感的工匠造物观

日本人相信劳动成果不仅需要个人努力,更需要神灵的保佑和恩赐才能得到。所以,他们敬畏自然界的神灵和大自然,感谢职业神和祖师爷,感谢劳动工具。许多工匠每天都从祈神进入工作,或非常虔诚地定期举办正式祭祀。

工匠认为素材是大自然所赐、具有神灵依附的生命体,哪怕是一块石头都有灵性。他们总是虔诚地与素材进行心灵的沟通,倾听它的诉求,理解它的感觉,领悟它的固有价值,在互动

① 加藤周一称日本文化为杂交文化,内田樹则称之为合习文化,参见,加藤周一「日本文化の雜種性」『加藤周一セレクション・5』平凡社、1999年;内田樹『日本習合論』ミシマ社、2020年。

② 保坂俊司『宗教の経済思想』第4章。

③ 網野善彦『日本中世の百姓と職能民』241頁。

④ 岩田均『「職人仕事の本質」』『立命館経営学』、2009年第48卷第4号、137頁。

中产生一体感、亲密感,并得到生命的启迪。我们可以通过大量资料感受工匠的这种精神活动。比如碗具木工师说:“树木自有年轮,漆也来自树木,我什么也没做,只有感谢材料,仅此而已”;^①造园师则说,“倾听石块的述说,它会告诉你把它放在何处,用哪种摆法,它会最高兴”;^②木匠说“树龄两百年的木材,我用它做出的东西必须能用得上二百年才行,否则就是对它的大不敬”^③……正如岩田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生命个体的工匠将材质、作品、工具等视为自然所赐并具有同样的生命力,他们通过物-我生命之间的共鸣而不断获得生命力的升华”。^④

优秀工匠一生都在磨练发现、展示素材固有价值的技能。他们将素材用于所用之处,注入自己的敬意,通过创造赋予它新的生命力;他们以作品为载体,努力将自己对神灵的崇敬和理解传递给使用者,让使用者感知作品所蕴藏的力量,体验一品一魂的价值,从中获得启迪和喜悦,进而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最终达到物我、主客同乐的境地,这就是“おもてなし”的真正含义。^⑤笔者认为工匠永无止境追求造物极致,乐此不疲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此。

这里仅举一例:京都一位日料名厨几十年每天必去郊外山田里采集野菜,不断探索加工办法做出新的菜品。他说:“每个季节里即使最不起眼的山野菜都充满了生命力。我所做的就是不断地去发现它们、透彻地理解它们,通过料理,最大限度地把它们原始、自然的生命奉献给食客,让客人感知大自然的生命力”。^⑥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工匠精神的第三个特征归纳为崇神敬物、感恩自然、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有万物平等、物我合一的境界和一品入魂的技艺。一个真正的工匠对任何糟蹋材质、亵渎产品、欺骗顾客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应该说这种源自于神道原始朴素思想的工匠品质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更长远的影响力,历久弥新,在人与自然对立的现代造物观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更显得珍贵。

① 赤木明登:《美物抵心》(蕾克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87页。

② 小関智宏『職人ことばの「技と粹」』東京書籍、2006年、166頁。

③ 永六輔『職人』岩波新書、1996年、17頁。

④ 岩田均『職人仕事の本質』、138頁。

⑤ 该词一般理解是“款待客人”或“表里如一地待客”,其真正语义是“…を以て…成し”,即“依凭某物而实现某种状态”。参见岩田均『職人仕事の本質』;小林潔司等著『日本型クリエイティブサービスの時代』日本評論社、2014年。

⑥ NHK 专题节目“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仕事の流儀”『四季を感じ、命を食す』(2014年3月31日)。

五、工匠精神中儒学、佛教、神道的作用再思考

以上讨论了工匠精神的儒佛神三大思想基础,由于日本长期是神佛儒交融,广义的工匠精神(职业平等观与勤奋观)可以说是儒佛神共同作用的产物。江户时期的思想家大都是兼修各派,前述儒学的天道通职业道说,佛教的职业皆善行说,神道的劳动神圣观都肯定了职业分工的合理性和平等性。同时,儒佛神道也都鼓励勤奋。儒学认为勤奋精进、努力传家是最大的孝行,佛教认为勤奋工作就是修行,神道的劳动神圣观更不必论。

但是,三教毕竟有别,如二宫尊德所言,神道为开国之道,儒学为治国之道,而佛教为治心之道,^①在工匠精神里三者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尽管儒学5世纪就传入日本,日本只是长期借用其典章和语言范式。江户时代以朱子儒学治国,也是以人伦秩序的教化来管理职分制国家。实际上江户时期的儒学者大都对理学抱有疑问,武士对理学也无法心服口服,江户中后期国学对儒学也不断发起批判。^②正如李泽厚所言,“日本儒学排拒的是中国儒学的理论思辨的理性系统,而吸取和发挥的是中国儒学中具有实用价值和社会性内容突出的方面。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执行性’。”^③笔者认为,日本儒学主要为工匠处理自己与他人,自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外在的道德约束(义理),真正从内面影响工匠心性的,给予工匠内在激励的是佛教和神道。

神道与佛教是日本思想的大传统。鎌田认为佛是“成为体”和“往者”,神是“存在体”和“来者”,佛教基于人间主义而神道基于自然主义,两者具有互补性。^④笔者以为日本世俗佛教,特别是职业修行说教导工匠诚心诚意在工作中修行,在现世获得解脱,得到心灵净化,比去往来世进入极乐净土更强调现世的幸福,从而赋予了日常工作的现世性宗教意义,因而,工匠更能感受到信仰的内在的召唤和激励。从神道角度看,工匠敬畏神灵,感谢自然,努力精进,在工作中达到物我合一、神人互动、万物交融的境界,通过生命的共感而不断获得正能量,因而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意义。这既是宗教性也是审美式的精神愉悦,是一种更为持久、更为深远的激励动因。

① 二宫尊德『二宮翁夜話』、第231条。

② 可参考,子安宣帮:《江户思想史讲义》(丁国旗译)三联书店,2017年;橋爪大三郎·大沢真幸『げんきな日本論』第三部,以及村上泰亮等著『文明としてのイエ社会』第11章第四节。

③ 李泽厚:《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李泽厚旧说四种 说文化心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④ 鎌田東二『神と仏の出逢う国』角川選書、2009年、28-30頁。

总之,佛教与神道给予工匠行为的内在影响力应该大于实用性儒学外在道德的约束和压力。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在著名的丰田纲领里列出“尊崇神佛、报恩感谢”一条了。

明治维新后,随着身份制度的废除以及西学的冲击,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儒教伦理规范部分失效。西村茂树(1828-1902)等人掀起了“国民道德运动”,旨在重建儒教道德。他们提倡家国一体、忠孝一本,以忠为第一美德,与国家神道观一起推动了教育敕语出台,极大地扭曲了教育观。^①二战时期,产业奉公报国也被标榜为日本劳动阶层的美德,工匠精神中一部分职业伦理被歪曲和利用。

战后日本否定国民道德观,实行政教分离,民众对国家神道有着深深的戒备,多数日本人已不再持有绝对的宗教信仰,工匠精神的宗教基础更多地被隐形化了。不过神道和佛教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据日本文化厅统计,2019年全国有寺庙近7.6万所、神社8万所,佛教神道信者各有8483万和8895万,佛教或神道仪式依然重要,宗教民俗纪念活动仍十分活跃。神道佛教经过长期积淀已经内化为日本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借用丸山真男的表述,是思想的“古层”、“执拗的低音”。^②尽管由于历史巨变,部分儒教道德规范与时代脱节,也有被国家政策左右的历史,但工匠精神中佛教与神道的因素一直发挥着比较稳定的作用。这正是工匠精神能够在战后传承至今的关键理由。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例子印证:一些传统老店里,现在仍可见80多岁的老人每天忘我工作的情形,他们并无传家压力和生活困扰,对他们而言工作只能说是体现生命价值的修行。常有匠人说自己是在削减生命地干活,也有匠人说每天工作就是自己的活法。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佛教日用而不知的影响力。二是许多工匠现在还按传统方式每天祈神,不少企业内设有神社并开展祭祀活动。^③工匠崇神敬物,感恩自然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一些名匠本人还是哲学家、作家、出版人,或是禅师,他们通过著书立说等方式进一步传播了日本独特的造物观。^④

六、工匠精神的传承及所面临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比较,日本传统与现代产业都较好地继承或演绎了工匠精神。这除了有传统

① 清水正之『日本思想史全史』筑摩書房、2014年、313-316頁。

② 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加藤周一等著『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岩波書店、1984年。

③ 植松忠博「日本人のカミ信仰について」『国際協力論集』、1994年第2卷第2号。

④ 比如造园师枡野俊明、刀具师土田升、漆师赤木明登等都是当代有影响的工匠精神传播者。

宗教的稳定支撑,还有赖于事业、制度、人才等载体的良好传承。

(一)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里的工匠精神传承

首先,尽管传统行业式微,规模已大幅度缩小,但还是有许多企业或家庭实现了家业传承。目前日本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9.7%,家族企业数量较多,本世纪初由子女继承家业的仍有73.9%。^①许多家族企业或大户历经数百年仍然保留了家名,在一些手工行业及传统文娱界,至今仍以“袭名”方式传承事业。日本百年老店数量世界最多,两百年老店也占世界近一半,千年以上的老店就有7家。

代代相传的企业里,接班人多数自幼受家庭氛围熏陶,他们继承了技术,也传承了家规、社训。有调查表明,百年老店中超过7成的当家人认为家训重要,35%以上认为继承了家训是企业得以生存下来的理由。^②在技术传承上,传统行业仍坚持学徒制度,尽管修业年限有所缩短。还有一个现象,是一部分接班人毕业于名校,在大企业历练后再回家接班。由于接班人素质高,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创新企业为数不少。

政府和社会对传统产业的保护也是重要的外部条件。从明治政府对手工业出口的扶持、大正时期的民艺运动、到1974年《传统工艺振兴法》的实施等,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市场需求的支撑。老店和传统职业保留了传统文化与技术,传递了美感和精致,因而培养、提高了日本人的审美情感和品质意识。目前,日本国内外消费者对日式手工制品、传统食品及传统服务的需求有增无减,传统民俗、宗教以及艺术行业的需求也支撑了一大批手工行业。

再看现代产业。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能够较为顺利地发展近现代工业,部分得益于传统手工业丰厚的技术和人才积累。许多工匠或学徒加入到现代产业,一批人成为现代大企业的创始人。^③从传统老店转型成长为现代大企业的例子也比比皆是,2017年日本上市企业中百年老店占总数的15.4%,数量达500多家。

现代产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养成有诸多因素。一是企业制度,众所周知,终身雇用、年功工资以及企业内工会被称为战后日本企业管理的三大神器,日本企业较好地实现了企业蓝领的白领化。这种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江户时期的“家体系”,员工与企业共命运,具有较强的忠诚度。二是现代企业也借鉴学徒制采取了企业内部在岗培训的方式,主要做法是手口相传、老员

① 中小企業庁『中小企業白書2013年』、139頁。

② 横澤利昌編著『老舗企業の研究』生産性出版、2012年、160頁。

③ 丰田汽车、松下电器、本田汽车的创始人丰田佐吉、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等人都是学徒出身。

工带新手,产业工人普遍训练有素。企业员工勤奋敬业,通过不断改善,到上世纪80年代将生产效率和品质推到世界一流水准。当然,全社会对质量高度重视,政府技术标准以及行业自定标准极其严格等也是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

总体而言,现代日本的传统工匠和产业工人都基本保持了勤勉努力的品质,具有较高的职业自豪感和敬业精神,钻研技术的风气十分浓厚。日本社会也普遍尊重工匠和劳动者。这里仅举几例,比如电视台长期高频度地播放关于工匠、老店的节目,各种职业技能比赛节目也很受大众的欢迎;多年的调查显示,日本小学生中男孩愿意当木匠、消防员,女孩想当糕点师、护士的比率一直名列前茅;不少大企业的白领职员离职或退休后去开小面馆、面包店,或去做手工艺,有些人为了的就是做出最好的东西,圆儿时的梦想。

(二)传承与改进工匠精神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20年来工匠精神的传承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难题,工匠精神部分要素的固化所呈现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第一,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的恶化,家族企业的经营者高龄化以及后继者匮乏等问题最近十几年里日益突出。有一些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小规模家族企业因此而关闭。这也意味着工匠精神的载体被削弱。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为精准的帮扶政策,帮助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小企业解决后继者问题。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加速淘汰那些阻碍新产业发展的、已毫无生命力的老旧僵尸企业。^①

第二,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大变,为了提高流动性并降低劳动成本,不少企业在维持正式工待遇的同时也招用了许多非正式工。目前日本工薪阶层中非正式工人数占比已高达40%,他们的待遇和就业稳定性较低。一部分行业里,员工的职业道德、敬业意识以及技术熟练程度有所下降。近几年,大企业针对高级白领阶层开始导入灵活的雇用和工资制度。在雇用形态多样化的状况下,如何筑牢全体员工的工匠精神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第三,工匠精神毕竟成型于江户时代,适合于稳态社会,对维持既有的经济秩序有一定的亲和性。因此,工匠精神的一些要素固化就会排斥灵活、开放、包容的思想。最近20年来的事实表明,在一些国际竞争激烈、面临开放环境的行业,比如电子器械行业里,企业管理者或技术人员遵循前例,过于拘泥于传统市场、传统经验与技术,或固守封闭的组织模式,不能有效

^① 任云:《失去的20年》与“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

利用全球产业链实现价值最大化,导致企业陷入了困境。^①日本近年来创新型企业、IT 独角兽企业数量极少,也与思想保守有关。如何推动工匠精神与时俱进,增加开放、创新元素,也是一个亟待探索的课题。

七、结 语

本文从制度、文化与宗教因素等角度分析了日本传统的工匠精神,探讨了工匠精神现代传承的有关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工匠精神具有三大本质特征,基本逻辑是:职业是安身立命的身份,遵守规矩、传承家业是使命;职业是修行,勤奋工作是成佛解脱之路;职业是神事,造物就是在传递神灵和生命的力量。三个方面分别对应如何处理自他关系、自我认知以及物我关系,有着儒学、佛教和神道的思想呼应。与儒教主要施加外在道德规范约束,具有功利性价值,且受时代影响而不够稳定不同,佛教是救赎性的精神激励,而神道给予了工匠造物工作的审美愉悦,后两者的影响更为内在、稳定。

日本工匠精神传承至今,主要得益于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基础底蕴丰厚,也有制度和环境等有利因素的作用。工匠精神目前也面临着传承载体不足,以及如何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课题。

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对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弘扬工匠精神特别需要唤醒传统文化自觉。我们需要在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营养和载体,也需要对“学而优则仕”的职业不平等观、“大制不割、大巧若拙”的审美观等有所扬弃。通过文化继承与创新,为构建工匠精神提供牢固的精神资源。

(任云,日本樱美林大学文理学院经济学专业教授)

^① 参见任云:《经济走低时,我们能向煎熬过的日本企业学点什么?》前瞻经济学人 2020 年 4 月 27 日 (<https://t.qianzhan.com/daka/detail/200427-d5876d28.html>)。

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探析^①

卞显乐

内容提要 2021年10月,岸田文雄在当选首相后的首次施政演说中明确提出了旨在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中产阶层的“新型资本主义”构想。这反映出日本执政者已经意识到本国贫富分化的严峻性。早在1998—2008年前后,日本社会就已经逐渐认识到本国存在贫富分化的趋势。究其成因,主要可以归结为4个方面:经济全球化竞争、科学技术进步、非正规雇佣扩大化、税收制度的积弊。并且随着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使得日本社会相对贫困问题日趋严峻、少子化问题雪上加霜,“中产社会”逐渐解体。鉴于此,部分日本学者从就业和税制两大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一是,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实施同工同酬,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活性化,试图以此来降低失业率和缩小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之间的薪资差距;二是,从二次分配层面,呼吁对日本的所得税、资产税、消费税进行改革。

关键词 日本 贫富分化 差距社会 格差社会

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国民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问题逐渐显现,“一亿总中流”式的“全民中产社会”开始瓦解。直至21世纪初,日本社会涌现出大量低收入群体,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2020年起,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日本社会失业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猛增,收入与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2021年10月,新上台的日本第100任首相岸田文雄觉察到了日本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性,提出了构建“新型资本主义”,打造“令和版所得倍增计划”,继续扩大中产阶级比重的施政构想。由此可见,治理贫富分化问题必将成为日本政府今后施政的重点。探究平成时期日本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对于把握未来日本社会发展趋势,理解当下日本在内

^① 本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平成时代日本的收入与分配差距研究》(项目编号:2021-KY-77)的支持。

政方针上的战略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一、平成时期日本社会对于本国贫富分化的认知过程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学家岸本重陈就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视角出发,批判“一亿总中流”是劳资对立缓和的表现,营造了“无阶级社会”的假像,遮掩了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产生机制。^①由于彼时日本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国民生活富足,因此岸本重陈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众认可。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化使得原本被隐藏的收入与财富差距问题逐渐凸显。迈入 21 世纪以后,以“差距社会论”为代表的贫富分化问题才终于引起日本社会的重视。这一认知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日本学者间探讨日本社会是否存在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层面,日本学者和政治家围绕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是否有益于日本社会发展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一)日本社会是否存在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1998 年,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橘木俊诏率先指出日本社会存在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并指出再分配政策的弱化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另外,他还认为收入与分配呈现不平等的发展趋势,而资产分配在泡沫经济时期甚至呈现出极端不平等的状况。^②大阪大学经济学教授大竹文雄针对橘木俊诏主张的“差距扩大论”提出了异议。大竹文雄认为所谓的差距扩大实际上是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单身家庭和夫妻双人家庭增加而引起,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收入差距扩大。^③以内阁府为代表的日本官方同样也否定了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的观点。2006 年度的《经济财政报告书》第 3 章第 3 节指出,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于高龄者家庭增加或是家庭人数减少而导致的家庭形态变化而引起的”。^④不久之后,橘木俊诏便援引收入分配调查、家计调查、全国消费实态调查、工资构造调查共 4 项日本官方统计调查数据,对内阁府的《经济财政报告书》以及大竹文雄的观点予以反驳。通过分析上述 4 项统计调查数据,橘木俊诏指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日本收入与财富差距不断扩大。从国际视角来看,2004 年 OECD 发布的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程

① 岸本重陳『「中流」の幻想』講談社、1985 年。

② 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岩波書店、1998 年。

③ 大竹文雄『日本不平等—格差社会の幻想と未来』日本経済新聞社、2005。

④ 内閣府『平成 18 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 <https://www5.cao.go.jp/j-wp/wp-wp-je06/06-00303.html>, (2021 年 12 月 16 日访问)。

度调查表明,日本已经与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同属于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①除橘木俊诏之外,京都大学教授宇仁宏幸通过研究 1999 年至 2004 年各年龄段的年收入基尼系数后发现,60 岁以下各年龄段劳动群体的年收入基尼系数都呈现上升趋势,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明显扩大。^②面对橘木俊诏和宇仁宏幸的先后驳斥,大竹文雄为自己辩护,声称大众将自己视作差距论否定者是对其本人的误解。他说道:“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受老龄化的影响,关于终身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正在进行研究中”。^③对此,桥本健二认为大竹文雄的上述言论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存在。^④

(二)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是否有益于社会发展

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指导思想的小泉构造改革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是否有益于日本发展的探讨。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起步时间相对较晚,其中,小泉构造改革属于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第四阶段,同时也可以视作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高潮部分。^⑤在泡沫经济破灭,经济停滞不前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国民对于小泉纯一郎的当选寄予了厚望。其本人也斗志昂扬,声称为了重振日本经济,将施行“没有禁区的改革”。^⑥在 5 年多的执政时间中,小泉对日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做出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为日本经济复苏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 2006 年小泉离任后,也给日本社会留下了诸多争议。其中,围绕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否导致了日本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议论不绝于耳。从表面上来看,探讨的关键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其核心是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是否存在对立性的问题。即发展经济是否要以牺牲分配公平为代价,默许国民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拉大。

力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提高经济效率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其中,以竹中平藏和小泉纯一郎最具代表性。2006 年 1 月的通常国会上,面对自民党党内以及在野党对于收入与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质疑声时,小泉纯一郎直言不讳地

① 橘木俊诏『格差社会:何が問題なのか』岩波書店、2006 年。

② 宇仁宏幸「日本における賃金格差拡大とその要因」『経済理論』2008 年、第 45 卷、第 1 号、第 21 頁。

③ 大竹文雄『格差と希望—誰が損をしているか?』筑摩書房、2008 年。

④ 橋本健二『中流崩壊』朝日新聞出版社、2020 年、139 頁。

⑤ 李月、古賀勝次郎:《日本经济政策与新自由主义》,载《现代日本经济》,2008 年第 4 期、第 6 页。

⑥ 2001 年-2006 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的经济政策口号,也被日本社会称作“小泉构造改革”或“新世纪维新”。

表示“我不认为差距是件坏事”、“如果嫉贤妒能,妨碍有才能的人发挥干劲的话,社会将无法进步”。^①从而表明了其认为收入与财富差距具有正当性的态度与立场。

但是橘木俊诏却认为小泉构造改革通过牺牲分配公平来换取经济发展效率的做法有很大弊端,因此对于这种漠视贫富分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在橘木俊诏看来,“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若制定合理政策可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②他指出:“二战后,日本由自民党执政,而自民党长期以来的施政方针带有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偏重经济增长的政策成为传统。”^③曾经高举新自由主义改革大旗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④其态度也从支持转为批判,为此专门撰写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一书揭露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致使日本贫富差距拉大的负面作用。^⑤从目前日本社会的状况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能解决好日本的民生问题。岸田文雄上台后,承诺将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的良性循环。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所推崇的“涓滴经济学”已经进入了政策调整的新阶段。

二、平成时期日本社会产生贫富分化的原因

日本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日本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引起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⑥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特别是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模式逐渐被水平分工的生产模式所代替。在跨国公司的组织下,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加入到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其中,日本的劳动者群体不得不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者进行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群体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出现薪资逐渐降低的情况。但居于专业技术性较强岗位的日本劳动者群体仍然拥有优势。在全球化竞争中,从事这

① 橘本健二『中流崩壊』朝日新聞出版社、2020年、141—142頁。

② 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岩波書店、1998年。

③ 橘木俊詔『21世紀日本の格差』岩波書店、2016年、127頁。

④ 1974年至1999年,中谷岩在大阪大学经济学部、一桥大学商学部任教期间,先后参与了细川内阁的“经济改革研究会”、小渊内阁的“经济战略会议”,对于推动日本的构造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本人在“经济战略会议”中提出的众多议案中有几个议案被小泉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

⑤ [日]中谷岩著,郑萍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⑥ 榎原英資『中流崩壊:日本のサラリーマンが下層化していく』詩想社、2015年、195頁。

部分工作的劳动者仍然能够保持工资的平稳。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第二,科学技术进步导致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使企业对于高知识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提升,从而拉升了高知识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了其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日本社会学家、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指出,日本经济朝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转型升级势必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① 在新经济之下需要专业能力较强的工种,同样也存在着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只需要勤勤恳恳工作的工种。这样在职业能力上便产生了“质”的差距。企业为了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会给专业能力强的劳动者开出丰厚条件。因此,前者能够获得稳定的就职环境,并且能够获得较高的薪酬。但后者因技术含量低,可替换性强,收入相对较低,且面临较高的解雇和失业风险。其二,教育作为培养人才、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直接影响了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小政府运作模式导致了日本公共教育支出在 OECD 各国中处于最低水准,因此,在贫困率不断攀升的日本,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打破了教育的机会平等。另外,教育与就业严重脱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以后无法就业,出现了教育结果的不平等。^② 大阪大学教授吉川徹认为,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的学历差距导致了收入与财富领域的差距,并且指出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数量在全国人口中几乎占据了相同的比重,而且今后这种状况将呈延续之势。^③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雇佣制度出现了多样化、灵活化的趋势,催生了大量的非正规雇佣劳动者。20 世纪 80 年代,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大,不仅扩大了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同时也增加了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数量。20 世纪 90 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助推了日本企业建立雇佣非正规劳动者的制度。此后,由于不良债权的影响,日本经济长期陷入经济不景气的境况,非正规雇佣制度逐渐常态化。1995 年后,日本社会雇佣制度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雇佣形态上,合同工、派遣员工、临时工等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增多。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迎合了财界的需求,在法律层面上为非正规雇佣的扩大化进行了制度松绑。与正规雇佣劳动者相比,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在工资、岗位稳定性以及企业福利待遇上都相对较低,因此,加剧了劳动者群体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发展。正如日本社会学者桥本健二所

① 山田昌弘『希望格差社会:「負け組」の絶望感が日本を引き裂く』筑摩書房、2004 年、61 頁。

② [日]橘木俊诏著,彭曦译:《日本の教育的不平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指出的那样,非正规雇佣的扩大致使劳动者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导致正规雇佣劳动者和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在收入层面的差距扩大。^①

第四,作为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环,平成时期的税制改革亦直接加剧了贫富分化。1987-1989年日本对战后“夏普劝告”^②所建立起来的税制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出现了明显地税率下调。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基本延续了1987-1989年根本性税制改革所确立的方向。因此平成时期日本的税收政策变化的总体趋势是,金融所得税、法人税减税的同时,对给予所得税和消费税实施了增税。^③从1990年到2004年,日本的所得税和法人税的数额几乎减少了一半。所得税从26兆日元降低到了13兆800亿日元。法人税从18兆日元下降到了9兆400亿日元。但相比之下,消费税数额则从4兆6000亿日元提升至9兆6000亿日元。从税率方面来看,1985年法人税的税率达到了43.3%的峰值水平。然而90年代时,则迅速下降到了30%。^④所得税税率也从1983年以前的75%大幅下降至45%。^⑤遗产税也从1987年的75%降至55%。^⑥并且从2003年开始,导入了继承时精算课税制度。这项制度使得生前对于子女的财产赠与变得更容易。^⑦此外,消费税的逆进性也对贫富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⑧自1989年4月1日起,日本政府开始以3%的税率征收消费税,此后3次上调税率,分别为1997年调至5%,2014年调至为8%,2019年10月提高至10%(食品、报纸适用减税范围仍维持8%)。值得注意的是,在低收入群体中,消费占收入的比重相对较大,用于储蓄的资金相对较少;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相对较小,用于储蓄的资金相对较多,因此,

① 橋本健二『アンダークラス——新たな下層階級の出現』筑摩書房、2018年。

② 194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普为首的“夏普税制调查团”对日本的税制提出的著名改革方案。日本由“夏普劝告”改革后的税制亦称“夏普税制”。

③ 张冰、刘德强、金戈:《日本税制改革的脉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6期,第63页。

④ 神野直彦、宮本太郎『脱「格差社会」への戦略』岩波書店、2006年、20—21頁。

⑤ 国税庁「所得税の税率」,<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taxanswer/shotoku/2260.htm>,(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⑥ 国税庁「相続税の税率」,<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taxanswer/sozoku/4155.htm>,(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⑦ 神野直彦、宮本太郎『脱「格差社会」への戦略』岩波書店、2006年、22頁。

⑧ 所谓逆进性是指对于低收入群体征收了较多的税款,而对于高收入群体仅仅只征收了较少税款。开征消费税前,日本征收的是物品税,即对划定为奢侈消费品的物品征税。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民众的消费对象从实物越来越多的转向服务。因而,如何判定何种消费品为课税物品引起较大争议。这也是改征消费税的重要原因之一。

容易在财富积累上造成贫者愈贫的恶性循环。^①

金融所得税、法人税、遗产税的减税,有利于拥有较多资本和资产的富人阶层;而给予所得税和消费税的增税则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税收负担。虽然日本的消费税在世界范围内不算高,但单一制税率的逆进性仍然给低收入群体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综上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出税制政策的变化加剧了日本社会的贫富分化。

三、平成时期日本社会贫富分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收入与财富扩大使得日本社会相对贫困化问题日趋严峻,少子化问题雪上加霜,“中产社会”业已沦为“差距社会”。

(一)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加剧了相对贫困化问题

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将直接引发贫困问题。由于日本在讨论是否存在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问题上耗时过长,政府反应较为迟滞,未能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因此,日本社会的相对贫困问题日渐突出。从纵向来看,近年来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居高不下。^②从1985年的12%,波动上升至2015年的15.6%。从横向来看,“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在OECD国家中的相对贫困率始终高居第2位,仅次于美国”。^③由此可以反映出,在纵向和横向上,日本的贫困问题都不容乐观。其中,就贫困群体而言,青年贫困和儿童贫困问题尤为突出,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较大。

从年龄段来看,青年群体是社会劳动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青年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关乎整个国家的未来,然而,目前相当数量的日本青年为维持生存而焦虑。在初次分配过程中,非正规雇佣的就业方式给青年群体造成了就业环境不稳定和收入过低等问题。而再分配过程中,日本的社会福利政策依然以老年人、残障者、儿童、母子家庭为中心,将青年群体排除在外。在传统认知中,青年群体通常不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这种观念上的错觉使得青年群体容易受到社会忽视,从而造成面向此类群体的救助政策较为匮乏。他们虽然每天忙碌,但却依然处于贫困之中,因此,这类群体在日本也被称为“穷忙族”。社会活动家藤田孝典则将之称为“贫困世代”,他认为如果不适当地救助这类青年群体,贫困世代将会随着老龄化的推移而

① 橘木俊詔『格差社会:何が問題なのか』岩波書店、2006年、190頁。

② 家庭等价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即可视为相对贫困群体。

③ 厚生労働省『平成24年版厚生労働白書』, <https://www.mhlw.go.jp/wp/hakusyo/kousei/12/dl/1-05.Pdf>, (2021年12月16日访问)。

形成老年贫困。对于这类群体来说,他们不仅是非正规雇佣政策下牺牲的一代,将来也会给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沉重的负担。

儿童贫困是受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而产生的。大和总研经济调查部研究员沟端干雄指出,单亲家庭儿童贫困率更高是日本儿童贫困的特点。按家庭类型来看,2015年日本单亲家庭的儿童相对贫困率为50.8%,其中,母子家庭贫困率更是高达48.1%。^①除了缺失配偶的收入从而导致家庭收入减少之外,父亲或母亲成为非正规雇佣员工也是孩子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2019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国民生活基础调查》以OECD标准统计得出日本儿童相对贫困率为13.5%,与2015年的13.9%相比,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依然是7名儿童中有1名儿童为贫困状态。^②而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60%的标准来计算,2019年日本儿童相对贫困率为18.8%。^③在学习条件、受教育的机会与质量方面,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产生较大差距。教育上的差异则会加剧阶层固化,从而导致不平等结构的再生产。

(二)男性非正规雇佣者收入低,少子化问题雪上加霜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高桥琢磨指出少子化问题源于社会结构造成的工资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助长了年轻人的非婚和晚婚现象。^④从成因的角度分析,日本的非婚、晚婚分为2种类型:一类是个人主动的不婚、晚婚;另一类是许多年轻人因为经济条件较差而被迫选择不婚和晚婚。对此,日本评论家三浦展专门开展了关于男性年收入与结婚与否的关联度调查,并指出年收入500万日元是男性能够顺利结婚的经济保证。^⑤事实上,日本男性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薪水低于正社员,其结婚的困难程度较高。根据2019年《劳动力调查》显示,男性非正规雇佣劳动者总数为691万人,约占男性总雇佣人数的22.8%。其中,男性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年薪低于500万日元的人数占95.1%,年薪低于300万日元的人数为78.6%。^⑥瑞穗综

① 沟端干雄「忍び寄る「子どもの貧困」が日本の潜在力を奪う」大和総研(2019年1月9日)、https://www.dir.co.jp/report/research/policy-analysis/human-society/20190109_30023.pdf,(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② 「子どもの貧困率 13.5% 7人に1人、改善せず」,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61680420X10C20A7CR8000>,(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③ 「教育格差—日本における現状とコロナ禍で拡大する格差とは?」,Teach For Japan,<https://teachforjapan.org/entry/column/2020/09/28/kyouikukakusa/>,(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④ [日]高桥琢磨著,张同林、杨理亚译:《二十一世纪的不平等:只有这样做日本才会走向新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⑤ [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⑥ 総務省統計局「2019年労働力調査平均結果の概要」,<https://www.stat.go.jp/data/roudou/sokuhou/nen/dt/>

合研究所政策调查部研究员大嶋宁子也指出日本社会的传统理念是男性工作养活家庭,因此收入较低且不稳定的非正规雇佣男性占比提高,导致了日本女性选择结婚对象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加剧了日本社会未婚化的发展。^①低结婚率势必会导致低生育率,使得日本少子化问题雪上加霜。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2019年度日本的新生人口数为86.4万人,首次跌破90万人大关。^②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一亿总活跃相”卫藤晟一在官邸会面时,直言出生人口的持续降低是日本的“国难”。^③

(三)“中产社会”日益分化,“差距社会”已成定局

随着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加剧,日本的“中产社会”日益分化。其特点是位于“中产阶级”底部的群体容易滑向下层社会,而顺利挤进上层社会的“中产阶级”则非常少。三浦展称这种现象为日本“中产阶级”的“下流化”。^④相比于20世纪70、80年代“一亿总中流”时期的悠闲舒适,阶层“下流化”使得日本“中产阶级”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担心自身和下一代未来能否依旧保持“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山田昌弘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世界规模的经济竞争,日本劳动者的工资和社会保障都跌入最低水平,日本“中产阶级”为了防止跌落至底层社会,从而出现了“逐底竞争”^⑤现象。山田昌弘还指出在“逐底竞争”中,日本社会阶层将逐渐固化。伴随着“一亿总中流”式中产社会的崩溃,“差距社会”已经成为了全体日本国民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后,不仅仅学者通过各种统计调查的数据论证“差距社会”的存在,就连普通日本国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在日益加深。根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2020年4月公布的一项社会舆论调查显示,2019年实施的调查中有69.4%的日本民众认为日本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相较于1999年的63.9%,上升了5.5%。^⑥此外,当被问及日本社

① 大嶋寧子「少子化要因としての雇用不安化」みずほ総合研究所(2011年12月)、<https://www.mizuho-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research/r111201employ.pdf>,(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② 厚生労働省「2019年人口動態統計結果の概況」,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kakutei19/dl/02_kek.pdf,(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③ 「安倍首相、出生率低下で対策指示「国難だ」」,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W-ZO53841600W9A221C1PP8000>,(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④ [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⑤ 2000年,美国学者Alan Tonelson(アラン・トネルソン)出版论著《The Race To The Bottom》,指出在全球化进行中,由于世界规模的经济竞争,劳动者的工资和社会保障都跌入最低水平的情况成为“逐底竞争”。山田借用了该词并将其译为日语,用来形容当代日本中产阶层的困境。

⑥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社会的不平等に関する意識調査(ISSP国際比較調査の日本分)単純集計結果」,https://www.nhk.or.jp/bunken/research/yoron/pdf/20200427_1.pdf,(2021年12月16日访问)。

会是怎样的形态时,受访者从问卷提供的5种图形中选择一种,56%的受访者选择了金字塔型图形,仅仅只有19.9%的受访者选择了代表“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型图形。^①这表明日本国民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较为强烈的不平等感。

四、日本学者对缓解贫富分化提出的政策建议及其评析

关于如何缓解贫富分化,日本学者的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呼吁改善劳动者的就职环境,保证其收入稳定;第二,倡导改革日本的税收制度,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

(一)改善劳动者的就职环境,保障劳动权益

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流动性,增强劳动者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让劳动力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领域转移,从就业维持型向劳动力流动援助型转换。^②与此相适应的是,必须改变“小政府”的运行模式,扩充失业保险,增设职业培训所。^③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可以使其适应市场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特别对于被解雇的劳动者而言,可以通过掌握其他劳动技能后实现再就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可以灵活调整经营战略适应市场变化。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大有利于快速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作为北欧国家的瑞典在劳动力政策方面做的较好,引起了不少日本学者的关注。日本学界也出现了一些研究瑞典福利政策和劳动市场的著作。^④目前日本也正在朝着高流动性市场体系的构建目标而努力。从政策性质来看,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在本质上仍然是与新自由主义强调优胜劣汰的博弈规则相适应的。失业后的再就业帮扶措施就像是给竞争淘汰者加装了一张“蹦床”式安全网,使其在跌落时借助安全网的弹力快速回弹,从而能够顺利地实现“败者复活”的目标。不过由于日本正处于调整和变革阶段,因此所取得的效果如何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①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社会的な不平等に関する意識調査(ISSP 国際比較調査の日本分)単純集計結果」, https://www.nhk.or.jp/bunken/research/yoron/pdf/20200427_1.pdf, (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② [日]高桥琢磨著,张同林、杨理亚译:《二十一世纪的不平等:只有这样做日本才会走向新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128页。

③ [日]中谷岩著,郑萍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④ 例如:丸尾直美、レグランド塚口淑子、カール レグランド『福祉政策と労働市場—変容する日本モデル・スウェーデンモデル』海象社、2008年;佐藤吉宗、WILL(関西働く女性のための弁護士)政策研究会『スウェーデンとオランダに学ぶ人を大切にする社会システム—労働・平等・社会保障』アットワークス、2011年。

此外,改革雇佣制度,建立同工同酬体制也是日本改善劳动者的就职环境的关键举措之一。在众多日本学者的倡导之下,日本政府终于开始着手改革雇佣制度。^①2018年12月28日厚生劳动省发布了《同工同酬指南》。该指南规定,无论是正规雇佣劳动者还是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企业都应该确保其均等均衡的待遇,向同工同酬的目标迈进;在同一企业或团体中,如果出现待遇差别,必须向劳动者解释清楚。^②随后,2019年1月31日厚生劳动省正式向下印发了《关于实施改善短期劳动者以及定期合同劳动者的雇佣管理的法律》文件,该项法律的适用对象包含短期劳动者和定期合同劳动者,规定从2020年4月1日起,禁止企业对正规雇佣劳动者和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区别对待,中小企业的生效日期为2021年4月1日起。^③按照改革目标来看,旨在能够改善劳动者的雇佣不稳定,收入低下的状况。但是由于法律生效不久,具体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总体而言,日本在改革雇佣制度方面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呼吁对所得税、资产税、消费税进行改革

为了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日本学者认为还需要改革税收制度,妥善开展二次分配。日本的税收制度,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政策,大幅度降低了对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对于穷人在二次分配中的利益保障不足。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的再分配政策弱化致使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对此,中谷岩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政府下调所得税与其说是建立成功者能够获得回报的社会,不如说是肯定了穷人就是失败者。^④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被译介到了日本,再次引发了日本国内对于日本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关注。^⑤皮凯蒂通过对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了分析后,发现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而自由市场经

^① 同工同酬制度的改革属于纠正非正规雇佣弊端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大多数研究日本差距社会的学者都会在其著作中论述到非正规雇佣问题对差距社会的影响。例如,橘木俊诏、桥本健二、三浦展、高桥琢磨、神野直彦、宫本太郎、山田昌弘等。

^② 厚生労働省「同一労働同一賃金ガイドライン」,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90591.html>, (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③ 厚生労働省「同一労働同一賃金特集ページ」,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44972.html>, (2021年12月16日访问)。

^④ [日]中谷岩著,郑萍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⑤ 《皮凯蒂理论在日引讨论 日媒:贫富差距存固有原因》,中国日报中文网, 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5-02/03/content_19479014.htm, (2021年12月16日访问)。

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在皮凯蒂看来,世界经济分为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基本要素。虽然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但是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并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却无法被别人所拥有。并且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会出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情况。^①针对这一问题,皮凯蒂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2015年皮凯蒂访日后,针对日本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提出了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累进资产税的建议。

对此,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则表示对于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调整所得税可以有效缓解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化趋势。但对于经济发展成熟,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日本来说,这种做法并不适用。^②大前研一认为征收资产税能够较为有效地遏制日本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是,他反对托马斯·皮凯蒂提出的对资产实施累进税率的主张,认为对资产实行累进税制会削减国民追求财富的欲望和动力,不利于充分发挥社会活力。此外,他认为高额累进税率对于日本吸引国际人才也存在不利影响。大前研一主张对拥有流动资产和不动产,包括遗产继承人在内的所有人,全部征收单一税率的资产税。^③

在消费税改革方面,多数日本学者赞同调高消费税税率,用以作为扩充日本社会保障的财源,但在具体措施层面却存在差异。中谷岩提出了附带返还式消费税方式;^④橘木俊诏则主张将消费税税率继续上调至15%;榊原英资则认为税率应该控制在20%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日本学者均主张采取累进税率,因为累进税率可以有效避免单一税率的逆进性,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不会受到威胁。消费多的富裕阶层将负担更多的消费税,因此这样也等于进行了所得二次分配。另外,将基础年金的财源转换为消费税的方式,无论是

① [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② [日]大前研一著,姜建强译:《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③ [日]大前研一著,姜建强译:《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16页。

④ 例如当消费税税率达到20%时,年薪200万日元的消费税负担将会达到40万日元。在征税后,同时建立对全体国民年返还40万日元的制度。若年收入为100万日元那么消费税为20万日元。加上国家发放的40万日元,实际上收到了20万日元的补贴。若是年消费额为400万日元的人,其消费税为80万日元,因为得到40万日元的返还,其实际纳税为40万日元。那么此时消费税税率为10%。若是年消费额为1000万日元,除去返还40万日元,其缴税额为160万日元。此时消费税税率实际为16%。以此类推,消费数额越大,其消费税税率就越高。因此消费税的逆向性缺点就消除了。

否支付保险费,政府都能够向所有人发放基础年金,所有高龄老年人都能够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这样做既可以省去对未缴纳年金者的督促、账本管理、支付标准定额审查等工作,并且又能够维持年金制度财源的稳定。

小 结

总体而言,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的贫富分化总体呈现扩大趋势。对于这种趋势的洞见,日本学界要早于日本政府。通过学界的讨论,日本存在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的结论最终得以确认。在如何看待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的利弊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主张这是日本经济复兴所必须经历的“阵痛”,熬过“阵痛”就是美好的明天。然而事实证明,这种“阵痛”一直持续到了令和时代也没能结束。

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于经济全球化竞争、科技技术进步、非正规雇佣扩大化以及税制改革。统筹来看,这4个方面其实存在一定关联性。前两者可以视作外部发展环境和发展规律的变化,后两者可以看作是日本为了适应这种外部变化,所采取的自我调整。但是这种适应性自我调整却在客观上加剧了本国的贫富分化。从影响方面来看,贫富分化的日益加深给日本造成了相对贫困率升高、相对贫困群体扩大、少子化问题加剧等问题。在政策建议方面,简而言之,日本学者主要从就业和税收两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试图遏制这种贫富分化趋势。岸田文雄上台以后,明确提出了“新型资本主义”的构想。这可以看作是日本将要调整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释放出的一种信号。在这种基调下,政府层面具体将会采取哪些措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与研究。

(卞显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日本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虚构的“军国美谈”

——作为事件、宣传和表象的“肉弹三勇士”

殷九洲

内容提要 “军国美谈”是日本战争文化的特殊产物,在众多美谈中,“肉弹三勇士”的故事创作不仅流传甚广,还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颇具典型意义。自“三勇士”事件发生以来,始终存在着众说纷纭的不同版本,官方与民间叙述存在着严重偏差。然而,在军部、媒体、精英与民众的共同推动下,“肉弹三勇士”逐渐走上神坛,成为风靡一时的“美谈佳话”,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军国主义热”推向了高潮。“三勇士热”的背后折射的是,军部政治化、国家、社会与民众一体化的军国主义体制逐渐形成的转型期实相。

关键词 肉弹三勇士 军国美谈 舆论宣传 转型期

引言

“军国美谈”亦称战争美谈、爱国美谈、战时佳话等,是日本军政当局和舆论媒介利用各种战争素材宣传军国主义的重要文学载体,是近代日本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自对外侵略扩张以来,就诞生了大量以军官和士兵为主人公的“军国美谈”。甲午战争时期的喇叭兵木口小平、皇族能久亲王;日俄战争期间的“军神”乃木希典、广濑武夫、橘周太;“十五侵华”战争期间的“肉弹三勇士”、杉本五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九军神”、加藤建夫等,都极具代表性。“军国美谈”的生成与传播对日本社会的军事动员、国民精神的形塑,乃至战争时局的变化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中日学界一般以战前日本的国定教科书、新闻媒体为中介,通过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探

析“军国美谈”的真实性、文学性、传播路径及其影响。^①但将其放置在国家和社会大环境的关系中进行把握的历史视角却较为薄弱。故而,本文试图通过“肉弹三勇士”(亦称“爆弹三勇士”)事件,考察转折时期日本国家、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一、不同版本的“三勇士”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全境,扶持傀儡政权的行径,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为缓解舆论压力,转移外界视线,次年1月28日,日军以发生在上海的日本僧侣被杀事件为借口,悍然进攻中国驻沪守军,挑起战争,即“一二八事变”。2月20日至25日期间,日军向驻扎在大场镇、江湾镇的十九路军发起总攻,由于街道路面战壕遍地,铁丝网林立,再加上十九路军的同仇敌忾、殊死反抗,日军死伤惨重,双方陷入拉锯战。“肉弹三勇士”的“军国美谈”正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三勇士”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不用说当时,即使到今天仍存在着众说纷纭的不同版本。

1942年发行的第五期国定国语教科书初等科第2册第21课中,“三勇士”的事迹是这样被述说的:

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清晨五点,距离庙巷敌军阵地仅五十米。我方工兵三人一组,抬着长长的爆破筒,紧盯着敌军阵地。放眼望去,敌军阵地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工兵们准备将爆破筒投向铁丝网,为后面的步兵打开一条冲锋之路。此时,距离总攻仅剩三十分钟……敌人的炮弹愈发密集,冲锋的时间就在眼前。如今,将爆破筒插进铁丝网再点火的方式必然来不及。于是,班长下令先点着爆破筒的引线。

作江伊之助、江下武二和北川丞三位工兵紧握点火的爆破筒向铁丝网行进。北川冲在第一位,江下、作江则紧随其后。突然,北川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摔倒在地。紧随其后的两人虽也有所踉跄,但即时稳住了身体。当然,三人中谁也没有抛掉爆破筒。只是,引线上的火苗嗤嗤地冒着。北川抱着决死的勇气猛然站起。江下、作江为鼓舞北川,紧握爆破筒,从后往前推

^① 从教科书、新闻媒介方面考察“军国美谈”的研究详见中村圭吾『教科書物語:国家と教科書と民衆』ノーベル書房、1970年;上野英信『天皇陛下万歳 爆弾三勇士序説』筑摩書房、1971年;中内敏夫『軍国美談と教科書』岩波書店、1988年;増子保志「作られた戦争美談:肉弾三勇士と戦争美談」『日本国際情報学会誌』2015年、第12巻、第1号、27-35頁;[日]前坂俊之著,晏英译:《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周萍萍:《日本教科书中的“军国美谈文学”研究》,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55-61页、《日本教科书中的“军国美谈文学”研究(1894-1945)》,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

进。

手里的爆破筒将三人的心拧成了一股绳。数秒后,爆破筒将发生剧烈的爆炸。三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化身为人肉炸弹,笔直向前突进。抵达铁丝网后,三人将爆破筒扔了进去。爆炸声震天动地,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我方一队步兵顺势向前冲锋。

班长边指挥部下边向前进,来到作江倒下的地方,大声呼喊道:“作江,干得好。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作江回答道:“没有什么了。成功了吗?”班长将作江的身体调整至朝着被炸开的铁丝网方向,大声叫道:“看,大队正从你们炸开的地方向前突击。”

“天皇陛下万岁。”作江说完就安静地闭上了双眼。^①

由国家机构主导制定的教科书,往往代表着国家的意旨和官方意识形态。“三勇士”事件在国家的叙事话语体系内,被完完全全塑造成“不怕牺牲、为国捐躯、尽忠天皇”的“帝国战士”形象。特别是“三人舍身赴死化身肉弹”及“作江临死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情节尤为动容。

与官方叙事不同的是,民间版本对“三勇士”事件的记载却有着较大出入。中内敏夫和增子保志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即使在全民追捧“三勇士”的时候,围绕三人的死亡原因也出现了很多种说法,其中“因技术操作失误而导致身亡”的说法流传甚广,可信度较高。^② 1933年10月,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曾记录了同一工兵队的一名士兵的证言,“由于将爆破筒放入铁丝网再行点火的常规作法过于拖沓,屡屡失败,所以,决定从一开始就点好引线。军队的导火线质量上乘,并不会出现中途熄火的现象。原本导火线长一些也无碍于事,但内田伍长为使三人快去快回,迅速完成任务,将导火线减去30厘米,只剩下33厘米。然而,三人在跑出15米的时候,其中一人不知是崴了脚还是被子弹击中,突然摔倒,其他两人也顺势栽倒。三人起身后试图折返,但内田伍长大声怒斥道:‘干什么?为了天皇、为了国家,往前冲!’,三人不得不掉头重新捡起爆破筒继续向前进,就在即将达到铁丝网的瞬间,爆破筒爆炸了”,该士兵在证言中直言不讳道:“内田伍长是害死三人的真凶。”^③

从该士兵的证言中可知,技术操作失误的并非三人,而是指挥三人的伍长。此外,三人并非决意赴死,而是在日本军队的绝对服从精神下,不得不服从命令而牺牲的普通战事行为。

① 文部省「初等科国語巻二(第五期国定国語教科書)」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41年、483-485頁。

② 增子保志「作られた戦争美談:肉弾三勇士と戦争美談」、31-32頁。

③ 「「爆弾三勇士」のほんとのこ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6030054200、「爆弾三勇士」のほんとのこと(国立公文書館)。

不管是三人的操作失误还是上级的错误指挥，“三勇士”的技术失误致死说“使得军部的首脑们颇为困扰。当时，虽然此说法未在世人大众间流传开，却对久留米工兵队的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经过严格的技术训练和适当的判断力的军事教育后，因技术层面操作失误而被尊奉为‘军神’的现象让久留米的工兵们难以信服。三勇士的长官某少尉在报纸上谈到，三人被尊奉为‘军神’的行为似乎过于夸张了。”^①

除对三人死亡原因的不同声音外，教科书高潮部分的“天皇陛下万岁”情节似乎也遭到了质疑。“一二八事变”结束不久的7月15日，身处同一部队的小野一麻吕在自费出版的《爆弹三勇士的真相和观察》中写道，“爆炸声轰然响起，‘勇士’化作肉弹同铁丝网一道四处飞散，作江一等兵失去了左手右脚，脸和下半身被炸成重伤，但一息尚存……内田伍长在爆破成功后冲了上来，刚巧发现作江的惨状，内田用左臂抱住鲜血淋漓的作江，大声疾呼：‘铁丝网已经炸开，你的伤不重，坚持住！’吉田救护兵飞奔而来，用水壶喂水给作江。突然，炮弹飞来，炸伤了内田伍长的右大腿，两位就像父子一样搂抱在一起倒了下去，不一会儿作江一等兵的英灵就离开了他的肉体。”^②小野在“派遣的‘三勇士’队伍内待了十一年之久，与当时的中队长松下环大尉情同父子”，^③故而小野关于三人的相关记录具有较高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此外，亲眼目睹作江死亡的小队长东岛少尉在做公开讲演时都会讲战友临终时的痛苦经历，“作江当时不停地呻吟道‘腰疼，腰疼’，所以我们都拼命给他揉腰，”上野英信战后曾采访东岛关于作江临死前是否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一事，东岛回答道，“我本人没有听见，但是作江临死前嘴巴微微张开好像说了点什么。大概是念着天皇陛下万岁吧。”^④即使东岛前后的言论有所差异，却始终没有肯定这一情节的发生。

可以看出，在“三勇士”事件的描写叙述上，国家的话语体系与民间的个人（相关者）叙事存在着极大偏差，且有着很多无法解释的疑点。特别是“神格化”三人的“死亡原因”和“临终遗言”情节，不仅在当时，之后的很多研究都提出了异议，这也是“三勇士”的事迹在发生十年后才被收录进国定教科书的原因之一。

① 中内敏夫『軍国美談と教科書』、89頁。

② 小野一麻呂『爆弾三勇士の真相と其観察』小野一麻呂（個人出版）、1932年、28頁。

③ 小野一麻呂『爆弾三勇士の真相と其観察』、36頁。

④ 上野英信『天皇陛下万歳 爆弾三勇士序説』、261-263頁。

二、罕见的“肉弹三勇士”热潮

1920年代的日本陆海军都经历了大规模的裁军运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方案,对海军特别是主力舰吨位进行了大规模削减;随后,陆军也分别在陆军大臣山梨半造和宇垣一成的主导下,实施了三次“更新换代”的“军备整备(裁军)”运动。1930年4月,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签订,使得日本国内的裁军运动发展到了顶峰。^①

无论对于陆军还是海军而言,裁军的“损失”关键不在于人数的减少,而在于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裁军使日本进入了“军人失意时代”,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蔑视军人”的风潮。日俄战争时期,军人被视为国家的骄傲,穿着军装走在街上,民众会行“注目礼”。裁军时代,军人走在街上甚至会被民众骂为“偷税者”,退役军人为谋求职业,不得不低声下气,就连婚姻对象,军人或军人家属也被社会所嫌弃,“谢绝军人”的现象遍布大街小巷。^②短短二十年时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一位师团长在给上原勇作的信中写道,“裁军计划实施后,军队的士气大幅下降,眼下青年军官配偶的家境,和以前青年军官配偶的家境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日本进入‘谢绝军人’的时代,这难道是对日俄战争后军人过于张扬的社会状态的纠正?现在东洋已经没有战争了,没有了战争意味着难以建功立业,意味着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③

此外,一战时的“战争景气”随战事结束而告终,1920年代的日本,接连不断地爆发金融危机,1929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更是导致日本的社会阶层、阶级结构撕裂得愈发严重。“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暮气沉沉的日本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事变后,日本各大报纸、广播电台竞相报道战事的进展、前线士兵的“英勇事迹”,各种“前线后方”的“军国美谈”遍布大街小巷。^④舆论媒体甚至形成了一种“报道合战”的态势,日本社会处处充满着“满洲热”。正是在这一氛围下,诞生了追捧“肉弹三勇士”的狂热风潮。

新闻报刊打响了“造神化”运动的第一枪。三位无名士兵战死后的第三天起,日本各大新

^① 祝曙光:《论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裁军运动》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1期,第15-23页。

^② 大江志乃夫『昭和の歴史(3)天皇の軍隊』小学館、1988年、115-116頁。

^③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研究会『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38-40頁。

^④ 史桂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与战争狂热》,载《学术交流》2016年第9期,第194-199页。

闻报纸争相用头版头条及醒目的大号字体标题,大篇幅报道了三人“壮烈战死的英勇事迹”。2月24日,《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在第一版分别用“此乃真肉弹! 壮烈无比的自爆,主动请缨身负炸弹摧毁铁丝网的三勇士”、“高呼‘帝国万岁’后粉身碎骨,三工兵身抱点燃的炸弹,冲向铁丝网”为题报道了该事件。^①《大阪每日新闻》、《西部每日新闻》、《福冈日日新闻》等报社同样以类似的标题详细地刊登了三人“可歌可泣的壮举”。特别是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的一篇题为“名副其实的‘军神’——忠烈的肉弹三勇士事迹‘欲上呈天皇陛下’,此乃陆军省之最高恩赏”的报道,^②首次将“三勇士”与“军神”的称号相联系,两日后,该报在“天语人声”栏目里再次重申“应将三勇士奉为‘军神’来祭奠”,“此乃真军神,是大和魂的具现,是感动鬼神、激励懦夫的超人行为”。

此外,朝日新闻社和每日新闻社在2月28日,同时刊登了悬赏征集“三勇士之歌”的广告。《东京朝日新闻》征集的是“肉弹三勇士之歌”,《东京每日新闻》则为“爆弹三勇士之歌”。两报声称,广泛征集歌曲是为了“永远纪念且向后世宣扬三勇士的忠烈行为和殉国精神”。歌曲征集活动可谓“三勇士”宣传活动中“最为精彩的时刻”。两家报社最终收到有124561首(朝日)和81477首(每日)应征稿件。中野力创作的《超越战友的死亡》(朝日)和与谢野宽(铁干)的作品《庙行镇的敌人阵营》(每日)分别当选。中野的歌词之后由山田耕筰作曲,山田评价该曲不仅“是对三勇士忠烈事迹的赞歌,亦是悼念三人忠烈行为的挽歌,同时更是爱国进行曲”,^③与谢野的诗词则由陆军军乐队队长辻顺治配曲。两首歌最终成为引领新时期士兵与国民哼唱的军歌。

与中日甲午、日俄战争时期相比,“三勇士”的美谈故事不仅以新闻报刊为传播载体,广播电台、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传播媒介和艺术形式都成为宣传“三勇士事迹”的重要舞台。

东京中央放送局设置了“三勇士之夕”频道,转播明治座的《上海的功勋者三勇士》,各地方电台也播放人形净琉璃《三勇士名誉肉弹》、广播剧《肉弹三勇士》、琵琶曲《啊! 肉弹三勇

① 「これぞ真の肉弾! 壮烈無比の爆死、志願して爆弾を身につけ鉄条網を破壊した三勇士」、『大阪朝日新聞』、1932年2月24日;「“帝国万歳”を叫んで我が身は木端微塵、3工兵点火せる爆弾を抱き、鉄条網に躍りこむ」、『東京朝日新聞』、1932年2月24日。

② 「まさしく『軍神』—忠烈な肉弾三勇士『天皇陛下の上聞に達したい』」、『大阪朝日新聞』、1932年2月25日。

③ 増子保志「作られた戦争美談:肉弾三勇士と戦争美談」、31頁;周萍萍:《日本教科书中的“军国美谈文学”研究(1894-1945)》,第137页。

士》等节目。电影界也不甘落后,开始拍摄“三勇士”题材的电影,描写“三勇士”的作品犹如洪水般涌出,何合电影公司的《忠魂肉弹三勇士》拔得头筹,最先拍摄完成,3月中旬,东活的《忠烈肉弹三勇士》、新兴的《肉弹三勇士》、日活的《炸弹三勇士》、赤泽的《昭和军神·炸弹三勇士》、福井的《昭和军神·肉弹三勇士》等5部作品制作问世,并迅速在日本国内公映,一个月拍摄完5部电影且上映是史无前例的。^①“三勇士”题材的电影甚至远渡重洋,在美国本土得以放映。^②

此外,京都南座的雁治郎一座、大阪道顿堀的浪花座、早川雪洲一座、文乐等都上演了“肉弹三勇士”相关的剧目,当时的歌舞伎等戏剧深陷生存困境,在上演了“三勇士”的剧目后,连续出现了观众爆满的景象。“肉弹三勇士”的出现,对传统艺术而言,简直是意外的幸运。日本民间传统文艺诸如浪曲、讲谈、落语、琵琶、箏曲等的创作题材也都融入了“三勇士”的元素。浪曲界的梅中轩莺童不仅很早就创作了曲目《肉弹三勇士》,还自费前往日军的久留米师团慰问演出。除新闻媒体和艺术界外,文学作品的创造也加入其中。三人死后的13个月内,大量相关题材的书籍得以出版。^③

传播载体的多样化,使得“三勇士”热不仅波及文化娱乐产业,而且渗透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女性们梳起了“三勇士发髻”。对时代动态一向敏感的商人也加入追捧的潮流,“三勇士酒”、“爆弹巧克力”、“肉弹奶糖”、“肉弹三勇士料理”等等诸多冠以“三勇士”名头的商品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因征兵未成功企图跳楼自杀、年轻女性因仰慕三人而跳水自杀、以“三勇士美谈”为名头行欺诈活动而被捕等社会事件和现象。^④在经历了裁军时期的“军人失意时代”,日本政府和军部未曾料想到“三勇士”事件能在民间掀起如此狂热的追捧浪潮。

为响应民间热潮,陆军省利用国民高涨的情绪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募捐慰问金活动,民间给“三勇士”遗族的捐款金额创下了日本军部设立以来向社会募捐的最高纪录。在政府和军部的主导下,国家层面决定利用社会捐助为“三勇士”塑造铜像、建立纪念碑;^⑤此外,陆

① [美]彼得·海,杨红云译:《帝国的银幕:十五年战争与日本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4页。

② 「忠勇無比の爆死 肉弾三勇士映画 米国最初の封切り 今晚と明晩暁星ホールで」、『日米新聞』、1932年4月29日。

③ 具体书籍详见增子保志「作られた戦争美談:肉弾三勇士と戦争美談」、30頁;周萍萍:《日本教科书中的“军国美谈文学”研究(1894-1945)》,第137-138页。

④ 增子保志「作られた戦争美談:肉弾三勇士と戦争美談」、31頁。

⑤ 「肉弾三勇士記念像建立 東京の名刹に」、『日米新聞』、1932年4月5日;「肉弾三勇士 芝の青松寺に銅像を建設 在米邦人からも募金 総経費二十萬円」、『日米新聞』、1933年5月7日。

军省恩赏课在论功行赏时，赐予三人勋六等和金鷄勋章作为最高荣誉。^① 1933年，日本陆军省教育总监部将满洲事变时期的“美谈故事”集结成册，出版发行了《满洲事变军事美谈集》，“三勇士”的事迹被收入“责任观念之部”，陆军省新闻班则编写了《满洲事变孕育的美谈佳话》。

三、“三勇士”事件折射下的日本转型期

对“三勇士”的狂热追捧，在新闻规律的作用下，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随后即被其他新的“军国美谈”所覆盖，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肉弹三勇士”，在向日本国民灌输战争意识和爱国心理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以“三勇士”为代表的“军国美谈热”又是政府军部、舆论媒体、社会精英及普罗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

中日甲午、日俄战争期间的“战争热潮”，经“大正民主时代”的裁军运动和反战思潮的洗涤，曾一度在日本社会退潮。军部精英和右翼团体不甘为社会抛弃，始终蠢蠢欲动，企图恢复往日权威、重塑军队威望。军部深知民意的不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故而陆军在着手军事改革的同时，成立“国防思想普及委员会”，利用“国防思想普及”的由头，唤起和诱导民众对军部的支持。^② 此外，军部还与大众传媒、商业公司相互合作，利用后者在消费社会中的影响力，将本不起眼的“陆军纪念日”打造为“军民联动”的国民纪念日。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陆军进一步操纵民意、干涉政治提供了契机。一方面，陆军省内的新闻班和调查班积极制作、发布国防思想普及的相关材料，煽动民众的援军热潮；另一方面，10月8日，陆军省在草拟通过的《时局处理方案》中规定了今后“国民指导及宣传”的方向，即“使国民充分认识理解当下之时局，向实现举国一致之目的而奋斗”。^③ 11月10日，陆军省次官在发给各师团参谋长的通牒中，就诱导舆论政策指示道，“近来传言国联对日氛围逐渐恶化，各国驻日使节成为此类消息的重要信源，此乃他国对日本之威吓宣传，决非国际舆论。故值此之际，在彻底消除国民疑虑的同时，适当指导我国之舆论，以图实现国论之统一。”

① 「名誉の戦死者に論功行賞 爆弾三勇士には功六級金鷄勲章」、『日米新聞』、1933年2月3日。

② 「資料 64 国防思想普及計画に関する件 陸軍省新聞班（一九三〇・六・三〇）」、藤原彰、功刀俊洋編『満洲事変と国民動員』大月書房、1983年、202-205頁。

③ 「時局处理方案（決定案）」1931年10月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34600、満洲事変作戦指導関係綴 別冊其の2 昭和6年9月15日～6年12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 「時局ニ関スル件通牒」（1931年11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045500、満洲事変通報控 昭6.9.26～7.12.14（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 军部意图在战时操纵舆论、引导民众的端倪初现。

为响应政府和军部的文件精神,10月19日,关东军司令部起草出台了《关于满洲事变的宣传计划》的秘密文件,以“大力普及宣传皇军的正义和人道主义”为方针,对日本国内民众的宣传要目中包含高唱“日军的实力和人道主义”、“将士的善行佳话”等项目,积极动员一切可利用的人员(新闻通讯员、杂志记者、往来满洲之内外交民、意见领袖等),以多手段(新闻报刊、照片电影、广播电台)的方式向民间宣传军方的论调和主张。^①“三勇士”等普通战士的战场行为恰恰与军方的宣传方针相符合,这是民间“军国美谈热”兴起的前提条件。

由于军部无法直接参与政治运作,^②跨越政、军两界的情报宣传政策及国家情报宣传机构的整合,恰好成为军部行使话语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场合。“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部的宣传方针和目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方面,将经济大萧条中民众改善生活的意欲转向对中国大陆满蒙地区开拓的期待,以此争取民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另一方面,将国防概念的阐释与政治、经济、思想及国际问题等领域相结合,操纵民众意识形态的同时,试图干涉政府的内政外交。^③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1937至1941年间,海军省海军军事普及部更是面向国内集中编撰出版了十辑的《光辉的忠诚:支那事变报国美谈》,将“前线后方”的种种“美谈”记录在册,以期鼓动国民投身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中。

增子保志指出,在战前日本“军国美谈”的谱系中,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战争美谈”多突出单个士兵的贡献和牺牲精神,以证明新征兵制的优越性;日俄战争则极力赞美和塑造将领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勇猛形象。^④而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舆论媒介的笔调开始着重描写带有煽动国民情绪的“美谈事迹”。“九一八事变”期间,除“肉弹三勇士”外,古贺传太郎、“空闲少佐”等普通士兵的战场行为也被改编为“军国美谈”,引发了空前的“军国热”。在此后长时间的对华侵略、对外扩张过程中,大量的“军国美谈”经由舆论媒体的加工、渲染而渗透、传播至民间社会。

① 「資料 68 満洲事変に関する宣伝計画 関東軍司令部(一九三一・一〇・一九)」、藤原彰、功刀俊洋編『満洲事変と国民動員』、211-213 頁。

② 陆军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凡有关政治的上书、建议及其他请愿或论说,若以文书的形式公开发表意见者,处三年以下之监禁。

③ 曾寅滿「一九三〇年代前半の国防思想普及運動に関する一考察」『東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紀要』2019年、第23号、221頁。

④ 增子保志「作られた戦争美談:肉弾三勇士と戦争美談」、28-29頁。

前坂俊之的研究指出，“记者不是书写采访到的事实，而是将报道随着报社编辑的意图随意虚构。新闻被粉饰，虚构夸大的报道一旦被刊登到报纸上，就开始失去控制了。在还没有确认新闻到底是否真实之前，接二连三的活动安排就把本应该是客观的报道变成了一个神话”。^① 这些被虚构夸大的“军国美谈”，人为地制造出极端的排外主义、狂热的灭私奉公、自我牺牲精神，使军国主义得以发展膨胀。

既有研究大多认为战时日本媒体、民众是在政府和军部的强制管控下被迫协力战争，然而在媒体大肆编造大众津津乐道的“三勇士美谈”虚像的背后，其真相却是舆论媒介紧紧追随国策，积极发布虚假、不实报道，煽动民众好战情绪，引导国民参与军国主义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新闻自治团体“日本新闻协会”积极向当局表示“在关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开陈意见，将兴起国论作为本协会的义务”，并担负“巩固举国一致信念”的重任，为“膺惩支那的皇军”提供舆论支持。^② 战时的日本媒体与其说是“沦为国家权力(极权主义)的工具”，倒不如说是“自愿成为国家至善(国家伦理至高)的奴隶”。

20世纪30年代，新闻报纸、广播电台是普通民众知晓国内外形势的主要途径。舆论媒体富于煽动性的报道是促使转型期日本社会形成战争狂热氛围的最直接原因。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十五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媒体最终沦落为国家对外侵略的帮凶和吹鼓手。

除政府、军部、媒体的大肆鼓噪外，知识界也积极参与了“三勇士”的“造神化”运动，著名的思想家、意见领袖德富苏峰在报纸上称赞三人“从容自如地面对死亡，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日本帝国万岁，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自不待言。作为工兵的他们，自愿牺牲自我，开辟前进的道路，是一种尽了士兵本分的行为。我们无论用任何言语都无法完全表达出对他们的赞美之情”。^③ 前述的与谢野宽曾在日俄战争期间同妻子与谢野晶子写下《你不准死》这一著名的反战诗篇。在报社征集“三勇士之歌”时，他因感动于三人的行为，偷偷参加了应征且当选，震惊了世人。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团体曾极力反对战争，但遭到了执政当局的严厉镇压。1932年，担任过国联副事务长的新渡户稻造亦多次撰文批评军部的独断专行，在军部尚未采取措施前，舆论界已将批判的矛盾指向新渡户。《日本新闻》称其为“破坏国论统一、诋毁日本的惯犯”，其言论是“非国民的粗鄙之语”、“作为日本国民不能置若

^① [日]前坂俊之，晏英译：《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第61页。

^② 日本新聞協會編『日本新聞協會二十年史』日本新聞協會、1932年、68頁。

^③ [日]前坂俊之，晏英译：《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第55页。

罔闻”，^①昔日对其的礼赞之词都变为谴责，生命甚至遭到激进分子的威胁。反战、反军的微弱声音在“举国一致”的裹挟下噤若寒蝉。

此外，192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国内持续不断的经济萧条，再加上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日本生产总值锐减、企业倒闭、失业率居高不下，农产品价格下跌，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垄断财阀也连年亏损，市场一派萧条，社会矛盾激化。^②民众尤其是底层人民苦不堪言，整个日本社会压抑的氛围无法得到宣泄。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不仅转嫁了国内矛盾，还使得民众似乎从对外扩张中看到了新希望。“九一八事变”期间，战争带来的景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改善了民间的经济萧条，“三勇士”等“军国美谈”则触发了普通民众的共情，激发了潜藏在日本人内心深处及伦理上的美意识。传统心理的美包括人情美、纯粹美、悲壮美，而伦理的美包括贫、孝、忠。三名普通士兵皆出生于贫穷之家，承担家庭的重担，孝敬父母长辈，最终在战场上为“皇国”捐躯。日本人传统意义上的美意识在三人身上得以统一体现。^③通过“肉弹三勇士”等“军国美谈”的宣扬，“美谈”中的死亡与残忍被当作“忠君爱国”的表征，于是残忍走向其反面：越是惨烈，就越是“忠诚”。日本前近代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武士道精神也得以“华丽”得变身为现代军国主义。

战争所带来的虚假繁荣、政府绘制的“开拓蓝图”、军部对“满洲国”的夸耀等，在执政当局、舆论媒体的宣传和渲染下，军国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在日本民众内心扎根。普通民众已然将对外侵略扩张同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发自内心支持战争。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则企望像“三勇士”一样，通过征战改变自身、家庭或家乡命运。^④

“三勇士”热潮的余温尚在之时，日本国内的“五一五事件”给日本的政党政治划上了终结符，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组建“举国一致”内阁，为军权侵蚀政权作了重要铺垫。出乎意料的是，民众们对于“五一五事件”的凶犯，不仅抱有同情，还纷纷向政府请愿，请求法院从轻甚至释放犯人，审判过程中，法庭反而成为被告宣扬自我主张的舞台。在民意的裹挟下，凶手最终得以轻判了事。以“九一八事变”为分界线，民众对待军人的态度及军人的地位与“失意

① 孙继强：《论战时日本报界国家宣传机关身份的构建——驳日本报界“受害论”战争责任观》，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4页。

② 史桂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与战争狂热》，第195页。

③ 周萍萍：《日本教科书中的“军国美谈文学”研究（1894—1945）》，第140页；上野英信『天皇陛下万歳爆弾三勇士序説』，174頁。

④ 王希亮：《总动员体制的前夜：日本社会对九一八事变的因应》，载《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2期，第23页。

时代”判若两然。“九一八事变”前,政治侵华乃是日本高层精英所谋划之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局面为之一转,政治上对华强硬,武力上对华侵略、情感上对华蔑视的氛围逐渐渗透至民间。日本已然具备动员和武装全民、建立军国主义体制的社会基础。

在“军国热”的狂潮中,军部政治化,国家、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一体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军国宣传和动员体制,在随后的侵华战争中,一个个“军国美谈”通过报刊等媒体不断生成、传播。国家话语体系中所塑造和渲染的“军国美谈”形塑了大量的“军国少年”,著名历史学者藤原彰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如此,在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像国语、修身那些教材里,仍然充斥着赞美天皇、礼赞军国的内容。像妻子鼓励出征士兵的《一太郎》;母亲劝儿子战死的《水兵之母》;以及哪怕作战至死,军号也不撒手的《木口小平》那一类情结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时至今日仍无法忘记。”^①可见“军国美谈”对青少年影响之深。

结 语

“军国美谈”是俘获民心、动员民众的一把利器。“肉弹三勇士”、“神风特攻队”这些不具名的普通士兵往往最能打动民众。董炳月在《“肉弹”伦理学》一文中称,“在某种意义上,日本近代史可以称之为‘肉弹的历史’”。^②从日俄战争中的樱井忠温等“肉弹”,到“九一八事变”的“肉弹三勇士”、直至太平洋战争末期的“玉碎”、“特攻队”等,“肉弹战”所体现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潜伏在日本人的内心。

战时的“军国美谈”使得日本民众内心深处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再次复苏。原本战场上日常发生的战斗行为被日本政府和媒体高度政治化,并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对日本国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政府官僚、军部将校、财阀精英、意见领袖乃至普通民众在对华作战中不自觉地达成了“共识”,在“军国美谈”神话的凝聚下形成了“共谋”。“九一八事变”期间,即使是微弱的反对声,也被集体狂热的社会氛围所淹没,虽不至于像全面侵华时期一样被咒骂为“非国民”、“卖国者”,但反战、和平的声音已然不是社会的主流,国民与社会开始“集体右转”。

(殷九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日]藤原彰著,林晓光译:《中国战线从军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② 董炳月:《“肉弹”伦理学》,载《读书》2004 年第 4 期,第 140 页。

第二届近卫内阁与三国同盟的缔结

——以近卫文麿、松冈洋右为研究重点^①

李 晨

内容提要 第二届近卫内阁,在近卫文麿首相以及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主导下,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三国同盟的签订外受欧洲战局的影响,内有日本右翼舆论的裹挟。三国同盟本身即是日本自1932年退出国联之后,寻求战略同盟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妄图构建“大东洋共荣圈”的战略选择。“三国同盟”应视为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外部条件,这是近卫文麿与松冈洋右决定缔结三国同盟的主要动因。因此无论是作为首相的近卫文麿,抑或是外相松冈洋右都希望借助三国同盟,来改善日苏关系、抵制美国干涉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但事实上三国同盟却是近卫内阁在对美问题的一大失误,最终导致日美谈判的失败,并引燃了日美双方敌视的战火。

关键词 近卫文麿 松冈洋右 三国同盟 大东亚共荣圈

一、第二届近卫内阁与国际格局的变动

一战结束后日德两国面临相近的境遇。首先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不承认国联的调查结果,在1932年2月21日第十六届国联大会上宣布退出国联;1933年10月19日,希特勒以德国的主张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为由退出国联,这样东西方两个退出国际社会主流的国家走到了一起。1936年11月25日,日德两国在德国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显然这份协定的针对对象为苏联。这份协定确立了此后日德两国结盟的前

^① 本文是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口述史视野下的中国农民对逃亡途中日本“满洲移民”的救济研究》(批准号:18CSS021)阶段性研究成果。

提与基础。

就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强化“德意枢轴”问题，早在近卫文麿第一届内阁时期就有过讨论。为此在近卫内阁内部形成两派，时任陆相的板垣征四郎，就积极支持加强对德意的联盟；但是当时“担心因为与英法关系恶化而反对的主要有首相近卫、宇垣(有田)外相、米内海相、池田成彬藏相”。^①与陆相之间的对立，由此造成双方各持己见，无法达成共识。在第一届近卫内阁时期，近卫文麿本人明确表示反对“三国同盟”的签署。另外当时在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以及日本内大臣汤浅仓平二人，虽然退隐政治后台，但依然对日本政坛走向有一定的影响。西园寺与汤浅二人认为，还应继续坚持对英美协调的传统外交路线。“天皇或西园寺、汤浅内大臣在内，基于一点认识，即在日本在中国方面无论牺牲多少，都应该坚持对英美妥协的外交政策。”^②显然，近卫在第一届内阁时期，认为与德国结盟的时机尚不成熟，近卫认为此时与德国结盟是一种外交政策上的冒险行为。但第二届近卫执政时期，近卫内阁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德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表现。

1940年，希特勒的铁蹄突袭欧洲。4月9日德军利用闪电战以及机械化武装的有机结合，迅速占领了丹麦以及挪威；随即又在5月10日向法国发起猛烈攻击，突破马奇诺防线直逼法国巴黎；先后攻下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荷兰王室流亡英国，法国建立维希傀儡政府。29日德军大败英法联军，被迫转移33.6万军人至英国，史称“敦刻尔克大撤退”。德军的表现使近卫政府相信希特勒，一定会重构欧洲大陆新秩序。近卫政府认为“从战胜国的立场出发，德意同盟一旦迫使英国投降，那些已经被德意战胜的法国和荷兰，此外还有可能包括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日本可以夺取这些殖民地。”^③近卫政府基于上述理由，认为应当利用同盟的关系，来占领已经战败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从而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做准备。“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是以“三国同盟”的确立为前提，“三国同盟”既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占领东南亚殖民提供了借口，可以借同盟的名义占领这些“无主之地”，又为其破坏“华盛顿体系”排挤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提供了军事保证。所以“三国同盟”与“大东亚共荣圈”二者紧密联系，都是日本扩张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一步。“国民也狂热的欢迎近卫再任首相。各家报纸唯恐‘错过这班公共汽车’，纷纷表示支持新体制运动，促进缔结三国同盟。《读

① 茶谷誠一『昭和天皇側近たちの戦争』吉川弘文館、2010、144頁。

② 茶谷誠一『昭和天皇側近たちの戦争』151頁。

③ 筒井清忠『解明・昭和史 東京裁判までの道』朝日新聞出版社、2010年、177頁。

卖新闻》向近卫内阁提出要求‘以往半自由主义的不彻底的想法和方法是不行的。’”^①

1940年7月6日,德国对英国突然发动了“海狮计划”,德国企图利用自己的飞机优势征服英国,但始终未能达到迫使英国投降的目的。这时德国驻日大使希望借助日本在东南亚的活动,使英国感到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受到威胁,从而达到从东西方两个方向来牵制英国的目的。因此德国大使馆频频鼓动日本政府加入“三国同盟”,德国方面的鼓动很快就得到了松冈洋右的回应。但与德国大使馆考虑的不同,“松冈先生很明显地把日本的国家改造,当做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松冈以此为出发点,将外交事务放在了日德意三国同盟的问题上,坚决地推动日本国内外革命,并利用日本军队革新之际,认为日本的革新形势已经成熟,他似乎试图利用这个潮流对日本的外交上进行指导。”^②松冈认为可以利用三国同盟,来提高个人的政治声望,攫取政治资本,因此更加卖力鼓吹积极加强,与德意两国的枢轴关系。松冈的三国同盟构想,不仅是为了加速构筑“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也受到当时近卫新体制运动中提出“皇道外交”的影响。因此他计划利用日本外相的身份,以外务省为中心积极推动日本与德意两国的联盟。

当时日本国内对于“三国同盟”的建立抱有乐观态度,对德意两国的军事实力做出了过高的评价,也低估了美国重整军备的实力。“他们认为法国的投降证明了他们具有有先见之明,德国压倒性胜利只在眼前,意大利方面也决定参战,这样英国的败局将指日可待。”“这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已经不适于当下,日本进入了革新的时代,就需要排除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打破现状并且必须参加德意两国,以共同建设世界的新秩序。如果时机一旦错过的话,各民主国家一旦灭亡,那么日本此后将没有可以瓜分的殖民地。”^③这是近卫支持加入三国同盟的理由之一,另一理由就是确保日本不受到美国方面的威胁,正如前文所述,利用德意日同盟关系,东西互动、牵制美国的注意力。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曾在1940年11月21日,就日本能在三国同盟确立后,可以从德国方面获得哪些好处的政府质询时,松冈的答复为“三国条约缔结以后,德国为了有利于日本国防的加强,不仅在这方面给予我们便利,而且对中国问题即调整日苏邦交问题都对我表示好意,且已采取行动。关于解决中国问题,过去我们对德国没有抱很多希望,但在本月5日我对蒋介石提出和平条件以后,德国的里宾特洛

① [日]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郑钧、范菲、赵军译:《检证战争责任 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

② 矢部贞治『近衛文麿 下』弘文堂、1952年、150頁。

③ 重光葵著、松井孝也编辑『重光葵外交回想録』毎日新聞社、1978年、128頁。

甫和斯泰曼即分别对中国驻德大使进行了和平劝告。在此以后,看到重庆有所接近,经过大体顺利,相信这是上述效果之一。”^①松冈认为可以利用德国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关系,充重启与蒋介石对话。在这次政府质询会上,可以看到松冈将“三国同盟”看作是,制衡美国阻碍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妙策”,也希望借助德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来改善日军长期陷入中国战场的窘境。

另外松冈还提到可以利用调整对德意两国的关系,改变日苏紧张局面。此外松冈还提到苏德之间在矛盾,即苏德两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松冈认为日本可以纵横其间进而从中渔利,“在调整日苏邦交上,也是应当特别利用德国给予苏联的威胁。因而德国在巴尔干工作的成功,是对日本有利的。”^②

1940年1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德国,“开始向日德苏提携方向迈进”,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也将德意日三国与苏联之间的“腹案”传达日本方面。

1. 苏联表示在防止战争,迅速恢复和平的意义上,将与三国条约的宗旨保持一致。
2. 苏联就欧亚秩序方面,承认彼此之间的指导地位,三国则对苏联的领土表示尊重。
3. 三国及苏联约定不援助与三国为敌的国家,或者不加入这样的国家联盟中。^③

根据这份“腹案”德意日包括苏联对于重构的“欧亚新秩序”下,各自范围又重新进行了划分,如日本领属南洋、苏联控制伊朗与印度、德国控制欧洲中心地区、意大利则领有北非。上述划分内容成为“三国同盟将来与苏联缔结条约的前提。”^④1940年11月10日到14日,苏联外交部长对柏林进行访问时,对里宾特洛甫提出的“腹案”表示赞同。

为保证日本政府推行的所谓“皇道外交”顺利推行,面对外务省内亲英美派的质疑声,松冈洋右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外务省的反对声音。当时日本政府对“三国同盟”的签订,提出反对之声表现最强烈的,主要集中在日本外务省。作为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盲目推动“三国同盟”的建立,显然不符合国内“英美协调主义”的外交传统与政治立场。如当时驻德大使来栖三郎、驻英大使重光葵、驻苏大使东乡茂德等都明确反对“三国同盟”的建立,认为这无疑等于将日本与英美等国截然对立起来,但是作为外相的松冈洋右却不以为然。松冈为此

① [日]堀场一雄著,王培岚等译:《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10月,第512-513页。

② [日]堀场一雄著,王培岚等译:《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513页。

③ 川田稔『近衛文磨と日米開戦——内閣書記官長が残した『敗戦日本の内側』』祥伝社、2019、223—224頁。

④ 川田稔『近衛文磨と日米開戦——内閣書記官長が残した『敗戦日本の内側』』224頁。

动用外相的权利，“1940年夏，近卫内阁外相（松冈洋右）解除了许多亲英美外交官的职务，任命亲轴心国的前驻意大利大使担任外务省特别顾问。这极大削弱了外务省的自由派，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影响。”^①经过松冈的这次“铁腕清洗”，外务省内部对“三国同盟”的反对声音，不再成为阻挡日本政府签订“三国同盟”的障碍。

二、松冈洋右与三国同盟的准备

在“三国同盟”问题上，松冈洋右比近卫更急于缔结条约。松冈当时的目标十分明确，排除任何阻碍以达成“三国同盟”。因此，学界认为松冈是想借助“三国同盟”签订之际，除了使日本与德意两国完成军事同盟之外，还想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实现自己成为日本首相的政治资本。“三国同盟”被松冈视为晋升日本首相的重要政治台阶，所以松冈本人将其视为“志在必得”的外交目标。松冈首先与德国驻日大使施塔莫举行秘密会谈。为保证这次会谈的保密性，德国大使到达东京之后，除松冈本人之外，并未与其他日本人有过接触。从这次会谈的内容大致看出日德两国，希望借助彼此力量来牵制美国介入战争，基本确立了“防美联苏”的原则，共同抵抗美国参与战争中，同时为确保各自扩张势力范围不受影响，有必要拉拢苏联势力，这是对联盟提供了“双保险”。

根据东京审判的记录“当时除了外相外交顾问之外，其他外务省副部长都不知道，就连近卫本人也不清楚。当时的外相顾问是白鸟（敏夫），根据东京审判时期的口供记载，实际上松冈氏，从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开展所谓新外交，无论有功有过、近卫公是否知晓其中过程，他都决心贯彻下去。所以即便是我（白鸟敏夫），也不允许干涉外相的一切行动。”“施塔莫在后来的东京裁判供词中叙述到，他当时的任务是受到里宾特洛甫（时任纳粹德国对的外交部长）指派，探明日本的真意，如果日本方面有意与德国方面签订协定的话，那么可以直接与奥托大使交涉，如果需要柏林方面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承认的话，那么请尽快递交详细的报告。‘他（施塔莫）达到东京以来慎重行动，回避除松冈以外的其他人进行会谈。’”^②说明当时德国与日本外相松冈之间的会谈内容，并未通知近卫首相。整个秘密会谈的过程，也是在近卫文磨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

1940年9月9日、10日两天，松冈洋右在自己的私人府邸与德国驻日大使海因里希·施

^① [日]堀田江理著，马文博译：《日本1941 导向深渊的决策》，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年，第41页。

^② 矢部贞治『近衛文磨 下』弘文堂、1952、153頁。

塔莫(Stahmer Heinrich)二人商讨日德之间相互援助的内容,二人最终达成九项谈判内容。

首先施塔莫向松冈洋右表示,德国为了使这次战争不由局部战争走向世界性战争,尤其是不希望看到美国参与其中,因此德国不需要日本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德国希望日本,能够在德国需要援助的情况下,为其“用尽一切办法”。要利用日本现有的资源,来牵制住美国。德国的意图很明确,就是需要日本扮演干扰美国在欧洲行动的角色,因此,施塔莫表示两国之间的合作“无论何时对于危机的来临,都应是万无一失的准备,都应是对于两国有利而无害的。”因此,日德意三国之间相互联合的意义,就是为了表明坚决两国之间的态度,“鲜明的对谬误观点坚持到底,让事实的真相不仅使美国乃至全世界都被知晓,还应强力有效的阻止美国方面参战。反之如果采取软弱拖沓的态度的话,若只是采取声明的办法,那就无法阻止招致侮辱的危险了。”施塔莫向松冈洋右表示,“希望日本能够很好的把握当下时局,对于西半球方面有可能的危险、重大的以及现实性的问题做好充分的自省意识。”随后施塔莫又以美国为话题的切入点,认为应该认识到目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对于“欧亚新秩序”的阻碍,因此施塔莫认为“如果仔细揣摩其间道理,日本就应该缔结日德意三国的协定,以此防止事态的发展,希望日本能迅速做出决定。”^① 随后施塔莫又向松冈洋右表示应当在德意日三国签订条约后,再立即与苏联方面接近。至于“日苏亲善问题”,德国愿意充当日苏关系的“政治的中介人”。而且施塔莫表示他不认为两国之间接近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冲突。进而施塔莫进一步通过英德与苏德的关系说明,现在英德之间关系紧张,但是苏联与德国之间,却存在着良好关系的基础,苏联会履行苏德之间的协议。接着施塔莫明确向松冈表示,德意日三国之间应该做最坏的打算,所谓的做坏的打算就是美国的参战,以及战争的升级——蔓延为世界大战。因此,德国也会努力避免日美之间冲突爆发的可能,并且会尽力帮助两国之间邦交的改善。

从这份秘密谈判的结果来看,德国方面并不需要日本在英德战争中对德给予任何援助,另外德国会在日苏之间、日美之间充当调解人,解决日本当前的外交困境。表面看起来应该是日本方面比较“占便宜”,但实际上当时英德两国交战,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德国并不具备调解美日两国关系的条件。另外苏德之间虽然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当时苏联内部“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对英美两国的不信任,才使苏德之间存在暂时性的和解。虽然苏德两国在瓜分波兰的问题上并没有分歧,但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两国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因而

^① 川田稔『近衛文磨と日米開戦——内閣書記官長が残した『敗戦日本の内側』』祥伝社、2019、201頁。

作为日苏两国的“中介人”角色也不适合。基于上述原因,德国方面给日本的外交上的“优惠条件”,不过是一纸空文。

就松冈洋右而言,他主要看重两点内容,首先在对美问题上,两国之间达成一致看法,即德国的欧洲扩张计划与日本的亚洲扩张计划,都应防范美国方面的介入。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参战,因此解决日美矛盾是推进近卫政府继续对外扩张的必要前提;其次对于日本的“南进计划”与“大东亚共荣圈”而言,苏联一直是日本北方的“潜在威胁”,因而日本需要借助德国的力量来帮助日苏之间达成协议,避免苏联在日本南进行动掣肘。松冈将“三国同盟”的签订视为“只赚不赔”的买卖,却忽视了实际的国际形势发展。

松冈结束与施塔莫会谈之后,将这份秘密会谈报告递交四相会议上予以讨论。9月12日,近卫文磨将四相会议讨论的结果上奏昭和天皇。9月14日,近卫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讨论“松冈——施塔莫”的会谈内容,这实际上三国是同盟的初步打算。会上松冈滔滔不绝表达个人政治观点,极善辞令的松冈发言,具有很强的蛊惑性与煽动力。将与英美联手和与德意结盟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强调与英美联手就是对英美的妥协,其结果就是日本丧失了近代以来扩张的海外权益,也会丧失争夺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与之相反则是对德意的联盟可以保证日本既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推行,这是松冈演讲的核心观点。

经过松冈“慷慨激昂”得演说,东条英机陆相首先表示赞同,认为应该与德意两国缔结“三国同盟”协定。会上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认为“三国同盟”条约一旦缔结,就意味着海军方面需要对日本有可能面临的对美作战做准备。日本为了“大东亚共荣圈”而对美作战,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为,次长进一步指出如果日美双方即战即决的话,那么日本海军方面或许还能应付的来,如果一旦陷入长期作战的话,那对日本而言将是一场灾难。面对海军方面的质疑,外相松冈洋右随即发言:

“今日之日本或者选择与德意站在一起,或者选择与德意对立与英美为伍,现在到了必须决定明确态度的时刻了。”在松冈看来此前得内阁对德态度不明朗,尤其是平沼内阁时期对德态度十分暧昧。因此应当利用现在德国与英国之间,关系恶化的有利时机选择站队。松冈的理由为如果德国完成在欧洲大陆上的“新秩序,那么随后美国方面也将不得不对其妥协。届时对于原本归欧洲所属的殖民地,日本将无法染指。这对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松冈做出的判断与理由:首先如果德意日之间结为同盟,必然会造成对美恶化;在物资方面,也会使日本国民生活因战争的爆发导致生活窘困。“因此我们或者联手德意或者联盟英美,总之我们要选择一方”。随后松冈洋右再次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考虑到中日战

争以来美国方面的言行,恐怕我们不得不舍弃东亚新秩序,未来至少需要向英美等国低头半个世纪,但是这种妥协的情况一旦被国民所知道,十万英灵们会满意吗!而这绝不是向英美屈服这么简单,联想一下前一次大战(一战)的牺牲,再联系一下现在我们的付出。届时蒋介石不仅不会停止抗日,还会导致更多排日辱日的情况出现。”^①松冈认为不与德意联手的话,将无法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更无法打开目前中日战争的僵局。

松冈的发言使在场的海相也认为,日本除了与德意结盟之外并无他法。当晚在北白川官邸,陆相大臣与海相大臣对于“强化枢轴关系”表示赞同,但在木户的日记中记载,陆相后又与海军次官丰田商议“三国同盟”事宜,二人又认为这一协定对于日本来说风险太大,表示不赞同日本政府的决定。次日近卫将联席会议上的讨论的结果递交昭和天皇,昭和天皇也担心“三国同盟”会加剧日美之间关系的恶化。说明此时日本高层对于“三国同盟”签订较为疑虑,主要来自对美国的考量。因为当时日美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而英德之间战争也使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美国与英国之间存在联盟关系,日本如果站在了德意一侧,就等于选择与美国彻底对立的位置上。而日本战略资源又高度依赖美国,日美之间军事、经济实力的差距,使近卫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表现犹豫不决。

1940年9月16日,又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主要讨论三国同盟事宜。会议虽是近卫首相主持,但会议的主角仍为松冈洋右,松冈洋右坚持对德意联盟的原则不松动。他指出此前与英美协调、妥协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因此与其这样不若采取强硬态度,与之对抗来改变困窘的“国运”。松冈又重提“松冈——施塔莫秘密会谈”内容,指出“施塔莫曾表示此前旧的德国南洋诸岛领地,可以无偿的被我们日本拿走;还表示石油也会因为德国的占领不断扩大而变得丰富,不仅德国从苏联或罗马尼亚那里获得资源,而且日本也会因此获得石油。如果日本与苏联方面进行外交调整的话,还可以从北桦太岛获得开采石油的权利,并且根据适时情况对其进行全部收买。”^②这场紧急会议从上午八时一直持续至午后四点半。最经过松冈的游说,包括近卫在内对于缔结“三国同盟”协定,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9月16日的紧急内阁会议,最终决定日本同德意两国签订“三国同盟”协议。松冈之所以能够说服近卫内阁的其他大臣,主要是因为松冈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当前最为匮乏的就是,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资源。日本如果不想依赖英美等国进口,那么就必然需要通过武力向

^① 川田稔『近衛文麿と日米開戦——内閣書記官長が残した『敗戦日本の内側』』202—203頁。

^② 矢部貞治『近衛文麿 下』弘文堂、1952、156頁。

“南洋”进军。因此日本必然需要与德意两国站在一起,彼此相互制约美国参战的可能。另外,一战后划分给日本代管的原德国南洋诸岛屿,也成为日本的一块心病。一旦选择与英美站在一起,而德国却成为欧洲战场的最后赢家,那么原来由日本代管,德国一战前的殖民诸岛就有被收回的危险。选择与德意两国结盟,还可以与德国协商的余地。总而言之,根据松冈洋右的逻辑,日本如果如果想向“南洋发展”,获得资源就必须与德意两国缔结协约。身为首相的近卫也被松冈的“缜密”逻辑所说服,会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根据当时原田熊雄的日记记载,近卫将这一消息呈报天皇,面对天皇的提问,近卫认为今日缔结三国同盟,是综合各方面考量的结果。即便冒着与美国开战的风险,那也无计可施。可见,当时近卫对“三国同盟”的考虑并不充分,忽视了德国与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现实国际格局的变动,基本听从了松冈洋右的建议。

三、近卫文麿支持三国同盟的理由

从第一届近卫内阁起,近卫本人就对三国同盟的问题犹豫不决,因此很难负责地给出最终判断。即便完成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后,作为首相的近卫在这一问题上也多次打算毁约,或者修改部分内容。三国同盟对日本而言,既是继续“大东亚共荣圈”威慑美国的保证,也是日本借此改善日苏关系的重要筹码。只有解决日苏之间的“北部问题”,才能使日本专注于推进“南进政策”,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因而近卫文麿表示支持三国同盟的签订主要基于一下三方面的判断:

首先防止美国参战。近卫的这一方面考量与松冈洋右一致,近卫认为美国素来对日本的扩张行径进行打压,如果一味对美妥协,日本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另一方面,日本如果准备向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纯凭借自身的力量自然无法与美国抗衡,因此,加强日本同德意两国的盟友关系。这样既可以表明日本的立场,不必在日美交往中处于弱势地位,也可以借此壮大自身实力,防止日美战争爆发的可能。近卫认为之前日本外相无论是有田八郎还是野村吉三郎,都主张对美进行直接交涉。但近卫认为这种对美“妥协”的态度,无益于改善日美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激化国内反英美派的情绪。与其一味对美妥协,不若调整日美交涉的路线。通过与德意的联盟,逼迫美国对日做出让步。近卫也十分清楚,日德两国相互利用,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美国的参战,近卫在其手记中写道“(德国)利用日本以防止(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实为德国之希望,故有此可知缔结三国同盟最大意义之一,极为防止美国参战及世界战

乱之扩大。”^①从时候结果来看,与近卫的预设完全相反。正是由于三国同盟的缔结,才迫使德国希特勒根据三国同盟的要求,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对美宣战,将区域性战争升级为全球性战争。

其次确立对苏亲善关系。近卫认为日苏之间的改善极为重要,因为这是为日本继续推动“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一重保障,也是日本对抗英美的又一个重要砝码。正如近卫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更应该利用苏德关系改善之际,图谋调整日苏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推动日苏条件的改善,进而进一步推动日德苏的合作,以此来巩固日本对英美的地位,有助于处理中国事变”。^②联合苏联是日本对抗英美、扼制蒋介石政府的前提,这是近卫希望确立对苏友好方针的出发点。时任外相的松冈也这么认为,松冈“在动身前往欧洲前,他对秘书说:‘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暂时借口,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与美国握手的借口。’他坚持认为,这些国家的联合起来将向傲慢的美国人施压,迫使其做出外交妥协,这样,日本就能活在和平中。用松冈的话说,整个世界都不用动一发子弹。”^③无论是松冈还是近卫,都希望通过德国的作为日苏的调解人来改善日苏的关系,而苏联的力量,足以使美国慎重考量日美关系的发展。从而利于日美在改善日美关系的同时,保持日本外交上的主动权。显然,这只是近卫文麿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十分不现实的外交设想。

最后,当时对于“三国同盟”签订的最大阻碍即是日本海军,但此时却获得了海军方面的支持。此前日本海军认为如果签订“三国同盟”,必然会导致日美之间关系的恶化。而“三国同盟”的目的就是使日本“向南洋发展”,这样日本海军必然承担主要任务。这对日本海军方面而言压力巨大,所以当时就任日本海相的吉田善吾,对近卫内阁积极支持的“三国同盟”主张表示不赞同。以至于近卫在1940年召开五相会议,吉田善吾因此患病无法出席。吉田善吾一方面面对的是近卫内阁压力,同时他还要对日本海军负责,两方面的夹击使海相吉田善吾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以心脏病为由提请辞任海相一职。并由及川古志郎接任海相一职。及川古志郎出任海相,担负其特殊的“政治任务”,就是要统一日本海军方面,对于“三国同盟”的认识,以海相的身份取得日本海军方面的支持。1940年9月15日,及川古志郎召开了海军省军令部课长以上、联合舰队司令长以上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传达近卫内阁

① [日]近卫文麿著,高天原、孙识齐译:《日本政届二十年 近卫手记》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年版,第35页。

② 近衛文麿『近衛公手記』。转引自:川田稔『近衛文麿と日米開戦——内閣書記官長が残した『敗戦日本の内側』』祥伝社、2019、217頁。

③ [日]堀田江理著,马文博译:《日本1941 导向深渊的决策》,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年,第46页。

对于“三国同盟”的决策精神。及川古志郎认为如果海军方面不支持政府的决定,那么近卫政府必然因此倒台。有鉴于此,及川古志郎呼吁日本海军方面无条件的支持近卫内阁的决定,当时参加会议的日本海军军官并无一人提出反对意见。1940年时任日本海军次官的丰田贞次郎大将曾对近卫,说出海军支持三国同盟的真正原因,“虽然海军反对,而国内之情势已不许如此。”^① 在海军方面看来,日本国内的政治风向已经决定了三国同盟的缔结,即便坚持反对也无济于事,因而及川古志郎就任海相之后,支持近卫内阁缔结三国同盟的决定。海军的态度无疑影响了近卫本人对“三国同盟”问题的基本判断。“近卫公对该同盟所承认的积极价值,如后来所见到的,他期待海军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反对意见,而与预期相反的是海军对(三国同盟)表示了支持,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转机。”^② 陆军省、海军省以及日本外务省方面,都对这一问题表示同意,使摇摆不定的近卫下定决心支持“三国同盟”协议。

四、总结

韩昇教授曾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提到古代的“东亚各国的内部政治制度变革,往往同外部的国际关系紧密联系,倭国也不例外,从603年圣德太子的改革到645年大化改新,直至白江口战败后全面学习唐朝文化建设‘律令制国家’,无不同国际形势紧紧相连。”^③ 古代的倭国如此,近代的日本亦是如此。缔结三国同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急于获取东南亚地区丰富的战略资源。欧洲战局的骤然变化,刺激第二届近卫内阁一改此前谨慎态度,而支持签订三国同盟。这既是配合日本的南极计划的推进,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也是日本外交上长期奉行结盟主义的结果。

1932年日本高调宣布退出国联,并被称为“远东的孤儿”。失去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扩张显然具有风险。急于突破凡尔赛体系束缚的希特勒政府,利用日本南进计划与“大东亚共荣圈”为诱饵,鼓动日本加入三国同盟。从东西方两个方面阻止美国参战的可能。日德两国“臭味相投”,为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发展提供了前提。日本也妄图重构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政治格局,破坏原有的华盛顿体系。希望利用德军在欧洲的扩张之际,转移英美等国的注意力,进而迅速推动“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国际格局的变动为三国

① [日]近卫文磨著,高天原、孙识齐译:《日本政届二十年 近卫手记》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年版,第37页。

② 矢部贞治『近衛文磨 下』弘文堂、1952、161頁。

③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增补版)》,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

同盟的签订提供了客观条件。日本国内也积极鼓吹三国同盟的缔结。国内的政治气候成为三国同盟缔结的必要条件。当时荷兰、法国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则被近卫内阁视为“无主之地”,国内扩张势力高喊“不要错过末班车”的口号,呼吁加强同德意之间的关系,建立“三国同盟”。而“三国同盟”的建立除了为“南进计划”做准备,也为德意日三国东西方呼应,以防止美国参战的可能。

从历史发展来看,日本明知维新之后就长期存在亲德传统。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效仿西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普法战争中,普鲁士一统德意志,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德国变成了日本改造的“模板”,使日本完成了从“以华为师”到“以德为师”的转变。近卫文麿认为日德两国有着相似的经历与背景,都被西方英美国家所构建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束缚,所以在近卫看来日德两国自然就是天然的盟友。松冈洋右曾在1941年远赴欧洲访问,在德意访问时却受到崇高的礼遇。希特勒为了争取自己“远东小伙伴”,而费尽心思。“希特勒在这位外务大臣的金丝边眼镜前晃悠着他的诱饵。他说,现在是日本行动起来反对英国的绝佳时机——真是史无前例。当然有风险,但是现在风险不大,俄国人的西边有德国师团,大军压境,它动弹不得;东边的英国很弱,而美国才开始重新武装。不仅如此,轴心国没有利益分歧;德国的利益在非洲,就像日本对欧洲不动心一样,不关心东亚。美国是不敢西出夏威夷的。”^①希特勒的建议,对无论对松冈抑或是近卫都有巨大诱惑力与说服力。近卫内阁对美态度的改变受到德国的蛊惑,加之国内扩张主义势力的配合,使近卫内阁并没有对美关系做出正确调整,相反一再错失良机使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不再对日本抱有幻想。

在这种国内外政治气氛影响下,近卫文麿与松冈洋右之间对于西方的看法大体相同。都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干涉,抑制了日本扩张的“合理需求”。日本需要发展的诉求,与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并无二致。正因如此,近卫二次组阁时对松冈可以说是“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而且两人都十分注重个人的“政治风评”,因此俩人在对外政策制定上都十分容易受到“民意”的裹挟与左右,这在近卫的早期从政经历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较之近卫松冈洋右表现的更为明显。“松冈的杂耍式外交风格深受日本民众的喜欢,这是领导者与民众之间合作的民粹主义外交典型”,^②“松冈的外交政策无疑是为了博得国民的人气而采取的外交政

^①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马继森译:《罗斯福 自由的战士 1940-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4页。

^② 筒井清忠『近衛文麿—教養主義的ポピュリストの悲劇』岩波書店、2010、240頁。

策。”^① 因此为迎合国内右翼势力的需要,松冈洋右必须对美表现得更为强硬,甚至不惜错失日美谈判的最后机会。但较之松冈外相,近卫首相则更保持一份冷静头脑。尤其是近卫利用儿子留学美国之际,对美进行访问。近卫清楚日美之间的势力差距,因此,近卫对美一直保持相对克制得态度,但依然没有影响三国同盟的签订。

(李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筒井清忠『近衛文麿—教養主義的ポピュリストの悲劇』239頁。

远藤周作的返迁体验及文学创作

赵 聪

内容提要 远藤周作是日本战后“第三新人”著名代表作家,少年时代曾在中国大连生活七年。结合远藤这段人生经历去分析他作品中的耶稣形象塑造以及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可以发现:一方面,这段返迁体验促使远藤反思战争;另一方面,在大连时母亲的关爱和小黑狗的陪伴影响了他作品中耶稣形象的塑造。同时,在作品中塑造宽容仁慈的耶稣形象,是远藤独特的反思战争方式。而目前对远藤周作的大多数研究并未完全超越宗教文学这一框架,本文通过梳理远藤周作少年时代大连的生活体验,结合具体文本,分析这一体验对远藤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远藤周作 返迁 创伤 战争反思 耶稣形象

川村湊在《异乡的昭和文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引き揚げ体験文学”这一概念,川村将其定义为“从大陆陆续撤回日本的人们留下的体验记录和体验小说”。^①柴红梅将此词译为“返迁”,并着重研究了日本国家战败主题下的“返迁文学”。^②远藤周作1923年3月27日出生于东京,父亲远藤常久曾就职于安田银行(现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的前身),在1926年远藤周作三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携全家移居中国大连。远藤在大连呆了七年,后因父母关系破裂,随母亲返回日本。这段少年时代在大连生活后又返回日本本土的经历,符合川村湊所总结的返迁体验。在自传中,远藤曾经提到“我现在依旧怀念着大连的风景,但当时也对被称为‘内地’的日本非常憧憬”,^③可以看出童年这七年间大连生活经历对远藤的影响深远,在与佐藤泰正的对谈中,远藤曾提及少年时代的大连生活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各

① 川村湊『異郷の昭和文学』岩波書店、1990年、180頁。

② 柴红梅:《大连的日本“返迁体验文学”论——以松下满连子的〈再见·大连〉为例》,载《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68-73页。

③ 遠藤周作『遠藤周作による遠藤周作』青銅社、1980年、11頁。

种形式投影到他的小说中,这段体验被他总结为以下四点:一、与外国人的接触;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人进入中国东北,和军人的接触;三、和宠物小黑特殊的感情;四、父母关系的破裂。^①可以说这四条体验之间相互关联,贯穿了远藤周作一生的创作,是研究远藤不可忽视的一段重要体验,但从以往研究中来看,这段经历多被研究者们一笔带过,笔者欲引入“返迁”的概念,思考远藤这段经历和他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大连的少年时代

1926年远藤周作随家人抵达中国大连时,此时正值日俄战争后,日本人从俄国手中接管大连。沙俄曾模仿十九世纪巴黎来建设大连,此时的大连已经初步具有了城市规模,日本占领大连后,继承了沙俄的规划,以大广场这一圆形广场为中心,四周伫立着西洋式建筑,从广场辐射出的放射性大道相互交错,将大连建造成了一座典型的巴洛克城市。大连城市的下水道建设完备,城内电和瓦斯等方面的供应,比日本国内先进很多,^②虽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得以跻身世界强国行列,但仅仅一座俄国占领地大连城的设施,都比日本国内设施更先进,这种区别展现了当时日本和西方列强在综合国力等方面的差距。大连的日本人在感受着日俄战争胜利感和现实无力感之间的落差的同时,将由落差产生的自卑感转嫁为对同为东方人的中国人的压迫上——模仿西方的行为模式来支配中国。正是这种特殊的旅居大连的经历对远藤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9年,远藤周作进入大连大广场小学就读,由于他成绩一般,常被父亲拿来和成绩出色的哥哥作比较,父亲此举对远藤施加了巨大压力,从而使他感到自卑。即便如此,远藤小学起就在写作方面表现出超人的才能。四年级时,他的一篇作文《泥鳅》刊登在了日文版报纸《大连新闻》上,母亲远藤郁十分开心,并以此为傲,一生保存着那份报纸。家人中只有母亲认可他在写作方面的才能,并鼓励他说“你擅长写作和讲话,要是以后当小说家就好了”。^③母亲的鼓励给少年时自卑的远藤以极大的精神安慰,是他日后走上作家道路的最大支持。

在《我的履历书》中,远藤记述了一则儿时和母亲郁相关的故事。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远藤拿到一些牵牛花种子,母亲告诉他说,如果将种子种在庭院里,每天浇水,种子就会发芽开花。于是,远藤依照母亲所说,将种子种下,并坚持每天放学回家后浇水。有一天下雨

① 远藤周作、佐藤泰正『人生の同伴者』新潮社、1995年、13頁。

② 西澤泰彦『図説大連都市物語』河出書房新社、1999年、14-15頁。

③ 远藤周作「私と母」『遠藤周作文学全集〈12〉』新潮社、1999年、392頁。

了,远藤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像往常一样继续给牵牛花浇水,看到这一幕的兄长嘲笑他,并将他的行为告诉了母亲。母亲非但没有批评远藤,反而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什么下雨天不需要浇水。^①在母亲看来,明白下雨天不用浇水的哥哥是聪明的,但穿着雨衣给种子浇水的远藤更加诚实。哥哥的想法正常且合理,但认真遵从母亲话语、诚实的远藤周作则更惹母亲的喜爱。母亲对远藤的爱对远藤作品中母性耶稣形象塑造有关键性影响。

远藤周作9岁左右时,父母之间开始产生矛盾,每日争吵不断,在父母关系恶化的这段时间,他每天都笼罩在压抑的氛围中,心情也十分灰暗。幼时远藤的脑海中,经常浮现出母亲独自一人在昏暗的房间里一边流泪一边拉小提琴的画面。“因为不想看到母亲伤心的面孔,当时的我讨厌回家,父母经常吵架到深夜,我在床上能听到父亲发火的声音。我无能为力,只好用手指堵住耳朵不听父母争吵——这是我唯一的能逃避现实的做法……(中略)……在教室时,我也不愿听老师讲课,他们也都不知道发呆的我在想些什么。为了掩盖自己的内心,我会做恶作剧或者开玩笑。在我的性格中,至今还有为了隐藏自己悲伤而做恶作剧或开玩笑的习惯,可能是在那时候形成的吧”。^②由此可见,少年时代的经历影响了远藤一生的处世态度,而这种“隐藏自己”态度在创作中,就表现为利用宗教作为载体,去思考近代以来日本民族主体性的问题。

在家庭矛盾愈演愈烈之时,远藤心中的痛苦只能向家中雇佣的一位中国少年佣人诉说,两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成为好友。此外,他也将自己饲养的一只小黑狗当作同伴,向它倾诉心中的苦闷。最终,父母关系破裂,1933年的夏天,父母离婚,母亲决定带着远藤兄弟二人返回日本,由于条件所限,远藤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小黑狗,随母亲返回日本。被迫抛弃小黑狗的无力感和背叛感在此时的远藤心中造成了强烈的自责,这种自责造成的心灵创伤成为了他日后在创作中要化解的问题之一。

母亲郁带远藤兄弟二人投奔了在神户的姨母,远藤周作的姨母当时已在小林圣心女子学院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了一名热心的天主教徒。远藤的母亲也在她的介绍下前往天主教堂参加学习,并在1935年5月于小林圣心女子学院领受了圣洗圣事。在母亲的带领下,6月23日远藤兄弟二人一同接受了洗礼,远藤取保禄为自己的圣名。虽然远藤和母亲几乎同时接受的洗礼,但二人的信仰状态则完全不同。天主教的神对母亲来说是内心的慰藉,受洗

① 远藤周作『私の履歴書』『遠藤周作全集(14)』新潮社、1999年、221頁。

② 佐藤泰正『遠藤周作を読む』笠間書院、2004年、55頁。

之后,她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她逐渐走出了离婚的阴影。而信仰之于此时的远藤却是另一种状态,“我在少年时代,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被迫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之所以用‘被迫’这一说法,是因为不是我自己意志的行动。母亲在姨妈的劝说下,接受了教会洗礼后,便让我和哥哥去教堂学习”。^①在同佐藤泰正的对谈中,远藤表示,“天主教之于自己,如同一件被迫穿上的不合身的西服,同时代作家三浦朱门与安冈章太郎等人,是在经历了人生各种磨砺后,主动选择的基督宗教信仰,而自己则是被动地信了教”。^②即便如此,出于对母亲的爱和尊重,远藤并未放弃天主教信仰,他曾谈到,“我对母亲感情深厚,所以对母亲大半生视为生活支柱的信仰,自己如果不仔细研究就将其抛弃的话,会对母亲有愧”。^③可以说,远藤选择了正视信仰所带给他的违和感,并在这种违和感中思考日本和西方的距离、思考如何将这身不合身的西装变得更加合身,对他而言,文学创作就是他进行思考的途径。

二、作品中对战争的反思

日本军人对大连人的欺凌、日本人对大连人的歧视待遇,在远藤的记忆深处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这其实是日本近代以来集中精力学习西方过程中,将自己所受到的来自白人世界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传递给了中国和朝鲜人,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变得和白人一样,模仿白人压迫他们、鱼肉他们”。^④远藤和大多数有返迁经历者的不同处在于,他返回日本并非因日本战败,因此返迁经历带给他的体验中并不包含因战败而回国的艰难以及失落感,反而让他体验到了日本人对中国人欺压,这种体验在他成年后前往法国留学时进一步发酵。在法国,日本人成为白人歧视和欺负的对象,这种由歧视方到被歧视方的角色转换,使他意识到种族歧视的非合理性。另外,留法前,在天主教信仰的框架下,普天之下同为天主之子民的幻想让他忽视了肤色和种族的隔离,但留法体验让他意识到即便同为天主教信徒,他依旧是和白种人不同的黄种人,会被白人歧视,这种身体上无法更改的差异,结合少年时在大连生活所体验到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让他不得不去反思种族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和外国人接触带来的反思是远藤思考和创作的起点。

早在 1958 年,远藤周作就发表了短篇小说《架着双拐的人》。作品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① 远藤周作「異邦人の苦悩」『遠藤周作全集(13)』新潮社、1999年、171頁。

② 远藤周作、佐藤泰正:『人生の同伴者』,東京:新潮社,1995年,第61頁。

③ 远藤周作『私のイエス』祥云社、1988年、28頁。

④ [日]真嶋亜有著,宋晓煜译:《肤色的忧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4

末期的东京为背景，讲述了双腿瘫痪的主人公加藤前往精神分析医生菅那里治疗双腿的故事。多次诊疗后，加藤回忆起曾被迫参加侵略中国战争的往事，在战争中，他曾奉命杀害一名中国人。战争结束后，加藤承受不了杀人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患躯体症状障碍，只能依靠拐杖行走。虽然通过多次诊疗，最终找到了病因，但医生菅无法帮助主人公解除心结，驱散他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意味着加藤的腿病无法被根治。年幼时在大连和军人的接触使远藤明白战争带给每个个体的痛苦，他通过小说中架着“双拐”这一退伍军人的形象，将腿病作为一种隐喻，暗示了战争带来的创伤，同时，巧妙地将个体经受的战争创伤和日本的民族的创伤重叠在一起，思考了二战后日本作为战争发起者和战败者，如何反思战争中犯下的罪恶，以及如何在战后国际社会重新站立起来，确立民族主体性这种民族创伤问题。

远藤周作的很多作品中都涉及战争场面的描写，侧面批判和反思了战争。例如，在小说《海与毒药》中的“我”家后方有一家加油站，加油站老板身强力壮，曾在澡堂中向“我”炫耀战争时期在中国如何杀人：“去中国中部时太有意思了……有人抵抗就将他绑在树上用来做突击练习……你真瘦弱，这样的胳膊连人也刺不进去啊，在军队是要被淘汰的，像我啊……当然不只是我，去中国的几乎每人都杀了一、两个，我们这里服装店的老板——你知道吧，他们好像在南京大弄了一番，他曾经是宪兵呢”。^①对老板而言，他对自己在中国的罪恶行为非但没有感到愧疚，这些行为反而成为他夸耀的资本。在战争结束后，他可以做到无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继续生活。面对这种状况，远藤认为：“仅将战争责任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处理就足够的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中略)……如果将我们每个人放置在战争时代的话，是否有自信会采取完全反战的立场呢？我的话，没有这样的自信”。^②远藤意识到战争反思不能仅限于政治和社会层面，应当落实到每个日本人个体身上。对个体而言，如果说在战争中迫于上级权威的压力，个体的伦理精神被外部权威所左右，很难采取完全反战的立场，那么在战争结束后依旧没有反思，反而以此为荣，更说明了日本人在个体层面对战争的反思有所欠缺。远藤这里提到的“没有这样的自信”反应了一种面对罪恶时的“无力感”，而在战后日本人的文化中，这样的无力感普遍存在。日本人在战争中犯下了罪恶，远藤虽没有直接上战场作恶，但日本人的身份认同让他重复回到“日本人在战争中犯下了罪恶”的逻辑中，他应该如何去反省？他既无法承认日本人是天生的恶魔，也无法否认日本人战争中所犯下的深厚罪孽的

^① [日]远藤周作著，黄真译：《海与毒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 页。

现实,换句话说,如何反思战争中的罪恶,不仅仅是经历了战争的远藤,这一主体在思考战争时面临的困境,更是二战后日本整个民族需要去化解的创伤。

由于战争,人性中的恶被激发,日本人成为被战争支配的刽子手,在这一点上,远藤的作品确实批判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但显然,远藤的反思超越了从日本人受害者的角度对战争的批判——如远藤所说,在反思战争责任的时代背景下,假如全日本都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战争的罪恶,不被追究,即人人均有罪,这意味战争责任在个人层面的追究会不了了之,更进一步讲,如此一来,想要在社会层面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跳脱出日本社会,外部批判或许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出路。可以说,远藤对战争的感受来自于少年时代和军人以及中国人的接触,而其后作品中耶稣形象的塑造,不仅同返迁体验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为如何看待战后日本人化解内心的罪恶感,以及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追究,提供了一个视角。

三、作品中的耶稣形象

远藤周作在大连生活时,与中国人的接触,使得他从小就以一个“外人”的身份在异国生活,在中国人眼中,他们是被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回到日本后,受母亲的影响,被动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后的远藤属于天主教信仰的“外人”,这种异乡体验为日后远藤深入思考日本人如何接受源自西方的天主教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外人”身份,使得远藤可以客观地思考宗教的问题,使作品没有沦落为护教文学。在法国留学后,他以西方白人为镜像,看到了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在文化上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现实中深刻的割裂感同少年时代被动接受洗礼后,信仰带给他的违和感相结合,形成他独特的个人创伤和问题意识。用远藤自己的话说,他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将受洗时母亲给他穿上的西装,改良为适合日本人的和服,作品中耶稣形象的书写,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尝试。

远藤母性耶稣的塑造与自幼从母亲那里感受到的爱,以及宠物狗小黑所给予的陪伴并无关系。例如《深河》中童话作家沼田这一角色,就是远藤根据自己的返迁经历塑造出来的人物。沼田在大连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时代,那时的他成绩一般,家中父母关系不和,陪伴他的是一只叫小黑的土狗,是他倾诉心中所有抑郁苦闷的唯一对象,是他悲伤的理解者,唯它能倾听他的心声。少年时的沼田被母亲带离大连返回日本的那天,他不得和小黑分离,小黑悲伤的眼神深深印刻在了沼田的脑海中,这种离别时悲伤的眼神,代表着小黑对沼田的不舍。这种特殊的体验带来的实感使他联想到信徒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无论信徒对待耶稣的态度如何,耶稣的爱永远不会消失。远藤在《深河》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让耶稣出现,而是将耶

稣的形象投射在了小狗身上,通过这种方式,远藤将自己所理解的耶稣形象传达给了不了解基督宗教的日本读者。

江藤淳曾评价远藤道:“日本人是不能只从理性的角度来了解基督宗教的,而远藤周作正是用最不理性的方式,让人们接触官能的耶稣,这种作家很少见”。^①如远藤所说,基督宗教是“有双亲的宗教”,^②其所信仰的耶稣既具有严厉威严的父性一面,又具有宽容慈祥的母性一面。只是近代以来,内村鉴三仅将严格父性的基督形象介绍给了日本人,远藤认为相较于母性耶稣形象,仅强调父性一面的耶稣形象是不适合日本人的。远藤所塑造的耶稣并没有超出基督宗教信仰对耶稣的理解,这种对耶稣的合理解读也是有理论依据的。按照史怀泽(A. Schweitzer)的说法,“每个历史时代都必定按照自己的性格来描绘耶稣”。^③在基督宗教的发展过程中,耶稣形象是被建构的,不仅会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不同民族和地区,对耶稣形象的受容也存在差异,而通过对差异的解读,恰恰可以发现隐藏在差异之下的民族特性。

在《沉默》中,主人公之一的日本信徒吉次郎,不仅出卖神父,也多次背叛自己的信仰。对远藤个人而言,离开大连时,抛弃小黑狗时的无力感和背叛感是促使他创作吉次郎这一形象,去思考背叛问题的原因之一。而对于日本民族而言,1904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日本作为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这使他们自以为进入了世界强国,但随后在国际社会呼吁“人种平等”的失败以及接连发生的“排日事件”,都让日本不得不承认自己和西方的差距,陷入一种自卑和自我否定的情绪中。在日本二战战败,被美军占领后,日本人对占领军的狂热支持和崇拜为表现的“转向”是这种自我否定情绪的另一种呈现形式。吉次郎是远藤自己,更是日本民族的化身,《沉默》中的“叛教”问题象征了远藤对个人层面“背叛”问题的思考,同时更象征了战后民族层面“转向”问题的反思。是反思日本人如何处理“转向”问题所带来民族创伤,如何确立民族认同的过程。远藤在小书中塑造了一位虽遭信徒背叛,却依旧以宽容来理解背叛之人的充满爱的耶稣,这位耶稣脱去了神性的外衣,成为与信徒一起经受苦难的同伴,在《沉默》中远藤的处理方式是让愤怒和严厉的神沉默,从而让充满爱和宽恕的母性神发声。

可以看出,远藤通过写作试图所化解的个人独特的创伤,实质上象征了日本民族的战后创伤,即侵略战争中的罪恶行为所带来的罪恶感,以及战败所带来的挫折感。爱的耶稣形

① 江藤淳『『死海のほこり』をめぐって』、泉秀樹編著『遠藤周作の研究』実業之日本社、1979年、208頁。

②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对我而言神是什么》,台北:立绪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2 页。

③ [法]A.Schweitzer 著 W.Montgomery 译:《寻找历史上的耶稣》,New York 1961 年版,第 4 页。转引自[美]帕利坎著,杨德友译:《历代耶稣形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2 页。

象的塑造即是他化解创伤的途径,通过塑造对人类无限宽容和陪伴的耶稣形象,不仅让近代以来西方权威下带有种族自卑情绪的日本人更容易接受,同时,战争给日本人心中留下的创伤、积压在日本民众内心多年的屈辱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需要这位母性神来疗愈,母性神对弱者的完全接纳,对罪恶的无条件宽恕,为战后日本化解自己的罪恶意识,以及重归国际社会提供了可能性。其次,这样耶稣形象的塑造,是远藤回归本国文化,从日本人的视角出发思考基督宗教中神的结果,以此试图解构西方父权制影响下所产生的男性化耶稣形象,以及此形象中所透露出来的英雄主义色彩和权力导向,象征着对近代以来西方权威及其主张的民主和人道主义之虚伪的反对。宗教层面母性耶稣形象的塑造作为一个象征,是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一直强调的“人种平等”在宗教层面的一个结算。为日本摆脱西方权威,克服近代以来日本民族的自卑心理提供了可能性。

四、结 论

日本发动的和中国之间的这场战争,促使日本向海外的迁移以及重返日本本土的返迁成为可能,经历过返迁体验的个体,其切身经历也影响了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对远藤而言,少年时代的返迁体验,使他反思战争后日本民族对战争责任的追问,远藤选择宗教作为手段来反思上述问题,通过塑造宽容和充满爱的母性耶稣形象,一方面使日本人在心理上化解了战争中的罪恶感觉,另一方面解构了西方权威,为日本人作为黄种人获取国际地位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可以说他笔下的基督形象所表现出的宽恕、理解和爱,源于他对社会、人生和信仰问题的深入思考。但这样的解决方式并非无懈可击,在《新约圣经》若望福音中耶稣怜悯淫妇的故事里,以色列人想要定妇人罪时,耶稣说谁若无罪,便可向她投石头。众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定妇人的罪。耶稣虽有资格定罪,依旧选择宽恕了她。日本战后战争责任追究问题也是同样逻辑,战争时期的每一个人都和战争直接或间接有关,均无法逃脱战争责任的追究,而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宽容、饶恕和爱,必然陷入无法追究、最后不了了之的状态,这是日本战争责任追究面临的困境。通过分析远藤为日本人有意塑造的母性耶稣形象,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在反思战争责任追究问题上的局限,远藤的创作之所以没有完全跳出这一逻辑框架,和他个人的信仰有很大联系,他所要传达的信念,符合基督宗教中所强调的“爱”的精神。即便如此,通过作品中对战争的反思以及耶稣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远藤在反对种族歧视,化解日本民族创伤上所付出的努力。

(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心大事记

2021 年下半年

- 7月4日 王广涛副教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论坛”，并在分组讨论中发言，发言题目为《新时代的同床异梦：中日关系的机遇与挑战》。
- 7月5日 贺平、王广涛参加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并分别点评和主持。
- 8月 胡令远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实践》，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 8月28日 胡令远参加中国国社科院举办的中国社科论坛(2021)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建构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的再思考》基调报告。
- 9月 贺平、魏灵学译著《极简日本武士史》，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 9月7日 胡令远出席日本驻上海总领馆举办的磯俣秋男总领事离任告别招待会。
- 9月8日 三菱商事(上海)企画业务部沈震乾先生一行来访，贺平、王广涛接待，并就今后合作事宜进行交流。
- 9月11日 胡令远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的“日本大选与中日关系走向”研讨会，并作《中日关系如何走出困境》主旨发言。
- 9月24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主题为“中日两国的中秋节——从自然节令到民俗文化与审美”，由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施小炜教授主讲。
- 9月24日 贺平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2021世经论坛，并发言，发言题目为《英国的利益诉求及其对CPTPP的影响》。
- 10月16日 贺平应邀代表复旦大学周边国家研究中心参加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年会，并发言，发言题目为《中日关系中的供应链变化及

- 其对亚洲的影响》。
- 10月16-17日 贺平赴浙江丽水参加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21年年会，担任主持并做发言，发言题目为《日本农政改革的进展与启示》。
- 10月23-24日 中心主办“第二届中日关系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来自中日两国的40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
- 10月25日 胡令远出席第17届“北京-东京论坛”，论坛主题为“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及重塑国际合作”，并发言，发言题目为《关于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之若干思考》。
- 11月 胡令远、高兰、贺平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家关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11月6日 胡令远参加中华日本学会的“日本政情发展与中日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
- 11月13日 贺平应邀参加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主办的第四届长白国关学者论坛，并发言，发言题目为《日本学者的政治科学研究：基于高影响力英文期刊的统计分析(2000-2020)》。
- 11月15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主题为“当前形势与双循环战略”，由上海市社联主席、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战教授主讲。
- 11月20-21日 中心主办第31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全球政治变局中的中美日关系”，来自中国、日本、美国等国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原雅博做特别演讲。
- 11月25日 胡令远参加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公开学术研讨会，并作《中日关系的困局及“脱困”之道》主题演讲。
- 12月 贺平、江天骄主编《金砖国家合作的变局与新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12月7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主题为“全球主义与全球化——以三井物产为例”，由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西村聪一先生主讲。

- 12月11日 王广涛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对话与互促”在线研讨会,并发言,发言题目为《区域研究与国关理论:以日本为对象的考察》。
- 12月14日 中心举办系列讲座,主题为“新冠疫情下中日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机遇与挑战”,由上海三利音国际集团董事长、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副主任杜宏先生主讲。
- 12月21日 胡令远、王广涛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办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形势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并发言,发言题目分别为《中日关系困局中的积极因素及其意义》、《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演变态势研究》。
- 12月26日 胡令远、贺平、王广涛参加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部研究院共同举办的新形势下中日关系论坛。
- 1月10日 三菱商事(上海)企画业务部沈震乾先生来访,贺平、王广涛接待,并就新的一年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

(王范卿)